先醒来的人

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叶克飞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COL中文在线

先醒来的人：

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叶克飞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COL中文在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醒来的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 叶克飞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308-17143-4

Ⅰ.①先… Ⅱ.①叶… Ⅲ.①历史人物—列传—中国
—近代 Ⅳ.①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2159 号

先醒来的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叶克飞 著

责任编辑	谢 焕
责任校对	仲亚萍 张培洁
封面设计	城色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8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143-4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目 录

黄宽
001 / 留英第一人

黄胜
015 / 香港第一位华人太平绅士

容闳
025 / “中国留学生之父”的人生断章

044 / 香山文化中的留学因子

唐绍仪
051 / 民国首任总理

唐国安
065 / 清华首任校长

梁敦彦
083 / 清朝最后一任外务大臣

欧阳庚
093 / 专注外交 45 年

蔡绍基
101 / 北洋大学首任校长

蔡廷干
107 / 军政文三界名人

梁诚
121 / 促成庚款留美的功臣

丁崇吉与曾笃恭
140 / 两位曾经的报人

梁如浩
153 / 其实他并非汉奸

张康仁
164 / 第一位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

詹天佑
174 / 中国铁路第一人

邝孙谋
194 / 他举荐了詹天佑

罗国瑞
198 / 中国第二位铁路总工程师

黄仲良与黄季良 ,梁普时与梁普照
203 / 两对兄弟 ,各有一人献身铁路

周万鹏等人
207 / 电报群英

黄宽:留英第一人

1857年的一天,台湾海峡的海面上有一艘轮船忽遇风暴。狂风巨浪中,桅杆折断,被卷入空中。一位29岁的中国青年坐在船中,在浪峰中颠簸。那一刻,他以为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在此前的10年时间里,这位青年先是赴美,其后赴英,寒窗苦读。起初只是为自己寻一条出路,后来则志在报国。修得医学学士、病理学博士和解剖学博士学位的他,在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国。在狂风中,这位年轻的基督徒诚心祈祷,望上帝庇护他重返家乡,行医救世,轮船也幸而在狂风中脱险,抵达香港。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长期资助他读书的爱丁堡医疗救济会,信中写道:"经过166天的漫长航程,我终于回到了祖国。1月3日,在距离台湾海峡约300英里的地方,我们遇上了一场非常猛烈的大风,风吹走了船的前桅中的中桅、整条船的主桅和后桅中的中桅。十分感激仁慈上天的保佑,我死里逃生,在船遇险12天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故土。"

只是,他未曾想到,等待他的是文化的碰撞与疏离。在英国求学的7年里,他从未有机会讲自己的母语,以至于回国后要重新学习汉语口语。他面对的这个社会,则仍旧落后闭塞,对西方文化抱有莫名的敌意。而且,他也不是完全的"黄皮白心",内心中传统情怀与西方思维的碰撞

无刻不在。

他是孤独的。或许 ,先驱总是孤独的。

他是黄宽 ,广东香山县东岸乡人。18 岁那年他与容闳一起赴美留学 ,两年后赴英留学 ,成为“中国留英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位医学博士。

免收学费的马礼逊学堂

旧时的香山县东岸乡 ,如今是珠海唐家湾镇的东岸村 ,毗邻海畔 ,不过已不复渔村旧观。

当年的香山 ,包括如今的中山市、珠海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 ,地处珠江出海口 ,来往商船极多 ,中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此地农村也因此而开明 ,近代史上如孙中山、郑观应和容闳等名人 ,都出自香山 ,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先驱——上海四大百货公司 (先施、永安、新新与大新)也都由香山人创办。

翻阅旧时笔记 ,我常感慨沿海地区多先驱。他们人人胆大 ,幼年便敢言能言 ,年少出洋之举更是屡见不鲜。这“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想来与见识较广有关 ,黄宽亦是一例。

这个幼年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的少年 ,聪颖好学 ,却一度因贫困而辍学。1840 年 ,11 岁的他前往澳门 ,进入免费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学习。

马礼逊学堂是西方人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 ,为纪念去世的马礼逊而建。马礼逊是从西方来到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 ,他出身雇农家庭 ,年轻时便有前往中国传教的心愿 ,并自学中文。鉴于清政府闭

关锁国,他选择学习医学,以此作为进入中国的途径。他在中国居住了25年,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华英字典》,他也是将《圣经》译成中文的第一人,还在澳门开办了第一家中西医合作的诊所。

1818年,他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这是近代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为中国培养教牧人才,只是校址不在中国本土。1825年,该校开始招收女生。1843年,该校迁至香港,开办至今。2003年,该校迁入香港深水埗区的千禧校舍,所在街道亦命名为英华街。这所学校出过不少知名校友,如曾在歌坛如日中天的许冠杰,曾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等。

1834年8月1日,马礼逊因病猝然离世。他去世后不久,其生前好友便计划创办马礼逊教育会,并着手开办学堂,最初是附设于郭士立夫人所属女校,1839年11月独立成校。学堂对贫困学生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衣服与图书。黄宽得知后,立刻央求乡亲带他前往入学。

在我所查到的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出现了严重分歧:黄宽究竟是第几批入学的学生?有文献引马礼逊教育会的记载,指1840年入学的黄宽是学堂招收的第二批学生之一。另一种说法则指他位列学校第一批所招的6名学生中,而且6人名字均可考,除黄宽外,还有容闳、黄胜、李刚、周文和唐杰。据说,其中一人本是乞丐。我还读过一些资料,称黄宽入学时间为1841年,此说法可确定为谬误。

日后被称作"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可算是马礼逊学堂的"熟人"。早在1835年,时年7岁的他便已进入附设于女校的马礼逊学堂学习,并成为学堂独立成校后的首批学生之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唐杰即唐廷枢,香山县唐家村(今珠海唐家湾镇)人,后来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曾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也曾主持开平煤矿。

如此看来,马礼逊学堂的这批学生,成才率委实惊人。

独自赴英

1841年(也有1842年一说),马礼逊学堂迁往香港,黄宽等人也随之赴港读书。他们在这所学堂里读了6年,如果世事就这样波澜不惊,也许黄宽会成为一个神职人员,在广东的某个县市扎根传教。但有一天,校长布朗走进教室,说因夫人体弱多病,他们打算回美国疗养,愿携几名学生赴美接受教育,有意者请起立。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写道:"当勃先生(即布朗)布告游美方针,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

那时的中国,信息闭塞,民众愚昧,说起洋人,常有各种荒唐无稽的流言,说起外国,常以为那是吃人魔窟。即使广东开风气之先,即使黄宽在洋学堂里读了几年书,对这个世界有些了解,这一站也需要莫大的勇气。之后的他,将远渡重洋,将面对一个完全陌生与未知的世界。

那年,黄宽18岁,等待他的是一段近百日的航行。1847年1月4日,布朗夫妇带着容闳、黄宽和黄胜三人从香港出发,乘坐美国商人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亨特利思号"轮船,于同年4月12日抵达纽约。

在我所能见到的所有文献资料中,都没有对他们初登上美利坚大地时的情境描写。那一刻,三个中国少年不知有没有回想起当初在马礼逊学堂时曾做过的一道作文题?

那也是布朗出的题目:《意想之纽约游》。他让学生们用自己的想象去赞美纽约,其实,他知道,对于那几个穷苦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他们赞美的不是纽约,而是梦中的天堂。

黄宽等三人的留学费用,由布朗的多位朋友资助,包括香港报纸 *The China Mail* 的创办人、主笔肖德鲁特,美国商人李启,苏格兰人康白尔等。他们赴美的船费亦被“亨特利思号”轮船所属的阿立芬特兄弟公司免去。更值得一提的是,三人的家庭还得到了一笔安家费。

历史中总有一些细节让我感慨不已,这三笔安家费便是其一。在马礼逊学堂读书的孩子都是穷苦人家出身,黄宽便早已辍学。钟叔河的《容闳与〈西学东渐记〉》中写道:“即使在澳门这样的地方,比较有身家的人也是不愿意把子弟送到‘西塾’读书的,因为读这样的书不能考秀才、举人,不能仕宦显达。但是,外国人有钱,办洋务可以赚钱,这就对某些家庭有些吸引力。”而对于黄宽乃至容闳来说,他们连“办洋务”这样的愿景都不敢想,只是想读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哪怕只是学一口洋话,在洋人家里做一个仆人,亦算一条出路。据史料记载,黄宽那年迈的祖母并没有过多阻碍黄宽的出洋。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来说,出洋意味着一个孩子的出路,安家费意味着一个老人的生存。

那时的美国还没有高中,只有预科学校,黄宽等三人就读的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便是预科学校中最著名的一所。按照最初协议,他们只有 2 年留学时间,所以起初并没有考大学的想法,只是想利用这 2 年时间多学些知识。

比学校里的知识更有意义的是他们身处的那个时代。年轻的心遇上了年轻的美国,黄宽学到了锐意进取,养成了务实风格。而且,校长海门出身耶鲁大学,在教育上颇有心得,崇尚独立自由,反对学生做“会走路的百科全书”或“有灵性的鹦鹉”,更强调“优美的品格”。

想来,容闳与黄宽的报国梦与责任感,都是在那时被激发的吧?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和“为尊者讳”,就会清楚看到:这两

个为了日后生计而远赴重洋的孩子 ,起初不可能怀有什么宏大志愿 ,那不合常理 ,只剩虚假。唯有新的环境、新的价值观的冲击 ,才能激发潜藏于他们内心的某种情怀与责任感。

他们面对的困难并不仅仅是陌生的环境和语言 ,还有生活与气候。布朗夫妇及布朗的母亲是他们最大的后盾 ,他们刚开始时住在布朗家中 ,后因房子逼仄而租房居住 ,但仍在布朗家吃饭 ,其他生活开销则仍需三人努力打工赚取。而对于这三个此前从未离开过广东香山的少年来说 ,马萨诸塞州的气候更是可怕。香山夏长冬短 ,酷热天气极多 ;汤马萨诸塞州却相反 ,冬天酷寒 ,积雪往往深达数尺。年纪最长的黄胜于次年便染病 ,被迫弃学返回香港。

被迫弃学的黄胜日后也有所成就 ,后来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并成为香港立法局历史上第二位华人议员 (详见后文)。有趣的是 ,曾有学者认为同姓的黄宽和黄胜是兄弟二人 ,实则大谬。陈汉才在《容闳评传》中考证 ,黄胜是珠海南县人 ,与黄宽的家乡珠海唐家湾颇有距离。

1849 年 ,黄宽与容闳顺利毕业。回国还是继续深造? 布朗又一次站到他们面前 ,问他们是否愿意继续留学读书。已经放眼看到世界的二人当然回答愿意 ,布朗便致函向香港教会的那几位资助人求助。资助人表示 ,若二人肯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 ,便可获得资助 ,前提是毕业后要为教会服务。

容闳不愿为教会工作 ,选择留在美国另寻出路。黄宽则选择答应 ,并签下毕业后愿从事传教的志愿书。1850 年 ,他只身上路 ,前往英国。

告别母语的 7 年

赴英的黄宽 ,考入了极具盛名的爱丁堡大学医学院。

据载,黄宽性格内向,心思缜密,动手能力强,喜欢自然学科,这样的性格自是适合学医。加之他吃过苦,又得孟松学校的价值观熏染,也有济世救人的动力。

但内向性格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岩井俊二有一部让我印象极深的电影,名为《四月物语》,讲述一个性格内向的女孩子初入大学,在陌生环境中所遇到的的种种。13岁那年,我也曾有过一段独自进入陌生环境的经历,住校、语言不通……种种不便接踵而来。黄宽面对的也是这样的窘境,而且艰难万倍。

因为,那是一个20岁的中国青年独自走入英国北部古城;因为,那是一个信息闭塞、外国人看中国人同样感到"稀奇古怪"的时代;因为,他身边没有了容闳这样的伙伴,甚至再也找不到一个中国人,以致7年不吐乡音,回国后居然要重新学习汉语口语……

初到英国的黄宽,当然是记得乡音的。前两年看过一篇报道,提及一桩趣事,当时,有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校内见到了关于黄宽的牌匾,上面所书的名字是"Huang Kuang",但去图书馆查找关于黄宽的校史资料时却一无所获。后来才知道,黄宽的名字在当年被拼为"Wong Fun",家乡所在地则拼为"Heong San"(即香山)——他说的是粤语,所以译音也来自粤语。

在关于黄宽的资料中,我曾读到这样一句话,"来到一个开放的社会,却走进了一个封闭的环境",深感触动。对于一个青年来说,这样的经历自然会对人生产生莫大的影响。开放激起了他的求知欲望,封闭却让他将心锁起,他变得越发沉默寡言、内向孤僻。

爱丁堡的天气也极冷,加之环境的封闭引发的乡愁,这位首个旅欧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了埋头学习,苦读之余还要打工赚取生活费用。

翻阅史料时,我常会感慨岭南文化的超强适应性与包容力。彼时的海外劳工、留学生,来自南粤者众,辛勤实干之外,也有安之若素的适应性。至于包容力,且看敢为天下先的风气,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便可窥一斑。即使到了今天,实干、不空谈仍是广东人的特点。黄宽身上亦有着岭南文化的基因,无论身处何地,他的刻苦实干都是克艰的利器。1855年,他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

近年来,媒体热衷晚清民国名人旧事,但想当然的错漏亦常见。比如某报报道,1855年8月4日,爱丁堡的一份报纸刊载爱丁堡大学毕业典礼的消息,消息里提到"54位绅士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他们来自世界上的每个角落,其中4位来自埃及,一位来自中国"。报道里还附有这54人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其中黄宽的论文题目是"关于胃的机能紊乱的研究"(On functional disorders of the stomach)。

我查过一些资料,确有此消息的存在,可翻译却出现谬误。1855年,黄宽只是获学士学位,而非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亦是学士论文题目而非博士论文。

同样涉及黄宽的报道还有至今仍存的《苏格兰人报》,报上列出了获学位者的名单,黄宽之名亦在其中。

时任爱丁堡大学校长的辛普森曾在毕业典礼的演讲上盛赞黄宽:"在你们中间,黄宽是最值得称赞的一个谦虚好学的学生。在学业竞争中他所获得的众多奖励与荣誉,让我们可以怀有这样的期许,这位中国留学欧洲第一人,一定会成为他的同胞中西方医学的最好代表。我坚信,在座的各位,包括教授和毕业生,对他今后的事业与幸福将怀着格外的兴趣……"

此后的黄宽,又一边在医院实习,一边继续深造,于1857年获博士

学位。他拒绝了英国医院伸来的橄榄枝,踏上了归国之途。

敏感自尊伴其一生

有人曾说,上天给你一些,就会拿去一些。也有人说,性格里的任何特质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好处也有坏处。

黄宽的性格也是如此。幼时困苦、全靠自己努力把握住机会的他,用今天的话来说可算是典型的“凤凰男”。“凤凰男”总有坚韧好强的一面,但也因为奋斗过程中的种种艰难与障碍,有时会有极度敏感的一面。

从冰冷无触感、亦缺少细节的文字史料来看,黄宽是一个谦逊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有自卑的那一面,也不知道 7 年离群索居的英伦生活会给内向的他带来多少负面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同样敏感。

当然,敏感也未必是坏事,自尊心强的人往往敏感,只要这自尊不会演变为自卑或自大,就在人生的合理范围之内。比如他的第一次辞职,便因敏感自尊的性格,而在后人看来,这次辞职显然是个正确的选择。

那时,他按照当时与资助人签订的志愿书,在香港兼任传教士,但不久便因不满传道会中英籍传道士的歧视和排挤而辞职,并于次年至广州从医。

黄宽在广州的第一站是合信氏在金利埠创设的惠爱医馆,它同样是英国伦敦会所办的教会医院。

150 多年后,惠爱医馆已旧迹难觅,但由其衍生的广州市精神病医院仍在运作。旧时的金利埠,曾经是西关的繁华商业街,后来因纪念“沙基惨案”,改名六二三路。黄宽曾对惠爱医馆大力改革,据载,1859 年,该医馆有病床 80 张,住院病人 430 人,门诊病人达 26030 人,他还亲授门徒

4 人。

但好景不长 ,他在香港所遇到的问题 ,在广州惠爱医馆同样遇到。还是英籍医生 ,还是英籍教徒 ,还是盲目自大的优越感 ,还是所谓“高等文明”对孱弱中国的轻视 ,这让黄宽无法忍受。因与管理层关系不睦 ,他选择在 1860 年辞职 ,开始自开诊所 (为广州首家西医诊所),并协助博济医院工作。而在黄宽辞职后 ,惠爱医馆也停办 ,直到 1898 年 2 月 ,医院才重办 ,改名为“惠爱医癫院”,即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前身。

至于黄宽的婚姻 ,尽管后世鲜有记载 ,但也可看出一些蛛丝马迹。虽留洋多年 ,黄宽骨子里仍有传统道德的约束 ,崇尚简朴生活 ,烟酒不沾 ,也不爱交际。加之一心钻研医学 ,个人生活极为单调 ,外人看来多少有些枯燥。他的妻子则出身名门。岳父何福堂是香港早年极著名的传教士 ,子女也都受过良好教育。如四子何启也曾留学英国 ,是著名律师 ,香港西医书院 (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创始人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读书时 ,便是他的学生。他还是著名社会活动家 ,曾策划两广独立 ,也曾策划兴中会的广州起义 ,发表大量政论文章。何福堂还有一位女婿 ,也是留学史和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 ,外交家、法学家 ,辛亥革命时主持南北议和的伍廷芳。

这场婚姻以离婚告终 ,黄宽夫妇都未对外说明离婚原因。作为后人 ,我也无从揣测 ,更不能妄言 ,但双方的性格差异也许是离婚的其中一个因素吧。妻子的名门背景和生活方式与黄宽的苦行僧式生活和敏感自尊之间 ,也许难免会有些异样的碰撞。

离婚后的他 ,与姐姐同住 ,终身未再娶 ,并无子嗣。

他也曾步入官场 ,但因生性耿直 ,又不爱交际 ,与官场格格不入 ,未几便离开。1862 年 ,以行医闻名、又有丰富海外经历的他被急于兴办洋

务的李鸿章看中,延揽为医官,并任顾问。同年,淮军进抵上海,与太平天国军队交锋。李鸿章坐镇后方,黄宽作为李鸿章的私人医官,一不能上前线,二不能下民间,所学无用武之地,颇感无聊。他又反感官场应酬,加之多年来深受西方政治观的影响,与清廷官场形态难免有抵触,不到半年便辞职。

也有资料记载,作为一个基督教徒,黄宽对清廷围剿太平天国一事也有不满。据说他在香港时还与后来成为太平天国干王的洪仁玕有交往,二人都曾受过西式教育,都信仰基督教,也都渴望救国,颇有共鸣。但我们很难以此判断黄宽的视野与价值观,作为一个远离政治但又有救国之梦的医务工作者,他自然会有局限性,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自不免会将一腔热血与一片同情心所托非人。或者说,他只是一个医生。在关于容闳的史料中,也曾提到容闳曾面见洪仁玕,寻求救国之道。也许,对于那时的归国留学生来说,打着信上帝教旗号的太平天国,真的是一个看起来比清政府更优胜的选择。

黄宽辞职后,当时的苏松太道丁日昌极力挽留,但黄宽仍然拒绝,接着便返回广州行医。此后,各方势力都曾尝试延揽他,均遭拒绝。1863年,海关医务处成立,全国共聘医官17人,其中16人为外籍,担任广州海关医务处医官的黄宽则是唯一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海关大楼仅两层。1914年,英国建筑师戴维德·迪克设计了四层高的新海关大楼,至今仍存。距离它不远处,便是旧时的博济医院。

与博济的缘分

黄宽曾协助服务过的博济医院,历经多次变迁后,已被人遗忘。很

多人并不清楚 ,如今仍立于珠江边的那所医院 ,已有 170 多年的历史。我曾数次经过那里 ,珠江两岸的巨大变化 ,在它身上也有体现。它保留了古朴的门脸 ,但旁边立起了一座 20 层上下的白色高楼 ,那是医院如今的办公场所。

它现在的名字 ,叫作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

博济医院的前身为美国传教士医生于 1835 年开设的眼科医局 ,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一所西医院。1855 年 ,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接办医局 ,后更名为博济医院。1866 年 ,博济医院开设南华医学堂 ,这是当时中国境内的第一所西医学府 ,孙中山也曾在此学医。后来 ,医院与学堂各有变迁 ,也常有交织 :为纪念孙中山 ,博济医院曾更名为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 ,南华医学堂则曾更名为岭南大学医学院 。20 世纪 50 年代 ,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合并组成华南医学院 。1957 年 ,同样为了纪念孙中山 ,华南医学院更名为中山医学院 ,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也随之更名为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985 年 ,中山医学院又更名为中山医科大学 ,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也更名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前些年的高校合并中 ,中山医科大学这所“老字号”学校与中山大学合并 ,变成了中大的北校区。既然“中山医科大学”这个名字消失了 ,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也便迎来了又一次改名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这所医院在 170 年的历史中 ,创造了中国西医史上的诸多第一 :第一例眼科手术、第一例耳郭再造术、第一例体外肿瘤切除术、第一例膀胱取石术、第一例截肢手术、第一例乳腺癌割除手术、第一例剖宫产手术、第一例子宫颈瘤摘除手术、第一例卵巢切开手术、第一例阑尾炎手术、第

一例甲状腺摘除手术……在医务管理上,它也有诸多第一,创办之初就采用挂号排队候诊的办法,也是国内首家建立西医案例记录、使用手术协议书的医院。

黄宽与这所医院缘分匪浅。院长嘉约翰不但治病救人,也热心传教,还颇具正义感。当年医院扩建时,曾计划拆除珠江边七八十户贫困户的自建窝棚,嘉约翰认为医学会给这些贫困户的补偿金太少,一度选择辞职抗争。

黄宽对嘉约翰颇为敬重,平时常去博济协助会诊。当时博济的大手术,多由黄宽主刀。1860 年,他实施了国内首例胚胎截开术。

1864 年,博济医院开始招收西医学生,培养本土人才,黄宽亦参与教学工作。1866 年,博济医院正式开设南华医学堂,黄宽亦受聘任教,为首位华人教师,主持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等课程。学校的学制为 3 年基础课学习,然后临床实习,为中国培养了首批西医人才。

1867 年,嘉约翰因病回英国休养,黄宽担任博济医院代理院长,同样还主持并亲自执刀了医院首例尸体解剖。

如今说起尸体解剖,可算再平常不过,但在当时却是开风气之先的大事,甚至要顶住各种压力。翻阅晚清笔记,可见蒙昧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种种无知与猜忌,比如收养孤儿之举被传为取器官制药,比如捡拾尸体埋葬被传为吃人肉……广东虽相对开放,但若洋人将中国人尸体开膛破肚,也必会招来非议。黄宽顶住压力,为了解剖学研究、病理学研究,为了开启民智、移风易俗,主动执刀进行试验,开中国解剖学、病理学之先河。

可医人者不自医的老话,竟应验在黄宽身上。因多年来不辞辛劳,每日忙于治病救人,他不幸积劳成疾,染上项疽,这种恶性肿瘤在当时无

药可医。但即使如此 ,黄宽仍硬撑着坚持出诊 ,直至病倒。有一日 ,他遇上一宗难产病例 ,不顾需要静养的病体 ,坚持出诊 ,并留下一句“吾疽纵剧 ,只损一命 ,妇人难产 ,必戕二命 ,岂能以爱惜一命而弃二命于不顾耶” ,终力保母子平安。但他自己却病势加重 ,不久便因项疽恶化而引发败血症 ,于 1878 年 10 月 12 日去世 ,年仅 50 岁。

与他从小相识、一起赴美的好友容闳曾说 ,黄宽是“好望角以东之良外科” ,也曾追忆 :“中西人士临吊者 ,无不悼惜 ,盖其品行纯笃 ,富有热忱 ,故遗爱在人 ,不仅医术工也。”嘉约翰曾说 ,黄宽称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

旧时留学生 ,常有学医救国的理想。后来 ,便有人弃医闹革命 ,有人弃医学文。其实 ,理想没有高下 ,无论乱世盛世 ,坚持便极可贵 ,譬如黄宽。

黄胜:香港第一位华人太平绅士

身处南粤的人,对香港普遍熟悉。一来离得近,来往方便;二来平时打开电视就是香港电视台,以香港电视新闻佐餐是很多人的成长经历。

我年少时也热衷香港的电视台,尤其是娱乐节目。几大音乐颁奖典礼自是必看,还有如"星光熠熠耀保良"、"欢乐满东华"之类的公益晚会,因有众多明星参与,我也常看。

但凡这类公益晚会,有两个词出现频率极高:一是"欢乐满东华"的筹款方东华三院,一是太平绅士。前者筹集募款,后者则常常承担颁奖、送匾之类的差事。

东华三院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慈善机构,"三院"即香港早期的三家医院,分别为1870年成立的东华医院、1911年成立的广华医院和1929年成立的东华东院,均由华人建立,1931年合为东华三院。如今的东华三院,已发展为5家医院,另有53所学校,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和特殊学校等。太平绅士则源于16世纪的英国,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司法辅助者,亦可称"和平公证人",多由有一定社会声誉的成功人士担任。太平绅士制度在香港亦实行100多年,提供独立渠道,供有需要人士提出投诉,并让有关方面按规定就投诉进行调查、跟进。政府各部门也可根据太平绅士提出的意见及建议,解决有关设施和服务管理的问题。

这二者均与黄胜有关。他是东华医院的兴建经理,曾担任该院主席,也是香港第一位华人太平绅士。

除此之外,与他有关的“第一”、“之一”或“最”还有不少。他曾为香港发行时间最长的英文报纸工作过,曾参与创办香港第一份中文月刊,曾与人合作创办香港第一份中文编印的报纸,以及香港乃至全国报刊史上首份“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日报,曾是香港首位华人陪审员……

最早的留美海归

查阅中国人早年留美史料,关于容闳的资料自然极多,近年来关于黄宽的资料也渐渐多了起来,可有关黄胜的资料却极少。

但在当年,他们三人的命运曾被捆绑在一起。

那是 19 世纪 40 年代,这三个香山少年一起在澳门马礼逊学堂读书。1846 年的一天,校长布朗走进教室,说因夫人体弱多病打算回美国疗养,愿携几名学生赴美接受教育,有意者请起立。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写道:“当勃先生(即布朗)布告游美方针,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

可惜的是,黄胜赴美仅一年,便因水土不服而患病,被迫休学回国。

那是 1848 年,黄胜才 21 岁。这个贫困家庭长大的孩子,当年曾为了寻找一条出路,选择了免学费的马礼逊学堂。以他那时的条件,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家庭的贫困无法支撑他继续读学塾,参加科举考试求功名的路子已成镜花水月。他若不想种地打渔,唯一选择就是在免费洋学堂里学习外语,毕业后出来传教,或者去洋人家中做个管家、仆人。随布朗赴美,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选择,从容闳和黄宽日后的轨迹

来看,这当然是一个勇敢而且明智的选择,但造化弄人,因病休学的他必须面临下一个选择。好在资助他们赴美留学的人,再次向他伸出援手。

当时的资助者中,有一位名叫肖德鲁特的出版商,他是香港报纸 *The China Mail* 的创办人。此报创办于 1845 年,原本为周报,是香港第二份报纸,亦是香港发行时间最长的英文报纸。

这份报纸的译名本为《中国邮报》,后来却成了《德臣西报》。之所以有此名字,是因为其第二任主编名为德臣。在德臣手中,该报停办周报,将分支的晚报改为日报出版,以期与《噂剌西报》和 *Hong Kong Register* 竞争。这份报纸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1972 年,香港电视广播集团从《南华早报》手上购入《德臣西报》60% 的股权,但 1974 年停刊。换言之,它也是我们熟悉的 TVB 唯一经营过的报纸。

当然,《德臣西报》的得名、演变,都与黄胜并无关系。他回国时,所面对的还是肖德鲁特与那份周报。肖德鲁特接纳了他,让他学习印刷,进而参与编辑工作。

1853 年,黄胜受聘为英华书院印刷所监督,协助传教士理雅各和麦华陀创办并承印《遐迩贯珍》杂志。

前文已有提及的英华书院由传教士马礼逊所创办,是香港最早的中学,而黄胜当年免费就读的马礼逊学堂,就是为了纪念这位贡献良多的传教士而办的。如今,它已是香港的传统名校。

至于那本《遐迩贯珍》杂志,是香港第一份中文定期月刊,线装发行,主要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政经及宗教文化知识,为传教起辅助作用。另外,黄胜还协助理雅各将“四书”等典籍译成英文,并于 1861 年印行,序言中有理雅各向黄胜致谢的句子。

也正因这套书的翻译,擅长英语的黄胜得到了当局赏识,于 1858 年

成为香港首位华人陪审员。据说 ,当时香港高等法院还开出四倍于英华书院的月薪 ,希望他出任法庭翻译 ,但黄胜希望继续服务教会 ,拒绝了法院的邀约。

王韬背后的黄胜

在《德臣西报》和英华书院印刷所积累了大量出版和印刷经验的黄胜 ,走上了办报之路。1858 年 ,也就是他成为香港首位华人陪审员的那一年 ,他与大名鼎鼎的伍廷芳合作 ,租用了《噂剌西报》的一套中文铅字 ,并以《噂剌西报》的中文晚刊名义 ,出版《中外新报》,这也是香港第一份完全以中文编印的报纸。

至 1872 年 4 月 ,黄胜又与《德臣西报》副主编陈霭庭合作 ,借用《德臣西报》附报《中外新闻七日报》的班底 ,成立《华字日报》,并自任总主笔。这也是香港第二份中文报纸。

这些经历虽属创举 ,但并非黄胜在报业的顶峰。在如今可以寻得的关于黄胜的资料中 ,与王韬合办《循环日报》是必提的大事 ,也是他在这一行业的巅峰。

可惜的是 ,后人提起《循环日报》,往往只知王韬 ,不知黄胜。这也是报业史上常见的现象 ,青史留名的多是主笔、记者 ,资本运营者则往往被忽视。当然 ,黄胜被忽视 ,还有一个客观原因 ,下文会有详述。

王韬与《循环日报》的历史地位都极高。“《循环日报》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日报”这一说法 ,已为中外新闻出版史所公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主义思想的报纸 ,以“强中以攘外 ,谋远以师长 ,变法以自强”为宗旨。1936 年 ,林语

堂曾在英文版《中国新闻與论史》中指王韬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也有人说,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倡导变法强国,成为当时最出色的政论作者,甚至影响庙堂,开“文人论政”先河。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了 800 多篇政论,后集为《弢园文录外编》,这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本报刊政论文集。

那时,黄胜是他的搭档。介绍二人认识的是理雅各,那时的王韬正在香港避难。王韬是江苏人,本名王利宾,字兰瀛;18 岁改名为王瀚,字兰卿。1861 年,他应英国传教士艾约瑟之邀赴南京,后来又以“黄畹”之名上书太平军,劝其“和洋”、全力攻击曾国藩的湘军。这封信后来落入清军之手,他以“通贼”罪遭通缉,一度在上海英国领事馆避难 4 个多月。1862 年 10 月,他又在英国领事馆人员护送下,搭乘邮轮逃亡香港,并改名王韬,号仲弢、天南遁叟。

王韬与理雅各当年曾在上海有过交往,赴港后亦得理雅各帮助,住在了香港伦敦布教会的宿舍。理雅各与黄胜合作翻译中国典籍,也曾让王韬执笔翻译了《诗经》、《春秋》和《左传》等。

1871 年,英华书院一度停办,香港伦敦布教会亦决定解散印刷所。1873 年,黄胜与王韬集资 10000 墨西哥鹰洋,购买了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包括印刷所自制的中文活字钢模,在香港中环荷李活道创办了中华印务总局,承印中西书籍。

按照记载,中华印务总局的旧址在荷李活道 29 号,我曾专程寻访,但已无旧貌,而是一栋大厦。

1874 年初,《循环日报》在中华印务总局的基础上创刊,由王韬主持,中华印务总局承印。当时的《循环日报》,星期一至星期六出版。有趣的是,星期日之所以无报,是因为伦敦布教会出售印刷设备时,合同注明了

星期日即礼拜日 ,不得使用印刷机。报名“循环”,是取“天道循环 ,自强不息”之意。《循环日报》内容包括京城新闻、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等 ,还有各种消息、广告和启事 ,外加政论 ,已具现代报纸之形。据载 ,《循环日报》和另一份《华字日报》为争夺订户 ,都曾标榜为“第一份中文日报”,《循环日报》还为此发过声明 ,表示“本印馆所有资本均出自我华人与各家新报馆有别”。

作为中华印务总局的创办者 ,黄胜自然也对《循环日报》提供了支持。但此时的他已不在香港 ,而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想来 ,这也是他在《循环日报》的历史上被后人所忽视的一个原因吧 。

他之所以前往美国 ,是因为承担了率领幼童赴美留学的任务 。早在之前英华书院停办时 ,清廷曾有洋务派官员向印刷所购买了两副铅字 ,用于京师的西法印书局。黄胜亲自将这两副铅字送往京师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精通英语并有留洋经历的他得到了当局的注意 ,而且 ,他的老同学容闳正在主持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工作 。1873 年 6 月 ,受清廷幼童留美事务正、副监督陈兰彬和容闳的邀请 ,黄胜率领第二批约 30 名幼童赴美 ,抵达后又留作清廷驻美使馆的翻译 ,协助处理各种事务 ,至 1876 年才返港。也正因他在美国的工作得到了清廷认可 ,回国后他便获保举以同知升任知府 ,还赏了顶戴花翎。

这并不是黄胜第一次与清廷合作。早在同治元年 ,即 1861 年 ,他便结识了晚清名臣丁日昌。那时 ,丁日昌被派到广东办理厘金 ,又曾调至高州军营督办火器。《丁日昌评传》记载 ,黄胜曾与王韬提起丁日昌 ,指其“以西法鼓铸炸炮 ,运至江南击贼制胜”,王韬则表示要“平贼”,首先要“利其器”,何不将所知都告诉丁日昌——王韬此时的反应其实颇为有趣 ,他之前曾给太平天国上书 ,也因此被通缉 ,如今却要以所学助丁日昌

“平贼”(“贼”即指太平天国),联系他此后提倡“变法图强”的态度,可知他的倾向。

于是,黄胜与王韬合作翻译《火器说略》,专门介绍西方武器,并于1863年将此书寄给已返回上海主持炮局的丁日昌。丁日昌见之大喜,还邀约二人前来面谈,希望召二人入幕。直至他署理苏松太道时,仍对二人“念念不忘”,只是由于某些原因,二人终未能入幕,不过黄胜曾一度在上海同文馆教英文。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洋务干将,丁日昌在署理苏松太道时,也曾极力挽留另一位早期留洋者、黄胜的同学黄宽,但黄宽无意于官场,还是选择了返粤。直到担任福州船政大臣期间,丁日昌还曾邀约黄胜与唐廷枢一起在香港选拔了40名学生,赴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唐廷枢这位洋务名人,恰恰也是黄胜、黄宽以及容闳在马礼逊学堂的同学。

一部香港早年华人奋斗史

《容闳传》作者之一刘中国曾说,容闳于1909年在美国出版了英文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其中译本就是著名的《西学东渐记》,于1915年出版,并在中国畅销。而在这个版本中,黄胜与黄宽竟被译为王胜与王宽。他认为,这是二人被历史忽视的一个原因。

其实,回国后的黄宽与黄胜,虽也曾前往江南一带工作,黄胜甚至还曾赴京师,但二人的大多数时间都身处南粤,远离权力中心,这也是他们与容闳的一大区别。翻阅黄胜的资料,最让我感慨的是他在香港这片土地上的奋斗。在出版业和报业上的创举与成就,只是这奋斗中的一小部分。

我对香港的直观印象从香港电视开始 ,以后来的屡屡旅行为辅。年少时看港视远多于央视 ,对香港的政府架构之熟悉程度甚至强于自己居住的城市 ,自然而然也对香港开埠后的历史发生了兴趣 。

这部历史不仅仅是一部殖民统治史 ,亦是一部华人权益史。香港的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经历了不止一代人的努力 ,黄胜便是其一。

1870 年 ,黄胜曾代表英华书院参加东华医院的建设 ,担任兴建经理。该院于 1872 年建成 ,是香港最早的华人慈善机构。1886 —1887 年 ,黄胜还一度担任该院主席。

在香港历史上 ,东华医院远非一家医院或一家慈善机构那般简单。它由董事局监管 ,董事多为成功华人 ,董事局也一度是香港华人的权力中心。在港华人若有纷争 ,常由董事局仲裁。曾有人说 ,“东华医院主席多少可以被认为是香港华人社区的非正式市长 ”。

黄胜于 1876 年由美返港后 ,也曾投身商业 ,参与土地买卖 ,成为香港早期著名华商之一。因其社会影响力 ,他担任了多项社会职务 ,如 1876 年 3 月 ,由港督委任为中国语文考试委员会委员 ;1883 年 12 月 29 日 ,被港督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 ,是香港第一位华人太平绅士 。

他还曾在定例局担任非官守议员 。定例局其实就是之后的立法局 ,首任华人议员是伍廷芳 ,于 1880—1882 年任职 ,但只是临时身份。1883 年 ,宝云爵士就任港督 ,希望定例局能设一永久性华人议席 。次年 ,黄胜当选定例局议员、常务法律委员会委员 ,这位精通英语、社会地位较高的华人 ,在宝云眼中“完全胜任以英国人的眼光观察华人事务 ,并以华人眼光观察英国人的事务 ”。黄胜担任此职 ,直至 1890 年辞职。其间 ,他还与何启等人一道被委任为洁净局非官守议员 ,成为首批出任洁净局议员的华人之一。

洁净局成立于 1883 年,即市政局的前身。当年香港的华人精英多曾担任洁净局议员。

但值得一提的是,黄胜在定例局期间,因甚少发言而遭诟病,被指不能为华人争利益,因此华人若遭遇一些公共事务需争取权益,有时甚至选择求助于外籍议员。

我倒觉得,这并非全是黄胜个人的问题。早年在香港,华人地位极低,争取权益是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局势并非一两人可以扭转。黄胜的不发声,亦有客观因素。甚至可以说,能够在定例局占据一个位置,便已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翻阅史料可知,那时的华人精英若想在香港社会中提高地位,进入各种咨询机构几乎是唯一途径。东华医院、洁净局和定例局都属此类。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则是如今仍存的保良局。保良局于 1880 年获批成立,当时,香港拐卖人口、逼良为娼的案件每日愈增,有商人向港督申请成立保良局,以保赤安良为宗旨,筹集资金缉拿拐匪。后以商人上书日(即 11 月 8 日)为"保良局创局纪念日"。如今的保良局,已是一个大型社会服务机构。

正因为这些机构的存在,出色的商人可凭借声望成为行会或街坊的领导者,然后进入这些机构,在香港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华人争取权益。而东华医院和保良局等机构中的著名人士还会被政府任命为官方咨询机构的成员,若能像黄胜那样精通英语,更是大有机会成为太平绅士,进而进入定例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条渠道都是香港华人精英上升的主流渠道,也是他们进入香港权力核心,为华人争取权益的主要道路。

据载,黄胜一生简朴,1902 年 8 月 5 日病逝于港岛家中,终年 75 岁。

8 月 7 日出殡 ,其灵柩由家中送到“香山号”轮船 ,再运回故乡香山县 ,在宗族墓园安葬。

我曾到访其故乡珠海南屏 ,但并未寻得墓园——甚至 ,乡亲们都不知道他。

黄胜的大女婿韦玉 ,亦曾于 1896 年至 1917 年出任定例局非官守议员。次子黄咏商于 1894 年参与创立兴中会 ,并购入香港士丹顿街 13 号 ,成立“乾亨行” ,作为兴中会秘密会所 ,并于 1895 年卖掉自己的银楼产业 ,充作军费 ,协助孙中山等人发动广州起义。有人曾说 ,前些年那部电影《十月围城》中 ,就有黄咏商的影子。

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的人生断章

写容闳是一件难事。相比与他一起在少年时代赴美的黄宽和黄胜,容闳无论生前身后,都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哪怕是中学生,也知道他是“中国留学生之父”。越是大人物,越让人难下笔。写生平?写事迹?各路学者、作家早已研究透彻并写了个遍,何必再炒冷饭?我甚至一度想放弃这一题目。

但说起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肯定无法绕过容闳。他不但是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也是近代留学生事业的先驱。在堪称浩瀚的资料中,我寻得一些断章,这也许是我唯一可操作的写作方式吧。

洋学堂与穷孩子

1847年,容闳、黄宽与黄胜三人跟随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一起赴美,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这一经历对于容闳的人生而言,意义不言自明。若无这次远行,就不会有中国第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生,也不会有日后那批留美幼童。

容闳在洋学堂里已就读多年。早在1835年,时年7岁的他就随父前往澳门,就读于马礼逊学堂的前身——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的马礼

逊纪念学校。1839 年 ,马礼逊学堂正式成立 ,他也随之成为首批学生之一。此时 ,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还有一年时间 。

鸦片战争是我国近代史上最关键的时间点 ,它使得国门就此被强行打开。自康熙后期至鸦片战争前 ,清政府一直禁教 ,基督教仅秘密流传于沿海地区 ,葡占的澳门为最重要“据点”。1553 年 ,葡萄牙人租占澳门 ,几百年过后 ,澳门已成为一个中西交融的城市 。当地传教士们为了吸引人入教 ,常兴办一些低价医院和免费学校。也正因此 ,在洋学堂读书绝非什么光彩之事。但凡稍有经济能力的家庭 ,还是会选择让孩子读私塾或正规学堂 ,日后可走科举之“正途”。唯有贫困家庭的孩子 ,才会去时人眼中“不伦不类”的洋学堂。

对于这些孩子而言 ,选择洋学堂 ,就等于断绝了科考之路。他未来的人生选择极为有限 ,或是参与传教工作 ,或是去洋人家中当仆人 ,当然 ,最好的情况是从商 ,像漂洋过海而来的那些外国人一样有钱 。

在《西学东渐记》中 ,容闳这样分析父母送他去读洋学堂的动机 :“意者通商而后 ,所谓洋务渐趋重要 ,吾父母欲先着人鞭 ,冀儿子能出人头地 ,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 。”

容闳的这些猜想其实多少有点“马后炮”的意味 ,也有“为尊者讳”的可能。对于他的父母来说 ,经济压力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容闳的哥哥已经进了私塾 ,他们无法负担容闳的学费 。至于“中外交往”这种宏大又长远的命题 ,压根不是底层可以想到的事情 ,尤其是在闭塞的当时 。

我曾查阅马礼逊学堂历史上的全部学生名录 。这份名单上人数其实极少 ,历届毕业生合计只有 41 人 ,均来自香山(含如今的中山、珠海和澳门三地)。其中 ,来自今珠海地区的学生最多 ,占了大半 ,比如容闳和黄胜来自今珠海南屏 ,黄宽来自今珠海唐家湾 ,来自前山、上栅、夏美、官

塘等珠海村落的也有不少。此外,还有学生来自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这里恰恰临近珠海。澳门其他洋学堂的情况也与马礼逊学堂类似,容闳曾回忆,他在女校读书时,由于不满学业枯燥,曾与几个同学一起乘船逃回家乡,他“原打算先带大伙儿到我家,然后她们再各自分散回各自的村子里”。按这个叙述,几个幼童都能乘船回家,并各自回村,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澳门洋学堂的生源主要来自附近。

尽管教会学校以传播教义、培养传教人为主旨,但同时实行双语教育,既有传统的“四书五经”,也教授外语、历史、地理和天文等科目,间接传播了西方文化。

中国历史上一直边患极重,澳门这弹丸之地被葡萄牙人所占,根本不会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但若将澳门置于当时的全球背景下,我们就会明白这不同于以往的边患,带给这个古老国度的冲击也注定惊人。因为,在这个小岛上有两种文明的碰撞。近代国人放眼看世界,以岭南为先,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先驱亦都出身此处,显然是澳门的星星之火逐渐扩散的结果。南海的康有为、新会的梁启超、香山的孙中山……抛开日后的那些成败是非不说,他们的年少时代,一定在这文化碰撞中汲取了养分。

一个人的耶鲁生涯

先是黄胜因病离开,后是黄宽远赴英伦,到了 1850 年,那三个一同赴美的少年中,仅剩容闳一人在美国坚守。

从孟松学校毕业后,他考入了耶鲁大学,但他根本无法负担学费。孟松学校虽有资助名额,但前提是毕业后要担任传教士,容闳表示拒绝。

他虽是基督徒 ,却不愿被限定择业自由 ,他也认为 ,贫穷不是丧失自由的理由。他的这一决定 ,也使得原先澳门的资助方放弃了对他的支持 。好在布朗又一次伸出援手 ,他找到乔治亚州的萨凡那妇女会 ,说服对方为容闳提供资助 ,此外 ,阿立芬特兄弟公司也负担了容闳的一部分学费 。

当时的耶鲁 ,仅有学生 500 人 ,容闳是唯一的华人。

此时的容闳 ,其实已融入了美国社会。早在孟松学校期间 ,他便习惯了新英格兰地区的新教式生活 。当时 ,他自己承担劈柴烧炭生火之类的事情 ,也帮人劳作换取生活费 ,大学时也当过图书馆管理员 ,承担学生宿舍的食品采买工作。他还酷爱锻炼身体 ,据说 ,这个在中学时代一直穿着中式农民衣服、盘着辫子的少年 ,曾是足球场上的骁将。这个景象在大学时代成了“绝响” ,因为入学才一年 ,容闳就丢弃了中式长袍和辫子。也是在那一年 ,他加入了美国国籍。

如今说起容闳 ,无论是国人还是耶鲁人 ,都将其视为大人物。我曾读过不少“寻访容闳耶鲁故迹”之类的文字 ,里面有各种关于他的传说 ,比如他是划船队的成员 ,在球场上也流传着如“我们一定赢(win) ,因为我们有 Wing(容闳之名)”之类的话语 ;还有他曾经在报纸上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 ,得到著名学者关注……但这些光鲜绝不是容闳大学生涯的全部。100 多年后 ,我们往往只能见到结果、见到光环、见到各种经过渲染和加工的故事 ,这让我很难全部相信。

我更相信的是 ,作为一个独在异乡的东方人 ,容闳所遭遇的困难绝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种族歧视、地域歧视 ,以及好奇心带来的种种“围观” ,恐怕都是容闳无法绕过的挑战 。他可以依仗的 ,唯有自己的适应力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度所特有的包容性 。

据载 ,耶鲁大学档案馆保留了 1854 届毕业生的同学赠言簿 ,其中就

有容闳那本。他给其他同学写下的赠言都是用中文书写,毛笔正楷,再用英文翻译,起始往往用传统格言,有“礼之国,和为贵”,“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有志者事竟成”等。在那一届的 97 名毕业生中,有 92 人为容闳留言,其中多为热情之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我将常常深深思念你,你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光荣使命。获悉(因为我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欢乐……”

这位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注定背负着一些很沉重的东西。

一代人的实用主义

1854 年,毕业回国的容闳曾说,希望“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抱着这种态度,容闳曾与各方势力合作,寻求救国之道。他曾赴南京,向天王洪秀全和洪仁玕献言献策;他也曾受曾国藩委派参与洋务运动,上书清廷促成幼童留美;他还曾与维新派来往密切,参与戊戌变法;晚年的他,曾支持革命党,遭清政府通缉。

如此看来,晚清数十年间粉墨登场的各种势力都与容闳有过交集,这位“海归”的政治立场似乎很难界定。

其实我一向不喜欢投机的人,倒不是逼人站队,只是觉得一个人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应有一个基本立场,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也该有个底线。不过面对容闳乃至那个时代的一些人而言,我倒很难生出“他们在投机”的感受。

那不是投机,而是寻路。无论是容闳,还是“不惜以今日之我推翻昨

日之我”的梁启超 ,这些岭南人在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中 ,都一次次审视自己 ,寻找那条救国之道。无论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 ,他们的出发点都不是投机。

刚刚回到国内的容闳 ,曾任职于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庭和上海海关 ,但在当时 ,“海归”可算不上什么拿得出手的身份 ,反倒让他与国内社会格格不入。加上这三份工作要不“事少薪薄” ,要不人际关系复杂 ,要不同事腐败成风 ,所以他供职时间都极短暂 ,加起来还不到一年。他也曾在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 ,境况同样惨淡。1860 年 ,他前往太平天国都城南京 ,拜访干王洪仁玕。

显然 ,此时的容闳将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也许是因为同信基督教 ,也许是因为同为广东老乡 ,也许是因为曾经远赴重洋的他早已对清政府失望 ,也许是因为他与在香港时结识的洪仁玕有太多的共同话题和相似的理想……但毫无疑问 ,寄希望于早已腐化堕落的太平天国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当时 ,容闳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议 ,包括组织正规军队、设立军事学校、设立海军学校、组织平民政府、建立银行系统和规定度量衡标准、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及举办各种实业学校等 。

两日后 ,洪仁玕表示 ,容闳所说的这些恰恰也是他想要做的 ,只是事情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定夺 ,必须等在外征战的诸王归来商议后才可实行。

很显然 ,视野相对开阔的洪仁玕尽管被洪秀全委以重任 ,但在整个太平天国体系内 ,他是孤立的。曾有人说 ,《资政新篇》的作用其实被夸大了 ,尽管理念超前 ,但可操作性极低。而我想说的是 ,理念超前也好 ,可行性低也好 ,在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里 ,这些都是技术问题而不是是

非问题,但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起义政权,显然不具备良好的政治氛围。太平天国后期的中流砥柱李秀成就曾说,他从不屑于看洪仁玕所编的书。

不过,洪仁玕还是希望能以官位留住容闳。几日后,容闳得到了太平天国加封的“义”字衔。这个爵位并不低,但也不高——毕竟,太平天国的官实在太多了。大凡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论功行赏时往往是“太公分猪肉”,官僚系统极度庞大臃肿,腐化堕落也比较快。

容闳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西学东渐记》中提到,太平军将领腐化严重,眼界也不高。而且,太平军一路北上,吸收了大量新兵,这些新兵可算是典型的乌合之众,没信仰没道德,一路烧杀掳掠。尤其是从偏远南方到了富饶的江南地区后,一群人久贫乍富,立刻成了暴发户,更是堕落极快。这样一个政权,显然无法承载强国之梦。

于是,他选择了离开。在他眼中,所谓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两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亦无英雄豪杰,创立不世伟业,以增历史精神”。

对于持实用主义态度的容闳而言,选择太平天国,是因为期待,放弃太平天国,是因为失望。

他参与洋务运动,同样是源于实用主义。那时的洋务派,意图以技术救国,最关心的无非坚船利炮。1862 年,曾国藩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式军工企业——安庆军械所。次年,他几次着人敦请,召见容闳。容闳向他提出了“机器母厂”计划,在他看来,中国眼下急需的不是生产具体武器的工厂,而是生产“制器之器”的工厂,而且,除了制造武器外,还要制造民用机械,发展基础性工业。曾国藩表示赞同,授予容闳五

品军功头衔 ,并请赐戴蓝翎 ,正式任命他为出洋大臣 ,出国采办机器。其实 ,洋务运动与容闳的教育救国计划并无直接关系 ,但经过了与太平天国的那次接触 ,容闳显然明白了“曲线救国”的道理。1860 年 ,他向洪仁玕提出七条意见 ,其中四条关乎教育 ,却无功而返 ,这让他深知掌握话语权是何等重要 ,有了话语权 ,才有机会实现理想。如果他能在洋务运动中为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出力 ,得到足够信任 ,便有望实现他选拔幼童出国留学、教育救国的梦想。

尽管后世认为洋务派的技术救国之路是方向错误 ,但洋务派们的改革决心确实是坚定的。如李鸿章在担任江苏巡抚期间 ,曾致信总理衙门 ,信中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 ,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 ,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 ,以致所用非所学 ,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 ,以为不必学 ;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 ,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 ,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欲学习外国利器 ,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 ,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生悬以富贵功名之鹄 ,则业可成、艺可精 ,而才可云集 ?”

这种说法与容闳对曾国藩的建议是一致的 。

容闳从美国订制的机器 ,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母机 ,堪称中国工业化起步的标志。他还趁机向曾国藩提出建议 ,在工厂旁设立兵工学校 ,培养人才 ,亦获同意。也因此功劳 ,他被保奏为江苏候补同知 ,在江苏省衙署任通事译员 ,官位为五品。

清廷规定 ,四品以上官员有奏事之权 ,容闳回国 10 年后 ,距离这“奏事之权”终于只差一步之遥。

但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步又让他等了很多年。

他曾求助同为广东老乡的江苏巡抚、洋务派干将丁日昌,请他帮忙上奏,具体意见包括建立华资汽船公司、选派青年出国留学、开采矿产和禁止教会干涉民间诉讼等四条。他曾在《西学东渐记》里回忆,其中只有“选派青年出国留学”一条为主旨,其他均为陪衬,也算“给领导提供删改空间”的官场策略。丁日昌又帮他找到军机大臣、洋务派要人文祥,但文祥先是丁忧,不久后又因病去世,此事便告搁置,更令容闳感到绝望。直到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和丁日昌被派往天津处理危机,容闳亦随之前往,为丁日昌做翻译,才有机会请丁日昌向曾国藩进言,提出留学计划。

曾国藩同意了,表示将与其他大臣连衔入奏。1871年8月5日,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曾国藩和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拔“聪颖子弟”到国外学习,以图自强。他们的计划是每年选拔幼童30名,4年共120人,分批赴洋,15年后回国,“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这15年的留学时间,也是容闳所建议,这样可以使得幼童在大学毕业后还能继续留洋工作数年,深入美国社会体系,不至于纸上谈兵。至于留学者的年龄,初定13到20岁,后改为10到15岁。这是担心15岁以上的人出国15年后,回国便已30多岁,以当时国人寿命,很可能遭遇丁忧,为父母守孝3年,重新出来工作时已年近40,为国家效力时间太短。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步子迈得颇大,他们还提出,留美幼童在出国前就可被赐予“生员”(即秀才)身份,回国后也可“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对于容闳来说,这无疑是他愿意看到的——他自然会想起自己当年入读马礼逊学堂与出国留学的境况,那时,选择这条道路,就意味着放弃了科考之路,与官场无缘,而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奏折,显然在一定程度

上突破了科考体系。

1871 年 9 月 9 日 ,批复下来了 :“依议钦此。”

容闳通过襄助洋务派实现自己梦想的“曲线救国”之路 ,在多年后终于见到了曙光。

我还是想说 :那不是投机 ,而是寻路。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比古人聪明 ,但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身在局中 ,才不知道努力的可贵。

100 多个勇敢的家庭

为了筹备幼童出洋事宜 ,清廷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负责人为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与江苏候补同知容闳 ,他们后来也成为中国首任驻美公使及副使。

也许容闳没有想到 ,招生一事会如此艰难。距离他 1847 年赴美留学已有 20 余年 ,这个国家也经历了大张旗鼓的洋务运动 ,但说起出国留学 ,大多数家庭仍表示不屑。但凡小康以上家庭 ,仍将科举考试视为孩子日后的正途 ;家境尚可的家庭都不会将孩子送入国内新建的新式学堂 ,更不用说出国留学了 ;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出国留学有辱门楣。至于出洋的那个目的地——美国 ,更被许多人谣传为“吃人”的野蛮人国度。

即使国门被强行打开 ,即使中西文化不断交流碰撞 ,这个国家仍然封闭无知 ,愚昧落后。

而且 ,让一个 10 多岁的孩子出国 15 年 ,还要签字画押 ,生死各安天命 ,孩子在异国发生意外或死亡 ,政府方面概不负责 ,这也确实让传统的国人难以接受。

那么,容闳能否选择与当年的自己境况相似的贫家孩子出洋呢?不能——这是“幼童出洋”这一历史事件中,让我最有感触的一个细节。

即使对困难有一定预知,即使最初几乎无人报名,清政府也没有降低原本就极为严格的选拔条件。

选拔条件大致是这样的:“凡肄业学生必须身家清白、品貌端正、禀赋厚实、资质明敏者方可入选。其身体孱弱及废疾者概不收录。凡挑选以年在十岁至二十岁为率,凡十二岁至十四岁者择其文理略通即可入选,其十五岁至二十岁必须中国文理通顺及粗通洋文、略解翻译方可入选。”

也就是说,家庭背景、相貌、智商、身体和基本文化程度缺一不可。很显然,清政府对这桩前所未有的大事极为重视,幼童不仅仅承载着救国之梦,也代表着国家形象。所以,幼童们不但需要形象端正,不少人还因原姓名粗鄙不文而遭政府责令改名,最后呈现于名单上的幼童名字,个个大气温文。此举在如今看来自然有些形式主义,有形象工程之嫌,但确实也客观地说明了清政府的决心与重视。

但也正因为这不肯放松的苛刻条件,首批 30 名留学生的招募竟迟迟不能满额。坐在上海的衙门里等待别人上门显然行不通,容闳选择了走出去。他首先的选择是老家香山县及附近县市,后来还在香港招了几名,终于凑足人数,于 1872 年 8 月从上海启程赴美。

此后 3 批幼童,招募难度同样很大,但仍如期满额出洋。

据统计,在先后 4 批共 120 名幼童中,来自广东的达 82 人,其中更有 39 名来自容闳的故乡香山县。所以,后世学者去美国查找留美幼童资料时,常因不懂粤语而一头雾水、无从下手,甚至连幼童的名字和基本资料都查不到。这是因为当时的音译都以粤语发音为准,如唐国安为

“Tong Kwo On”,钟文耀为“Chung Mun Yew”。另外,来自江苏的有 22 名,来自浙江的有 8 名。

近代以来,海洋文明始终代表着先进与开放,东南沿海亦是中国近现代开放的前沿,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巨大差异。不可否认的是,这 100 多个将孩子送去美国读书的勇敢家庭(其中有 5 个家庭甚至先后送了兄弟两人出国),大多曾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至尝过“甜头”。如赫赫有名的香山唐家镇(今属珠海唐家湾),本就是近代“买办之乡”,当年容闳在马礼逊学堂读书时,同学唐廷枢便来自唐家镇。唐廷枢曾任怡和洋行买办、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终日与洋人打交道,视野开阔,深谙洋务,容闳回乡招生,他也必然从中出力。加上唐家有不少人在檀香山和旧金山打拼,闯出了“唐家”的名号,俨然武侠小说里的暗器之王“蜀中唐门”。所以“香山唐家”变成了“中国唐家”,据说海外侨胞致信回国,只需写上“中国唐家”,信差自会送至香山县唐家镇,这个传说真假待考,但唐家对洋务的深深介入,是不争的事实。唐家子弟从小耳濡目染,自然也有开放心态,留美的 120 名幼童中,来自唐家的就有 7 名,其中包括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

除香山唐家外,还有不少幼童也从小受过西方文化影响。据统计,120 名幼童中,有 31 名幼童的父亲从事洋务相关工作。

但这样的开明家庭终是少数,在幼童中,没有一个旗人,也没有一个汉族高官子弟——庙堂之上,仍然是“科考正途”那一套。

与开明相伴的是勇气。幼童的父母们都与清政府“具甘结”,所谓甘结,即合同文书。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所签甘结至今留存,全文如下——

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兹有子天佑情愿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派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徽州婺源县人氏。曾祖文贤,祖世鸾,父兴洪。

同治年十一年三月十五日詹兴洪亲笔画押

值得一提的是,在首批 30 名幼童启程赴美时,大力促成此事的曾国藩已经作古。容闳遗憾之余,也认为“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但曾国藩的辞世,似乎也预示着幼童出洋留学一事并不平坦,毕竟,容闳失去了自己最大的支持者。

孩子的适应与大人的不适应

护送第三批幼童赴美的小官祁兆熙曾写下一部《游美洲日记》,这也是难得的研究幼童赴美行程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部日记中,幼童们经历了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首先是由于风浪导致晕船,孩子们呕吐、不得安睡,但十余日后,孩子们便已“嬉戏自得,毫无恐怖”,他们甚至喜欢大风浪,因为船身颠簸,他们便可免去当日功课。再就是西餐,孩子们起初吃不惯,不久后便习惯了牛奶面包,也习惯了刀叉和扒类。

留学的过程与航行过程一样,同样是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他们初至美国时,无论是乘坐火车,还是见到印第安人,都极为惊奇。但当留学生活正式开始时,新鲜感便全数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难题,比如语言和风俗。同时,他们的功课也极为沉重,除了要补习英文外,还要学

习中文 ,同时还有一套陈腐规矩 ,比如脸朝中国方向向皇上跪拜 ,再给孔子画像磕头。

但两三年后 ,随着幼童们英文水平的进步 ,他们已适应了留学生活。而且 ,此时的他们已进入正规学校学习 ,所受约束也少了 ,渐渐融入了美国社会 ,开始拒绝中式长袍 ,甚至剪掉辫子。他们在西方教材里也学到了大量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知识 ,对“四书五经”自然也失去了兴趣 ,更反感那些烦琐的礼节。他们中的一些还无视清廷的规定 ,开始信奉基督教 ,甚至组成“中华归主团” ,提出“中华帝国基督化”。正值青春期的他们亦情窦初开 ,与美国女孩秘密约会 ,自由恋爱 ,并有情书至今留存。詹天佑等人组成的棒球队是中国最早的棒球队 ,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组织的耶鲁大学赛艇队也多次击败哈佛大学队 。

在容闳看来 ,这实属正常 ,“此多数青年之学生 ,既至新英国省 ,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 ,且习与美人交际 ,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 ,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 ,终日饱吸自由空气 ,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 ,一旦排空飞去 ,言论思想 ,悉与旧教育不睦 ,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 ,跳踯驰骋 ,不复安行矩步”。有趣的是 ,他的侄子容揆也是留美幼童中的一员。容揆曾致信父亲 ,表示自己已经信奉了基督教 ,其父大怒 ,竟致信留学监督的官员 ,请求将儿子遣送回国 ,关在家中好好教育。容揆不愿回国受辱 ,决定摆脱官方控制 ,继续求学。但这也意味着他失去了政府资助 ,没了生活保障。容闳则委托牧师给了容揆一笔资助款 ,让他继续在美国学习 。

但孩子们适应了美国社会 ,大人们却并不适应 ,容闳只是唯一例外。对于清廷负责监督留美幼童的官员们来说 ,孩子们的转变实在太可怕了。

说到底,这是文化碰撞与体制之间的冲突所致。清政府有一个美好愿望:幼童们必须“政治正确”,成长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相符的好青年,同时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回来好好报效朝廷。但即使带队官员再怎么严防死守,也无法让孩子们成长为“政治正确”同时有知识有文化的“分裂青年”。在和平状态下,落后文化其实永远无法战胜先进文化。幼童们置身于更先进更开放的西方文明中,抛弃传统文化中那些落后的元素实属必然,比如中式长袍和辫子,还有各种跪拜仪式,都注定会被抛弃。

清政府的一厢情愿、监督官员的守旧和孩子们自身的成长,构成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幼童留学一事的叫停。

1876 年,吴子登接任陈元彬,出任留美幼童监督。这位支持过洋务运动,还懂些英语的官员竟比陈元彬更加守旧。他开除了两名信仰基督教的幼童,还曾杖责剪掉辫子的幼童,并频频写信回国或写奏折,指留美幼童们思想上走了邪路,不听管教,容闳又百般纵容。极为看重“政治正确”的清政府听信一面之词,终于在 1881 年将留美幼童全数撤回。尽管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作家马克·吐温都曾出面周旋,耶鲁大学还曾联合社会人士致信总理衙门,但仍无法改变这个结局。

容闳寄望实施百年的留美运动就这样结束了。此时,詹天佑等人已考上了大学,学业却遭强行停止。

外交家、诗人黄遵宪曾针对此事写诗,大骂吴子登:“新来吴监督,其僚喜官威。谓此泛驾马,衔勒乃能骑。征集诸生来,不拜即鞭笞。弱者呼暴痛,强者反唇讥。汝辈狼野心,不知鼠有皮。”

100 多年来,传统文化和“全盘西化”之争始终未有停息,也很难有什么定论,但其间种种反复却已告诉了我们:任何事若以“政治正确”为标

准 ,都不免走上歪路。而且 ,理念之争不该变成意气之争 ,也不该变成官场游戏。据说吴子登的守旧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与曾国藩和丁日昌的私怨。习惯了美氏人际关系的容闳 ,注定在中国官场上屡屡碰壁。

持续至晚年的实用主义

归国的留美幼童们 ,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屈辱。他们抵达上海后 ,被当作犯人一般关入某年久失修的学堂 ,连中秋节也不能外出。据回忆 ,学堂内遍地霉菌 ,每人只有两块木板当床 ,连草席都没有 ,食物也不如猪食。这些从传说中的“野蛮人国度”归来的少年 ,却在自己的祖国遭遇了最野蛮的待遇。

数日后 ,他们听长官训话后得到释放 ,并被随便分配了工作 ,如学工程的詹天佑去了广州教英语。

在以后的日子里 ,这些留美幼童中涌现出了国务总理唐绍仪、工程师詹天佑、外交家梁诚、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 ,以及大批官员、买办、海军将领、工程师、教育家。对于他们而言 ,刚刚归国这几日的经历都是心底不愿触及的屈辱 。

比他们更加心灰意冷的是容闳。次年 ,他去了美国 ,一住就是 13 年。

1894 年 ,面对中日甲午战争的复杂局势 ,他联系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 ,表示愿回国出力 ,同时提出了筹款购舰的建议。得张之洞邀约回国后 ,他又前往北京 ,提出种种方案 ,如设立国家银行和修筑全国铁路等。但前者被盛宣怀抢先兴办 ,后者则因张之洞和盛宣怀的反对而流产 ,其间的种种金钱交易 、贪腐勾当都让容闳失望。

这位实用主义者选择了又一个希望:维新派。

此时的容闳已年近七旬,他参加了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成立大会,他的寓所长期成为维新派聚会之处。他的两个小老乡康有为和梁启超对其极为尊敬。如今看来,所谓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其实多有言过其实、假大空的痕迹,康梁二人的煽动力一流,但绝非出色的政治家。可对于容闳来说,这些有意改变政治体制的年轻人,是他屡屡受挫后的寄托与希望。

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梁二人出逃,容闳也遭通缉,潜逃至上海租界。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改名为“中国国会”,推举容闳为会长,筹划“自立军”起义,意图推翻慈禧,让光绪帝复位。但张之洞提前得知此事,予以镇压,容闳再遭通缉,流亡海外。

这次经历无疑使得容闳对清政权彻底失望,甚至断绝了“明君情结”,开始走向革命。

有丰富洋务经验的他,其实早已是革命党人拉拢的对象,如孙中山策划两广独立,就希望李鸿章主政,容闳主管外交。1901年,革命党人在香港筹划起义,希望夺取广州,也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大总统。尽管这些计划都告流产,但容闳与革命党的关系已分不开了。不过他也无意走上前台,加上身遭通缉的缘故,他于1902年又去了美国,对革命党人进行经济支持。1909年,他提出“中国红龙”计划,打算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并为此事努力。

武昌起义后,久病卧床的容闳连续写了三封信给革命党人谢缵泰,表示喜悦之情,并提出建议,警惕内战,并希望病好后重返中国。1912年1月,他又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3个月后,他因病情恶化,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终年84岁。

这位一生信奉实用主义的“海归”,具备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自省。他始终在寻找那条救国之路,正如他在美国时所说的 :“不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未能叶落归根的他

容闳故居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南屏村西大街三巷 1 号。

如今的南屏,有巨大的工业园区,还有一家家汽车 4S 店,有着中国城乡接合部特有的杂乱痕迹和短视规划——即使是珠海这种以环境著称的花园城市,也无法逃得开这“中国国情”吧!而这种发展与当年容闳所希冀的救国之道是否一致?没人能说得清。

常常经过南屏,但停留下来并去寻找容闳故居,唯有一次。那是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容闳故居早已不存,在原址上所建的是他人的民宅,墙上所挂的铭牌也非“容闳故居”,而是“容闳故居遗址”。

所谓遗址,只是一面院墙。毕竟,容闳只是穷人家的孩子。穷人家的房子,本就难经得起风吹雨淋和那动荡岁月。即使是这面院墙,其实也经过了当地政府的修葺,不然绝难留到今日。那水泥质地上,有青苔覆盖。

据说,当年这条西大街三巷叫“辅仁巷”,这是容闳起的名字。容闳后人曾回忆,容闳故居占地大概 200 平方米,有天井、大厅、东西两侧长屋,是典型的农家宅院。

18 岁那年赴美之后,容闳大半生中仅仅返乡 3 次。故乡对其而言,也许已经成了一个虚无的名词。不过,他仍在故乡留下了痕迹。1871 年,他于选拔首批赴美幼童的间隙返乡,倡议并捐资 500 两白银,在家乡

办甄贤社学;1902 年,他最后一次返乡,将甄贤社学改为新式学堂。这间学堂后来陆续更名为甄贤学校、南屏小学、南屏中心小学,如今名为甄贤小学。我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就出身这所学校。

容闳这位“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的美籍华人,并没有多少“衣锦还乡”的欲望。从地域而言,他是香山人,但从胸怀而言,他是世界人。

他并未叶落归根,一生爱国亦为此奔波的他,去世后葬于哈特福德的雪松山公墓,他与他的美国妻子以及其他家人葬在一起。据说,墓碑朝着东方。

突然想起另一段记载,1902 年,遭清廷通缉的容闳决定返美。那年,他已 74 岁,已有一去不还的预感。于是,他返回南屏,为列祖列宗上香,在父母坟前跪别,黯然离去。

香山文化中的留学因子

1872 年至 1875 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 4 批幼童赴美留学，共计 120 人。其中广东籍达 84 人，占 2/3，香山籍又达 40 人，在广东籍幼童中又占近半。

这之中当然有“留学生之父”容闳的作用。当时信息闭塞，人们观念守旧，没有几个家庭舍得将孩子送去一个未知的国度，以至于招生成了大难题。容闳只得返回故乡，利用自己的声望与同学关系招募生源。但除了容闳的个人因素外，广东的开风气之先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近代以降，海洋文化可谓进步之源，广东最先受益，香山地区又是广东的急先锋。香山地区早有读洋书院的传统，近代留学事业亦从这里发端。一代人的开眼看世界，不仅仅掀起了中国留学运动的风潮，还从政治、外交、经济和教育等多个领域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

香山文化的开放与包容

广东香山县于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建制，当时县境颇为辽阔，包括今天的中山、珠海、澳门、番禺以及顺德的部分地区，县址在今中山市石岐区。

据说,在秦朝至南汉时期,这里还是一片岩岛,被海洋包围,与珠三角海岸相隔对望,但早已有人类居住,有“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的说法。中山曾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大量新石器晚期的文物,还曾在孙中山故居所在的翠亨村发现战国晚期墓葬。珠海也曾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有夏商时期的青铜器文化遗存。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香山人的开拓进取。

如今所说的香山文化,其实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中原文化的传入,一是异国文化的传入。

据载,百越历史上曾历经三次大规模移民。一是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派兵 50 万南征;二是公元 4 世纪,西晋的“八王之乱”又导致中原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移;三是南宋末年,宋端宗携部属败走伶仃洋沿岸,南宋灭亡,许多宋室及其部属的后裔流落香山一带。其中前两次都或多或少与香山相关,第三次更是以香山为最终落脚点。

这三次移民为香山带来了中原文化,也使得香山文化从一开始就有了“兼容性”,对外来事物较能包容。

1553 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1572 年开始向明政府交纳地租,盘踞澳门,1623 年更是任命了首任澳门总督,这使得澳门成为中西方经济贸易最先开始的通道。1591 年,戏剧家汤显祖曾游历香山,并写诗四首,其中有“花面胡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不树田园不树桑,珈珂衣锦下云樯”的诗句。

渐渐地,这个经贸通道成为文化交流的通道。尤其是在葡萄牙任命澳门总督后,这个小城更是完全西化,有人称,澳门是“中华第一个通向西方世界的口岸,中华第一块能与西方世界经济商贸的地方,中华第一个能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区域,中华第一方能全面感受西方文化生活方

式的所在”(《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观察影像》,广东人民出版社)。这使得整个香山地区都处于中西方文化碰撞之中。从政治、法治、宗教到科技,香山人第一时间接触到了西方理念,香山文化的兼容性亦随之提高。从明代开始,香山人已开始向海外移民,谋生创业,在清朝乾隆和嘉兴年间更是极盛。到了近现代,此风更盛,1920 年的《良都竹秀园月报》曾有记载,“男则有出洋之举,女则有辍耕之行”,有趣的是,这个“竹秀园”即如今的中山市南区竹秀园村,我曾多次寻访此村,它与中国现代百货业息息相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四大百货公司”名噪一时,分别为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这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始人都是香山人,先施公司的创始人马应彪是现中山市南区沙涌村人,新新公司的创始人李煜堂、李敏周叔侄为香山石岐镇(今中山石岐区)人,大新公司的创始人蔡兴、蔡昌则来自现属珠海的金鼎镇下棚村。至于永安公司的创始人郭乐、郭泉、郭葵、郭浩和郭顺几兄弟,则是中山南区竹秀园村人。这四大百货的创始人早年都曾远赴海外谋生,经打拼后成为侨商,再回国创业。

四大百货源出香山,一直是近现代学界的“热门话题”,它并非偶然,而是香山地区本身敞开怀抱,让多元文化得以交汇的结果。此外,读洋学堂、出国留学,以及这“买办之乡”所诞生的一批又一批洋买办,都在使香山接受、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传至海外。1840 年后,国门被强行打开,通商口岸日多,香山人一度在各种洋行商号中占据了八成位置。后来的近代民族工业,香山人地位也极其重要,甚至可以说,近代工业一度是“香山人执掌的工业”。

香山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无疑深刻影响着近现代中国。有趣的是,那些闻名遐迩的香山人,那些在各个领域中“敢为天下先”的香山人,其

原籍所在地都很值得研究。

比如郑观应，这位近代思想家是中国思想界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盛世危言》确立了“富强救国”的启蒙思想体系，提出立宪，也提出了发展教育和促进工商，经济上“借商以强国”，军事上发展陆军与海军。他生于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这里位于中山南部，与珠海极近，也是中山所辖镇区中与澳门相距最近的镇之一，他本人也曾长期居留于澳门。并非巧合的是，孙中山的故乡，即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同样临近珠海，亦同样是中山辖区内与澳门相距最近的镇之一。翠亨村与珠海唐家湾相接，这个原称唐家镇的唐家湾，与近代商业渊源极深。容闳在马礼逊学堂的同学中，就有一位来自唐家的唐廷枢，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怡和洋行买办、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也正是唐家，为容闳“贡献”了数名留美幼童，其中包括日后担任民国首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以及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首任校长唐国安。

比上述几个村落更为靠近澳门的是容闳的故乡——珠海南屏村，与容闳一起赴美的黄胜也来自这个村。大买办徐润则生于与澳门一线之隔的珠海拱北区北岭村，即如今的拱北口岸附近，他不仅仅是当年四大买办家族之一的徐家掌舵人，也是 20 世纪初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商、最大的地产商和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创始人。

距离西化的澳门越近，涌现出的各行业各领域“先行者”就越多，这无疑是香山文化开放包容的一个证明。

从洋学堂到海归

正是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和第一所西式大

学。1569 年 ,葡萄牙人卡内罗创建圣拉斐尔西医院 ,又称白马行医院 ,为中国第一所西医院 ;1594 年 ,意大利人范利安在圣保禄大教堂 (此教堂后遭焚毁 ,遗址即“大三巴”)东侧建圣保禄学院 ,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

1645 年 ,12 岁的澳门人郑玛诺随神父赴罗马深造 。当时路途艰难 ,遍布险阻 ,他们历时 5 年才抵达罗马 ,毕业后郑玛诺在欧洲各地任教 ,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法。1671 年 ,38 岁的他返回澳门 ,同年赴京为朝廷任职 ,可惜因患肺病 ,两年后便辞世。在郑玛诺之后 ,澳门教区又陆续选拔人员赴欧留学 ,培养在远东地区的传教人才。据载 ,传教士马国贤在返回意大利后 ,于 1732 年创办了一所直属罗马教廷的中国学院 ,学院至 1868 年停办 ,据说在这 136 年间 ,就读的中国学生达 106 人。

到了近代 ,澳门开始出现洋学堂 ,为纪念著名传教士马礼逊而成立的马礼逊学堂 ,就是近代中国第一所传播西学的洋学堂 。这间学校主要招收家庭贫困的孩子以及流浪儿 ,容闳、黄宽和黄胜均是其学生。其中 ,容闳、黄胜的故乡南屏与澳门仅数公里之遥 。

关于容闳等三人的赴美留学 ,已不需多说。唯一可在这里再次强调的是 ,在那时的中国 ,出国留学的尝鲜者几乎只会出现在香山地区 ,因为那是唯一开放 ,可以对西方文化耳濡目染的地方 。

在耶鲁大学毕业后的容闳 ,经过多年努力 ,终于在 1871 年促成了首批幼童赴美 ,它开启了近代中国官派留学的先河 。

招生时 ,容闳一度遇上麻烦。当时的国人大多不愿出国 ,甚至将国外视为蛮荒吃人之地 ,对海外稍有了解的 ,只有广东的沿海区域 ,其中又以香山地区和香港为最。而且 ,当时国内仅有南方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才有中英文教学 ,要寻找有一定中英文基础的孩子 ,那里几乎是唯一“产地”。也正因此 ,报名者多半是广东人 ,其中又以香山籍为最多。

尽管这几批留美学生日后被清政府强行提前召回，留学生涯戛然而止，但成才率极高。经历过留洋、见识了各种先进政治文明的他们，虽与传统官吏的思维格格不入，可在那个社会各层面激荡变幻的年代里，他们无疑改变了历史。

如今说起那几批留美幼童，名气最大的无疑是詹天佑。可若说改写留学史乃至改变历史，最受瞩目者当属唐国安。1907 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拟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当时在外务部任职的唐国安参与此事，促成中美双方于 1908 年达成协议，商定从 1909 年起，每年用退款遣派 100 名学生赴美学习，从第 5 年起减为每年不少于 50 名，依此循进，至 1940 年结束，期限 32 年。此后，外务部和学部共建游美学务处，全面负责游学事宜，唐国安任全职会办，承担了游美学务处的日常主要工作，如招生等。

庚子赔款留美生成才率极高，而且对近代中国影响极大。仅仅从教育界而论，便有执掌清华多年的梅贻琦，先后执掌北大的蒋梦麟和胡适，执掌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执掌东南大学的邹秉文，在他们治下的大学中又培养了多少民国精英，已不可计数。在这些庚款留美生中，也不乏香山人的身影，如首批学生中的唐悦良，便来自珠海唐家村，后成为外交家，曾任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部长、常任次长。

在庚款留美之前，北洋大学堂已开始选拔毕业生赴美深造。如 1906 年，袁世凯饬学堂会同津海关道遴选学生 35 名，派赴美国留学，其中 19 名学生的学费是由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三校提供；次年，又有法律科学生 11 人续派赴美留学。值得一提的是，在 1903 年到 1909 年间，极力促成此事的几任校长竟然全是当年容闳选拔的留美幼童！而且，除了梁敦彦来自广东顺德外，其他 3 人均是香山人，其中唐绍仪和梁

如浩都来自珠海唐家村 ,蔡绍基的家乡则位于与澳门一线之隔的珠海拱北北岭村。

如果说容闳、黄宽和黄胜的赴美只是个开始 ,首批留美幼童则可算是开枝散叶 ,唐国安、唐绍仪和梁如浩等人的努力 ,则改写了一代中国人的求学之路。而近代中国的巨变 ,恰恰与留学变迁息息相关。

胆量越来越大、越来越渴望开眼看世界的香山人 ,早早便不再满足于官派留学的那些有限名额 ,自费留学者众多。在这些自费生中 ,除了孙中山以及众多后来成为革命党人的青年外 ,还有不少自学成才、回国后卓有贡献的学子 ,如今中山小榄人钟荣光 ,1914 年赴美 ,回国后毕生献身于教育事业 ,是岭南大学 (中山大学前身)的首位华人校长。

结　语

海洋文化意味着开放 ,尤其是近代以来 ,世界文明进程总以海洋文化为起点 ,由 14 世纪的地中海开始 ,向世界扩展 ,直至今日。在这一大环境下 ,香山乃至整个广东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窗口 ,且英才辈出 ,绝非偶然。即使到了今天 ,我们仍不得不承认 :在这个国度 ,最能敞开怀抱接受外来事物的依旧是南粤一地 。

唐绍仪:民国首任总理

1911年12月初,南北议和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厅展开,南方革命军的代表为伍廷芳,北方清廷的代表为唐绍仪。1911年12月31日,双方举行第五次会谈,唐绍仪对伍廷芳表示:“我要辞职。”

次日,即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也向袁世凯提出辞职。1月2日,袁世凯以唐绍仪越权签订合约为由,撤销其全权代表资格,亲自与伍廷芳进行电文谈判。

中年后开始专注收集史料、著有《革命逸史》的资深革命党人冯自由曾这样评价那时的唐绍仪:“名为清廷代表,实则事事为革命军设计。”

而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竟擅自越权,签下了关于停战退兵、清帝退位和召开国民会议等一系列决议,实在是出乎意料。要知道,这是他一手提拔的死党啊!

袁世凯并不知道,或者他早已知道却不愿承认:他引为臂膀的邮传大臣唐绍仪,内心一直倾向共和制,而且这种倾向在年少时便已萌发。

7年留美影响一生

1874年,唐绍仪作为官派留学生赴美留学,时年12岁。7年后,清

政府强行召回留美学生 ,唐绍仪被迫回国。

其父唐永大 ,号巨川 ,是个茶叶商 ,生意做得挺大 ,但在以“买办之乡”著称的香山唐家 ,还算不得什么知名人物。当时 ,唐家最著名的人物是容闳在马礼逊学堂读书时的同学唐廷枢 ,这位洋务干将是唐绍仪的族叔。唐永大在生意中常与洋人打交道 ,与唐家的大多数子弟一样 ,他也推崇洋务 ,所以一直将孩子带在身边 ,让他们在上海读书。容闳选拔留美幼童时 ,唐绍仪又得唐廷枢推荐 ,并在考试中过关 ,得以入选。

这 7 年留学时光 ,恰恰使唐绍仪从一个少年变成青年 。与众多同学一样 ,他也认为长衫马褂难看不雅 ,改穿西装 ,又因寄宿在美国家庭 ,他也参与过祈祷 ,甚至还剪去了辫子。

留美学生们恰恰是因为改装剪辫与宗教问题等“不端行为”而遭强行召回的。被召回后 ,他们一度备受歧视和欺凌 ,在“工作分配”上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专业也不对口。唐绍仪最初只是担任涉外小吏 ,次年前往朝鲜 ,在海关税务司任帮办穆麟德 (德国人)的秘书。

他与袁世凯的“铁哥们儿”交情 ,恰恰在朝鲜建立。1884 年朝鲜甲申政变期间 ,有朝鲜亲华高官被亲日派打伤 ,在海关公署暂避。时年 26 岁的袁世凯前往探望时 ,结识了在门口守卫的唐绍仪。当时的唐绍仪才 22 岁 ,身材高大 ,相貌堂堂 ,一身戎装持枪而立 ,大受袁世凯欣赏。二人就此攀谈 ,袁世凯发现这个比自己小 4 岁的小伙子竟然有多年留洋经历。袁世凯并非科举出身 ,升迁全靠自己摸爬滚打 ,亦非迂腐之士 ,反倒是那个年代里少有的实用主义者 ,对欧美政治制度有了解与学习的欲望 ,唐绍仪向他推荐了不少欧美政经类书籍 ,也介绍了不少美国风土人情和政治制度 ,二人就此结为知交 ,袁世凯还上奏朝廷 ,保唐绍仪为驻朝鲜交涉通商书记官 ,成了自己的左膀右臂。10 年后 ,甲午战争前夕 ,有风声说日

本人决心刺杀袁世凯这位中方驻朝的实力派人物,唐绍仪亲自出马,带着两支枪、两把刀和两匹马,连夜护送袁世凯登上英国军舰。

与袁世凯的这层交情,加上李鸿章的赏识和本人的精明干练,还有多年留洋带来的语言优势和开阔视野,唐绍仪在官场上扶摇直上,33岁时出任中国驻朝鲜总领事,其后又随改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回家乡任职,之后又随出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赴鲁,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中负责外交事宜,处理妥当,使得袁世凯不致得罪洋人,在之后的官场大洗牌中亦安然无恙。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唐绍仪则出任天津海关道。这个位置按如今标准相当于厅级,但却是当年大清国的几大著名肥缺之一。在此任上,唐绍仪干得十分出色,不仅关税白银倍增,而且还先后从洋人手中收回了天津和秦皇岛口岸的管理权,他也因此再度升迁。

1909年,袁世凯在权力斗争中选择暂避,开缺回乡隐居。其亲信也遭大清洗,唐绍仪选择主动辞职,隐居天津。直到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山,唐绍仪才重返官场,在袁世凯内阁中任邮传大臣——值得一提的是,在几个月之前,摄政王载沣曾召他出任级别相同的邮传部尚书,他却拒绝。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共同进退,使得袁世凯很难接受唐绍仪在和谈中的举动。但如果考虑到唐绍仪的留洋背景和一直以来的抱负,就知道这一切其实都是意料中之事——在政治伙伴和政治理想中,他一定会选择后者。

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唐绍仪爱国,但爱国不等于爱政府,他希望强国,但不一定依靠政府强国。

这位晚清少有的政治、外交干才,其实已为清廷出力不少。1904年,

英军侵入拉萨 ,签订《拉萨条约》。清廷慌乱到次年才选中唐绍仪前往西藏 ,与英军交涉。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唐绍仪的助手是梁士诒 ,此人也是晚清外交和经济的干才。据载 ,唐绍仪当时一口流利英文 ,对英国政体、风貌和礼节了如指掌 ,绝非那些闭塞的一般清廷官僚可比 ,立刻赢得了对方的尊重。在谈判中 ,唐绍仪坚持主权原则不放 ,促成了中英双方在北京的二次谈判。在 1906 年的第二次谈判中 ,唐绍仪再次担任专使 ,与英方最终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也是在 1906 年 ,他出任新成立的全国税务总署会办 ,主持实际工作 ,以收回税权为头号目标。他还担任铁路总公司督办 ,力争清廷在外资铁路中的管理权 ,并大量挽回铁路借款中的损失。他也实际主持(奕劻是全权大臣 ,但仅出席谈判一次)了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

在积弱的晚清 ,唐绍仪的强硬与干练显然是个异数。但他显然是个实用主义者 ,虽然尽心尽力辅佐大清 ,但当共和机会来临时 ,他必不会错过。

在袁世凯的心腹班底中 ,持此想法的绝非唐绍仪一人。袁世凯本人就是晚清极其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用人不拘一格 ,心腹班底中有不少干才 ,其中泰半是当年的留美幼童 ,除唐绍仪外 ,还有外务大臣梁敦彦、邮传部副大臣梁如浩、驻英国公使刘玉麟、驻德国公使梁诚 ,以及心腹幕僚蔡廷干和蔡绍基等。

作为改良派 ,他们不放弃清廷的立宪机会 ,但面对革命 ,他们亦心生同情 ,有“合作”之意。

也正因此 ,唐绍仪在前往上海和谈的火车上便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此举不仅仅惊世骇俗 ,也表示了强烈的倾向。而在如今所能见到的和谈旧照片上 ,我们也能看到唐绍仪的着装。他不穿官服 ,只穿西装 ,反倒是

南方革命党的谈判代表伍廷芳穿着中式长袍。双方在和谈中也甚为投契,没有一丝剑拔弩张、两军对垒的意味,简直成了关于民主共和的研讨会!

与唐绍仪在不同地点"相呼应"的还有其他几位留美幼童:在海军中供职的吴应科和宋文翙已随海军起义,驻德公使梁诚和驻英公使刘玉麟发电报敦促清廷承认共和,唐元湛与温秉忠更已供职于南京临时政府,前者是电报局局长,后者担任外事官员。

与袁世凯的决裂

在南北和谈中有着明显的倾向性,招致清廷皇亲贵胄们顿足捶胸大骂"白眼狼"的唐绍仪,成了民国首任国务总理。

显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构想中,让唐绍仪组阁仍是最理想的选择。毕竟,虽然唐绍仪在担任和谈代表时屡屡先斩后奏,陷他于被动,但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的过程中,唐绍仪牵线搭桥,出力不少,是袁世凯能最终就任大总统的一大功臣,可见关键时刻唐绍仪仍是好兄弟,袁世凯不信任他,还能信谁呢?甚至还有史家认为,唐绍仪被袁世凯罢去和议代表之职,有苦肉计之嫌,是在借机向南方革命党人施压,而唐绍仪在和谈中虽然倾向共和,但其实是在弃清室保袁世凯,他的拥立共和,本质是"拥袁共和",是让袁世凯做总统的共和。

但不管怎样,唐绍仪的举动再一次让袁世凯跌了眼镜。

在选择首任总理时,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意见惊人一致。黄兴就曾说:"君(指唐绍仪)若迟来数日,武昌势必不守。"唐绍仪也与革命党人相知相惜,还加入了同盟会(也有一种说法,指当时南方革命党提出袁世凯

担任总统后 ,内阁总理须由同盟会会员担任)。他的介绍人是黄兴和蔡元培 ,监誓人则是孙中山 ,规格极高。唐绍仪也投桃报李 ,延揽大量同盟会员入阁担任总长 ,使得这届内阁号称“同盟会中心内阁”。

以唐绍仪的才干 ,加上他对《临时约法》的遵守 ,首任内阁大有新气象。但袁世凯却对此极不习惯 :自己身为大总统 ,怎可被内阁掣肘? 无论是人事权 ,还是财政权 ,袁世凯都想牢牢抓在手里 ,可唐绍仪却主张“民国用人 ,务贵新不贵旧”,拒绝让袁系的内务总长赵秉钧安排北洋旧人入阁。1912 年 6 月初 ,直隶省议会选举同盟会会员王芝祥为直隶都督 ,袁世凯拒绝 ,置总理附署权于不顾 ,直接委任他人。唐绍仪对这种破坏《临时约法》的行为无法接受 ,于 6 月 15 日愤而辞职 ,任期仅 3 个月。

此后的唐绍仪 ,曾寓居天津 ,办过报 ;曾混迹上海滩 ,从事保险业 ,创建金星人寿 ;还曾上书劝袁世凯辞职 ,未被理睬。他也曾热心教育 ,是复旦大学的创办者之一 ,担任过校主席。1917 年 ,他南下支持“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 。1919 年 2 月 ,他又一次在上海参与南北和谈 ,但这次他代表的是南方 ,对手换成了代表北洋政府的朱启钤。

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辛亥革命后 ,唐绍仪与老朋友袁世凯越来越远 ,却与孙中山越走越近。他极为推崇孙中山 ,认为民主共和才是中国出路。但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 ,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有一个由亲密到疏远的过程 。当孙中山在 1920 年重建军政府时 ,他认为总统制与他期望的责任内阁制不符 ,易产生独裁 ,于是拒绝出任军政府职务 ,再次避居上海。

其实,每每读民国史,我都感慨于“原则”二字。所谓原则,就是底线。在民国的动荡时代,各方势力角力,风派人物不少,各种思潮涌入,立场常变之人也不少,梁启超还有“不惜以今日之我推翻昨日之我”的说法,但很多政客都有一条底线,他们可以为了理想改换阵营,却不会为了立足于世而放弃理想。这之间的种种,其实不能仅以对错二字来界定。

唐绍仪亦是如此。他虽争议甚多,却始终恪守共和底线。

他在晚清为官时,一方面雷厉风行,魄力十足,另一方面却也豪奢挥霍,《民立报》曾指他“日食非百金不乐,一切举动,皆摹仿西洋豪华,非中国诸王大臣所可及。唯对于部中司员异常刻薄,闻近日又有裁员减薪之举,邮部之司员无不怨形于色。夫减之诚是,然唐自待亦太过也”,还说“唐之为人,京官排挤者甚多”。想来,他那让人看不过眼的“豪奢”也是美式风格的吧,身为大清官员却“摹仿西洋豪华”,这做派自然很难令其他同僚看得顺眼——即使他的同僚们同样贪腐甚至比他更加贪腐。

可这派头若与他的底线相碰撞,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比如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各政府机关进驻,急需划地建房,使得南京的地产业变得十分红火。有人便打起了赈灾款的主意,找到时为中央赈灾委员会委员的唐绍仪,希望他挪用赈灾款,合作炒地炒房,大赚一笔,唐绍仪严词拒绝。又比如他在家乡中山县(即原来的香山县,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改名中山县)任县长时,便颇清廉,革除各种官场陋习。

赴任中山县县长之前的唐绍仪,其实挂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头衔,虽然都是挂名而无实权,但以他的资历和影响力,在南京过优裕生活是等闲事。可他却放着好日子不过,偏要回家乡做个县长。

早在1929年,孙科和吴铁城(有资料误作“吴际城”,实无此人)就向

南京政府提议 ,将孙中山故乡中山县升格为全国模范县 ,并决定成立“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督导县政府实施训政。提议的这两位都是中山本地人 ,在中山留痕颇多。孙科是孙中山之子 ,1936 年 ,他主持筹建了中山纪念中学 ,位于中山南朗镇翠亨村孙中山故居背后 ,学校占地极广 ,景致如画 ,亦是我的母校。吴铁城是老同盟会员 ,早年参加辛亥革命 ,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立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等要职 ,是蒋介石的心腹。1921 年 ,吴铁城曾回香山县参加竞选 ,当选为香山首位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民选县长。在县长任上 ,他起用多位留美学生 ,担任警察局长和财政局长之类的要职 ,还任命一位女性为教育局长 ,开中国妇女担任行政主官的先例。如今中山旧城区(俗称“石岐”)的整体格局都为吴铁城任期内所兴建 ,城区还有一处算是纪念他的“铁城酒店”。

这“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的主席 ,就是唐绍仪。他在就职致辞中表示 ,要“通过二十五年的时间 ,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1931 年 ,他更是不再满足于在南京坐而论道 ,而是亲赴中山 ,担任县长一职。

毛泽东曾以他为例 ,说旧社会的前任总理能去当县长 ,所以干部要能上能下。也有人认为唐绍仪屈尊县长一职是因为不满在南京挂闲职 ,所以才在一个小县城里“找存在感”,其实也颇有些恶意揣测。从唐绍仪任县长后的种种举动而言 ,他内心中最重要的无非两个词 :思乡、共和。

辗转一生后 ,他希望建设家乡 ,如果家乡能成为一块“共和试验田”,那就更好。因此 ,虽然“训政”充其量只能算是为共和做准备 ,他也乐意以古稀之躯投入其中。

与民共乐

在唐县长的建设计划里,包括了基建、发展实业以及农渔业,还有乡村建设。他还提出开辟家乡唐家村免税商港,引进外资。他亦编印了《中山县发展大纲》,广泛散发至港澳及海外,以筹集侨胞募捐。这位“布衣县长”政声不错,两年后去职。

其实,在兴建家乡之前,他就已曾衣锦还乡。据载,1910 年、1914 年和 1921 年,他曾三次返乡居住,还兴建了私家园林“小玲珑山馆”和别墅“望慈山房”。

在他担任县长期间,将小玲珑山馆这一私家园林扩建,变成了公园,并改名为“共乐园”,赠予乡民委员会,供乡民们使用。1982 年,公园再次扩建,改名为“唐家湾公园”。

据说,唐绍仪为防自己死后,家人反悔而将公园收回,还专门写了赠送书,命令妻室子女一一签字。

我曾去过这座公园,它位于唐家湾鹅岭北麓的两座山冈上,景色雅致。近百年来,先有连年战乱,后有“破四旧”等政治运动,晚清和民国时代的私家园林多已被毁,这座园子算是难得幸存的岭南园林代表。公园大门有石牌坊,上刻“共乐园”三字,两侧则有“百年树人十年树木”,“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对联,为汪精卫所书。园内有不少珍奇树木,可为数最多的却是岭南常见的荔枝,唐绍仪嗜荔枝,广植 500 多棵。

园内建筑兼具中西特色,这显然与唐绍仪的经历有关。最抢眼的要算是观星阁,这是唐绍仪的私人天文台,据说也是国内唯一的私人天文台。楼高两层,一楼是图书室与客厅,二楼呈圆柱形,天台有城垛形砖

柱 ,以锌管相连。院内还有一处平房 ,称“田园别墅” ,原为唐绍仪会客时所用 ,还有他手书的对联 ,“开门任便来宾客 ,看竹何须问主人” ,如今已成了唐绍仪史料展览馆。

还有一间暖房 ,设有壁炉 ,是典型美式风格 ,这在从不见雪的岭南出现 ,令人诧异。原来 ,这是唐绍仪为接待美国第 31 任总统胡佛所建。他与胡佛是同学 ,也曾是同事 ,私交甚笃 ,胡佛到访前 ,他模仿幼时在美国留学时的宿舍风格建此暖房 ,既让胡佛有宾至如归之感 ,也满足自己的回忆。

他与胡佛有一桩逸事。早在 1900 年 ,义和团起事 ,与洋人开战。当时 ,唐绍仪的家眷正在天津英租界 ,胡佛则在中国做采矿工程师 ,也躲进英租界。战事激烈 ,人们不免动荡流离 ,有日胡佛在街上救了一个迷路的小女孩 ,抱进避难所守护 ,这个女孩便是唐绍仪的女儿 ,也是后来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的夫人。一战后 ,时任美国粮食部长的胡佛曾参加一个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宴会 ,公使夫人向他走来 ,说 :“我以前见过你 ,当年天津被围的时候 ,你穿过大街救出来的就是我。”胡佛参加总统大选时 ,曾遭对手攻击 ,指他当年曾在中国以非法手段敛财 ,唐绍仪则以胡佛在华期间的中国外事官员身份发来电报 ,力证其清白 ,使得胡佛渡过险关 ,最终当选。1953 年 ,胡佛曾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早已去世的唐绍仪 ,指他“为人正直 ,有才干 ,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 。

而那名为“望慈山房”的别墅 ,则顾名思义 ,是唐绍仪为纪念母亲所建。这处房子与唐绍仪母亲的坟相对 ,房前还有平台 ,唐绍仪担任县长时 ,这里就是县政府办公地。他常常站在平台上望向母亲的坟 ,“望慈”二字便由此而来。如今 ,此楼虽挂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 ,但据一位村中老人说 ,原楼其实已经不存 ,变成了一栋两层红砖房 ,是唐家中学

的办公楼,楼前平台也成了老人活动中心。

唐绍仪故居如今仍存,位于唐家湾山房路 99 号。它与旁边的 93、95 和 97 号连成一片,组成了“井”字形的唐绍仪祖屋。故居分为前后两座,后面为唐绍仪的父亲唐永大于清朝所建,前半部分则是唐绍仪于 1929 年所扩建。土改后,这里曾分给村民居住,至 1986 年才归还唐家后人。但因无人打理修缮,备受虫害,损坏严重,直到前几年,当地政府才对其进行了整修,外墙粉刷一新,据说里面的屋梁和柱子也已换掉。

好在,大厅正中的那根赭红色柱子,据说并未换掉。中国建筑一向讲究风水,大厅正中竖根柱子,实在有些碍眼。之所以有此柱,是因为他的第二个妻子朝鲜郑氏在产下儿子唐柱后,坐月子期间因吃螃蟹而中毒身亡,唐绍仪为悼念爱妻,又因儿子取名“唐柱”,便在厅中竖一柱。

想来,唐绍仪对母亲和妻子的怀缅,以及他甘愿回乡做个县长,都印证了他是个重感情的人。不过,以他的留学背景和洋化,可能从未想过“叶落归根”吧,所以他后来客居上海。又或者,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但世事动荡,终未给他这样的机会。

1938 年 9 月,他被刺杀于上海寓所,且是被斧头劈死,死状极惨。

“抗战时期”唐绍仪将大部分家人安排至香港,自己则住进了大女婿诸昌年的家,即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 18 号。

“抗战时期”他曾发表过支持抗战的言论,冯自由甚至认为唐绍仪是“卢沟桥事变”后“主张抗战最力之一人”。但他的滞留上海,也让国民党方面极不放心——他资历深、名气大、人脉广,万一下水投敌做了汉奸,影响会极大。而且,日本方面事实上也看中了他,曾有一个“南唐北吴”的计划,打算组建一个全国性的汉奸政权,以唐绍仪和吴佩孚为正副总统的人选。土肥原贤二还为此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拉

唐绍仪和吴佩孚二人下水。

吴佩孚铮铮铁骨 ,不为所动 ,唐绍仪亦未有投敌表示。但唐绍仪的一些亲友 ,如三女婿岑德广等人 ,却打着他的旗号与日方勾结 ,还起草了《倒蒋方案》、《时局声明》等大量卖国文件。而且 ,唐绍仪本人的态度也引起了很多人的猜疑。当时 ,广州抗敌后援会曾致电唐绍仪 ,希望他尽快南下 ,不要再留在上海这一是非之地 ,广州各界人士还曾为此集结 ,联合发电报给唐绍仪 ,电文中有“请公善保晚节 ,否则自堕名誉 ,遗臭万年”之语 ,还送上差旅费 2 万元 ,唐绍仪并不理睬 ,并退还旅费。

如今看来 ,唐绍仪倒并非有意投敌 ,但他身处孤岛上海 ,以他一生的风派处事 ,不愿得罪日本人也属正常。但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唐绍仪搭上的是自己的性命。

1938 年 9 月 ,土肥原贤二亲赴上海拜访唐绍仪 ,在唐的寓所中谈了一个上午。不久后 ,唐绍仪打算购置一个古董花瓶 ,请古董店派人送至家中 ,正当他低头品鉴花瓶时 ,被假冒店员的杀手以利斧猛砍后颈 ,杀手随后离去。当仆人发现时 ,已施救不及。

凶手到底是谁? 此事已成历史悬案 ,史学界说法不一 ,大致有三种 :一种指他已成汉奸 ,因此遭国民政府锄奸 ;一种指他因被怀疑是汉奸 ,被国民政府误杀 ;还有一种则指他拒绝土肥原贤二的拉拢 ,被日方谋杀。

综合各种史料来看 ,第三种说法最站不住脚 ,很多学者曾去日本寻找相关资料 ,均无线索。至于前两种 ,第一种的“已成汉奸”论曾是主流 ,认为唐绍仪晚节不保 ,但根据近年来的研究 ,唐绍仪并无任何卖国行为 ,第二种说法又占上风。

此外 ,还有一家之言 :1964 年 ,高承元曾在《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三辑发表《唐绍仪被刺原因之商榷》,指唐绍仪并无勾结日寇行为 ,但当时英

法美三国认为日本侵犯其在华利益,有意组建中立政府,由亲美的唐绍仪主持,此事遭国民政府所忌,将其暗杀。

不管内情如何,唐绍仪之死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国民党元老大为不满,认为此事为军统所为,但军统手上并无唐绍仪下水投敌的证据,此行径是草菅人命。1938 年 10 月 5 日,国民政府方面以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名义,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 5000 元,并令将唐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也称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

一生为留学

以留学美国奠定一生之基础的唐绍仪,对留学事业的推动不遗余力。他曾任北洋大学堂督办,与当年留美的同学蔡绍基等人一起筹划送学生出国留学事宜,并于 1906 年促成 30 余名学生留洋。

后来的庚子赔款留美计划中,唐绍仪亦从中谋划。当时,中美两国因庚子赔款退款用途一事争得不可开交,美国希望以退款来培养留学生,清政府则认为"目前中国待办要政极多,正虑无款可筹",希望将这笔钱用于他途。唐绍仪以专使身份出使美国,向美方致谢退款一事,他在此期间积极运作,终于说服清政府同意将退款用于助学。1909 年,清政府颁布《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附设"游美肄业馆",正式启动庚款留美计划,日后大大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梅贻琦和胡适等人,都是庚款留美的受益者。

在这一批批留美学生中,自然也有不少是唐绍仪的同乡——香山人。比如珠海南溪人薛仙舟,他在唐绍仪的扶持下官费出国,于加利福

尼亚大学攻读经济学 ,后因回国图谋革命而一度被捕 ,官费留学一事也遭除名。但唐绍仪再次为他提供机会 ,帮他转至德国柏林帝国大学攻读银行经济 ,他亦渐渐放弃革命主张 ,希望以合作经济制度渐进改变社会 ,成为中国合作运动之父。还有唐绍仪的族孙唐宝潮 ,曾在唐绍仪引荐下赴法留学 ,后来又成功考入圣西尔军校骑兵系 ,成为法国陆军学校的第一位陆军留学生 ,也是近代中国陆军留学第一人。唐绍仪的四子八女 ,泰半也有留学经历。

这位跨越了晚清、北洋和国民政府三个时代的香山人 ,在政坛上起落浮沉 ,虽有得意之时 ,但终究抱负难伸。他一生所为 ,对日后影响最为深远的 ,或许正是对留学事业的推动。

唐国安:清华首任校长

1913年8月21日,唐国安在病榻上写下辞呈,由家人递交给外交部。辞呈中写道:“一年之间,精力耗于教务者半,耗于款务者亦半。入春以来,陡患心疾,比时轻旋时重,方冀霍然,讵料渐入膏肓,势将不起。校长职务重要,未可一日虚席,谨恳钧部免官另委贤员担任。惟国安有不得已于言者,查有留美文科硕士周诒春老成练达,学识兼优,自充任副校长以来,苦心孤诣,劳怨弗辞。国安虽病,该副校长兼理一切,颇能措置裕如。若以升任校长,必能胜任愉快……”

第二天下午,他因心脏病辞世。他早年是留美幼童,后为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首任校长,也是清华迄今为止唯一去世于任上的校长。

关于清华首任校长,其实有两种说法,除唐国安之外,还有周自齐一说。可以肯定的是,周自齐是清华的创建者。他早年于京师同文馆毕业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回国后任职外务部,1909年出任游美学务处总办(唐国安当时是他的副手,担任会办),组织筹建了清华学堂的前身游美肄业馆,出任监督。周自齐一生激荡,还是“二十一条”密约最先曝光者、中国植树节的最早呈准者,1922年3月署理国务总理,在徐世昌下台后代行总统职务,任期从当年6月2日至6月11日,是民国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

彼时 ,学校监督即实际上的一把手 ,相当于校长 ,这也是有些人称周自齐为清华首任校长的根源。但当时并无校长称谓 ,直到唐国安接任后 ,才效仿西方学制体例 ,改监督为校长 ,因此 ,也有许多人认为唐国安才是首任校长。

并不顺利的仕途

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 ,唐国安留学归来后的仕途并不顺利。

他是香山唐家湾鸡山村人 ,即大名鼎鼎的“唐家人”。唐家以出洋与买办著称 ,因为出洋者多 ,村人耳濡目染 ,视野远比内陆人开阔 ;因为买办多 ,但凡洋务 ,总少不了唐家人身影 ,甚至因此得入官场 ,扶摇直上。在那个年代里 ,“唐家人”这个身份显然占据了留学的先机。因在私塾中聪明勤奋 ,学业极优 ,他得到了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与李鸿章关系密切、与幼童出洋筹划者容闳亦是老同学的族叔唐廷枢举荐 ,参加留美幼童招考并成功考取。当 1881 年留美幼童被强行召回时 ,他正就读于耶鲁大学法律系。

回国后 ,与其他幼童一样 ,他只能由低做起 ,先后在开平煤矿、京奉铁路工作 ,后来前往上海梵王渡约翰书院任教。这间梵王渡约翰书院后来更名为圣约翰大学 ,赫赫有名。它位于苏州河之滨的万航渡路上 ,在国内首先引入近代体育项目 ,首次开展校际运动会 ,建设了全国首个高尔夫球场。如今 ,此校早已不存 ,在其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大学 ,校内那些西式建筑 ,多为旧时翻新而来。

也是在这里 ,他与比他小 19 岁的颜惠庆相识 ,并成为莫逆之交。当时的颜惠庆 ,才 20 多岁 ,其父颜永京牧师是约翰书院的首任院长。颜惠

庆年少聪慧,才情过人,日后成为外交家,还是大学者,主编了第一本完全由中国人编成的大型英汉辞典——《英汉双解标准大辞典》。相比颜惠庆的年少得意,唐国安则显得并不得志,他已年过 40,按那时的平均寿命,人生早已过半,却始终无用武之地。

不过,这并不妨碍唐国安与颜惠庆的相知与合作。20 世纪初,唐国安应聘上海《南方报》编辑,1905 年,他与颜惠庆合作开辟该报英文版,面向读者群是旅居上海的外国人。

据载,在该报英文版上,唐国安和颜惠庆每期都会撰写社论,抨击时局。唐国安曾指租界工部局的措施不利于中国居民,一些规定有悖法理,险些被驱逐出租界。不过也正因此,唐国安名声大噪。

只是,尽管这样的名声对一个报人极有帮助,但唐国安作为那个时代的精英,与他的众多同学一样,希望能够踏入仕途,为国效力。而以他的年纪,此时仍未入仕,前程其实已经渺茫。

当他等到这个机会时,已是 1907 年,此时的他 49 岁,已近知天命之年。至于职位,是外务部司员兼京奉铁道事,举荐他的是亲戚、同学唐绍仪,其后升任候补主事。1908 年秋,他曾得到一展才干的机会,可惜其当时的身份只是译员,跟着领导前往厦门,迎接美国太平洋舰队来访。而此次代表团的领导除时任军机大臣的毓朗之外,还有与唐国安同为留美幼童的梁敦彦——仕途也曾一度黯淡、算是大器晚成的梁敦彦,此时已是外务部尚书,位高权重,由此比较,更可看出唐国安仕途的不顺。

在这次迎接中,唐国安曾接待厦门当地的菲律宾华侨代表,对方表示他们在菲律宾备受刁难,回国探亲期限过短。唐国安随即向毓朗禀报,次日又陪毓朗前往鼓浪屿,向美国领事交涉,从而解决问题。

在万国禁烟会上的闪光

1909 年 ,唐国安又以外务部官员身份代表中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万国禁烟会(又称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代表团团长为时任两江总督的晚清能臣端方。当时的所谓“禁烟”,指禁鸦片烟 ,相当于如今的禁毒大会。会议由美国发起、中国承办 ,于当年 2 月 2 日至 26 日召开 ,共有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和荷兰等 13 国参加 ,这也被视作国际多边禁毒的开端 ,据说也是中国政府承办的第一次国际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会议背后有着唐国安默默的努力。此前 ,他曾担任环球学生会(即欧美同学会前身)董事、副会长 ,眼见鸦片肆虐 ,他就找到菲律宾的美国主教勃兰托 ,希望对方能向美国政府提议 ,由中美合作召开国际性禁烟大会。最终 ,美国政府同意了这一提议。

据载 ,会议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汇中饭店举行 ,因为当时的上海华界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地方可以举办这类会议。汇中饭店于 1908 年落成 ,即今和平饭店南楼。据说其五楼会议室是当时上海最现代化的会场 。

这次会议对中国显然有利 ,因为各国达成协议 ,将在租界配合清政府禁烟。不过 ,在会议上 ,清政府显然暴露了自己与时代的脱节。代表团团长端方虽是晚清难得的干才能臣 ,但确实不太懂得国际礼仪 ,随员们的准备亦不足。当时有报纸记载 ,端方的演讲稿皱皱巴巴 ,上面还有多处修改痕迹 ,讲话时见到不合心意的语句 ,还会停顿下来与身边随员耳语 ,临时修改。同时 ,作为东道主 ,他也没有出席当晚宴会。

但曾经留洋的唐国安却表现出色 ,作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 ,他依靠

着熟练英文、开阔视野和缜密逻辑,承担了报告、答疑、讨论和演讲等工作。在那个时代的清廷官员中,如此表现足以令外国人震惊。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他发表长篇英文演说,指出:“吸食鸦片是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的最紧急的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对于吸食鸦片的问题要解决,中国不但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也需要得到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合作”。在演说最后,他诚挚表示:“我们总不可忘记,有一项法则高于所有人类的法则,这项法则比所有的经济法则伟大,这项法则甚至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那就是永恒的上天的法则,这项法则按孔子的说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耶稣基督的说法是‘你应该爱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

这篇演说有理有据,引用大量数据资料,兼具逻辑性和文字美,加上他熟练的英文口语,打动了在场各国代表。演说全稿在《字林西报》上发表,《申报》称之为“一份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史学界也认为这是“中国禁毒史上的经典文献”。1911 年 12 月,他又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在荷兰海牙举办的第二届万国禁烟会议,力促《海牙禁毒公约》的诞生。

庚款留美的大功臣

与唐绍仪、梁敦彦等人相比,唐国安的仕途并不顺利,但在“庚款留美”一事上,他则出力最多,居功至伟,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1904 年,时任驻美公使的梁诚便与同为留美幼童的老同学、外交官欧阳庚等人一起,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就“庚子赔款”的归还和使用问题开始谈判。1907 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决定将部分赔款退还,由中

国政府遣派学生赴美留学。中国方面负责此事的外务部官员中 ,唐绍仪和唐国安等也是当年的留美幼童 ,与他们一起筹划此事的还有周自齐和颜惠庆。这几位曾经沐浴先进文化的开明官员 ,对此事的推动不遗余力 ,终于在 1908 年正式促成协议 ,与美国商定由 1909 年起 ,每年用退款遣派 100 名学生赴美学习 ,从第 5 年起减为每年不少于 50 名 ,依此循进 ,至 1940 年结束 ,期限 32 年。而代表中国政府在协议书上签字的同样是当年的留美幼童、时任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 。

协议签订后 ,外务部和学部共同组建游美学务处 ,时任外务部左丞左参的周自齐兼任总办。此外 ,外务部和学部还向清廷上奏 ,以“中西学问 ,均属精通 ,堪以派充该处会办”为由 ,推荐了两名会办 ,一位是学部员外郎范源濂 ,此人也是海归 ,不过是留日生 ,还有一位则是唐国安。其中 ,范源濂是兼职 ,而唐国安是全职 ,换言之 ,游美学务处的工作主要由其承担 ,因此 ,也有人称唐国安为坐办 。

唐国安一直对留学之事的推动极为热心 。早年在上海时 ,他就曾担任上海耶鲁大学校友分会董事和中国耶鲁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 ,1906 年担任环球中国学生会董事和副会长 ,还曾发表《劝告中国留学生》一文 ,疾呼救亡图存。他还认为 ,要反侵略反压迫 ,不能靠义愤 ,不能只靠喊口号 ,而是要奋发图强 ,而奋发的希望就在于留学生 ,依靠留学生改变政治和经济制度。承担游美学务处的工作 ,显然是他所期待的 。

1909 年 9 月初 ,游美学务处租赁北京东城侯位胡同的一所民房开始办公 ,明确部门职能、人员构成。据记载 ,除一位总办、两位会办外 ,还有庶务长、中文案、英文文案、庶务员、书记生等工作人员十余人。至于薪水 ,“总办 :外务部署左丞兼学部丞参上行走周自齐 ,每月薪水二百五十两(支半薪)。会办外务部候补主事唐国安 ,每月薪水四百两 ;学部员外

郎范源濂,每月薪水二百两(支半薪)",这也客观印证了唐国安在游美学务处的全职工作状态。

当月的4日到11日,游美学务处举行了第一次选拔留美生的考试。9月4日考国文,9月5日考英文和算学,此为初试,9月8日放初榜,录取68人。9月9日至11日为复试,考代数、几何、物理、化学、法文、德文、美国史、英国史、罗马史等十余科。与当年容闳选拔留美幼童、报名者稀少的窘境相比,此时的中国无疑更加开放,留洋成了许多人的愿望,据那年9月1日的《申报》报道,招生公布后,有近千人报名。而9月4日参与考试者也有600余人之多。

这次考试共录取47名学生,由清政府为之统一制备行装。1909年10月12日,唐国安亲自率领这批学生赴美,11月13日抵达华盛顿。由于此时美国学校学期已经过半,加之这批中国学生本身程度有差异,为了妥善安排,以求学生能迅速适应环境、跟上进度,唐国安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除两名优异学生直接进入大学学习外,其他学生均先进入补习学校,次年统一进入大学学习。也因此次护送,唐国安得以由考工司候补主事升任考工司主事。

1910年7月、1911年6月,清政府又进行了两次选拔考试,前一次录取学生70名,后一次录取63名,唐国安还另外保送幼童14名。

这三次考试均极严格,学生十分优秀,成才率高,后来活跃于民国各个领域,其中尤以教育界最为闪亮,教育包括执掌清华大学数十年的梅贻琦,缔造北大最辉煌时光的蒋梦麟和胡适,掌管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执掌东南大学的邹秉文等。可以说,这批学子深刻影响了未来数十年的中国,尽管这一切成果戛然而止,但短暂光辉至今仍令人怀想。胡适、赵元任和竺可桢都曾自称是"唐国安的弟子"。1909年至1918年,共有499名

学生成为庚款留美生 ,并因此带动其他各类官费留美和私人留美生的迅猛增加。1917 年 ,在读留美生达 1170 人 ,已回国留美生达 400 人。

与筛选留美生同时进行的 ,是肄业馆的筹办。据说 ,外务部最初希望效仿当年容闳的做法 ,招收 16 岁以下的幼童 ,从小赴美 ,在语言上可以达到“专精” ,但学部有不同意见 ,认为应招收 30 岁以上的学生出洋 ,否则“国学既乏根底 ,出洋实为耗费”。两部争执不下 ,最后只好折中 ,筹办游美肄业馆 ,即留美预备学校 ,让学生先在国内系统性学习 ,为赴美做好准备 ,馆址定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1909 年冬天对校内主要建筑进行修葺 ,增建清华学堂、同方部礼堂和洋教习住宅等。1911 年 ,外务部与学部一同奏请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 ,并紧急征召正在欧美出访的唐国安回国筹备此事。

1911 年 4 月 29 日 ,学校举办开学典礼 ,并正式宣布清华学堂成立 ,周自齐被任命为学堂监督 ,范源濂、唐国安为副监督 ,胡敦复受聘为教务长。

关于唐国安此时是否已经回国 ,资料不多 ,也不明确 ,算是一个小小“悬案”。有人称唐国安得到外务部和学部的紧急征召后 ,立刻回国进行筹备 ,并主持了 3 月 30 号的暂行开学典礼。但此说没有史料支撑 ,基本可判定为误。据载 ,在 4 月 29 日的正式开学典礼之前 ,学堂已于 3 月 30 日暂行开学。虽然只是暂行开学 ,但也有个小小的开学典礼 ,《吴宓日记》中有当日记载 :“十一时举行开学礼 ,职员、学生俱在。礼堂设于甲所 ,即高等科学生之住所也。管理人分学生为六排 ,依次入 ,行谒见至圣礼及谒见职员礼而退。旋由总办周、职员某某、监督范先后演说 ,言此校亦以退还之赔款成立 ,凡学生一切皆系官费云云。”

日记中的“总办周”和“监督范” ,即指周自齐和范源濂 ,却没有提到

唐国安。此外,在那段时间的吴宓日记里,大量记载了开学初的各种事宜,这位刚刚入学的学生,屡屡提及周自齐、颜惠庆、范源濂及教务长胡敦复和张伯苓等,偏偏没有提到唐国安。直到那年的 9 月中旬,吴宓日记里才出现了唐国安的名字。也正因此,很多人认为暂行开学初期,唐国安尚未回国,仍在美国考察。

还有人曾回忆,吴宓于 1911 年 2 月在北京参加中等科学生招生考试,考英文时"由唐介臣(即唐国安)先生读一段英文,考生跟着写录,唐老先生英文实在好,念得非常流利,只是苦了笔者跟不上……"此说法说明唐国安此时已在国内,但回忆或有偏差,不似日记为当日所记,采信度更高些。而且,清华的美籍校医博尔特曾在 1914 年回忆:"在开学前后的几个月里,学堂诸事漫无头绪,唐介臣先生正出访欧美,置身事外,实属无奈",也客观印证了《吴宓日记》中的记录。

但《吴宓日记》和博尔特的说法只是证明了 3 月底唐国安尚未回国,4 月 29 日的开学典礼上,他是否在场又成了"悬案"。有人称他已奉调回国,得以主持 4 月 29 日的正式开学典礼。还有人称唐国安此时仍未归来,还委托一位驻美使馆官员参加了开学典礼,并宣读其发言稿。

在 1910 年 7 月录取 70 名学生赴美的同时,游美学务处还录取了 143 名备取生,他们也是游美肄业馆的第一批学生。1911 年 6 月的第三次留美生考试时,唐国安所保送的 14 名幼童留学生均出自清华学堂的中等科。但当年武昌起义爆发,这 14 名幼童未能成行。直到 1914 年,他们中才有 10 人启程赴美。

武昌起义引发的动荡也波及了清华学堂。尽管唐国安一再要求学生安心学习,但清政府将学校经费挪用为军饷,还有些暴徒有意趁乱世浑水摸鱼,煽动民众,要洗劫学校,很多学生亦选择离校,学堂被迫于那

年的 11 月上旬关闭。

但是 ,唐国安并未放弃。他甚至主动购买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 ,扩充校警队伍 ,日夜巡逻 ,保护校内设施与财产 ,等待复校的那一天。他并未等太久 ,或许他也没有想到 ,告别晚清、步入民国后 ,才是他人生中最闪光的时刻——尽管 ,这时刻是那么短暂。

民国时代的唐国安

1911 年 12 月 ,唐国安作为代表团一员 ,随梁诚参加了在荷兰海牙举办的第二届万国禁烟大会。1912 年 3 月 ,他返回国内 ,此时 ,大清朝已经变成了民国。袁世凯任总统 ,担任国务总理的是唐国安的留美同学、同族兄弟唐绍仪。当初的晚清官员们大多摇身一变 ,成了民国新贵 ,之前与唐国安在游美学务处搭档的周自齐、范源濂 ,曾经在学务处代理工作的老友颜惠庆等均不例外。以唐国安与唐绍仪的关系 ,以及他的经历和能力 ,要在民国政府中混个官职 ,都可算是轻而易举 ,但他却主动要求留在清华 ,主持校务 ,筹划复校一事。他力促新政府的外交部和教育部 ,希望“撤裁学务处 ,归并学堂”。

1912 年 4 月 ,民国政府听从唐国安意见 ,正式取消游美学务部 ,原有的招生、遣派留学生等职权均划归清华学堂 ,唐国安任正监督。1912 年 5 月 ,清华学堂复校 ,10 月正式改名为清华学校 ,按西式风格 ,实行校长负责制 ,将监督一职改为校长 ,也正因此 ,人们称唐国安为清华首任校长。

此时 ,等待唐国安去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

首先是经费问题。作为用庚子赔款所建的学校 ,早年的清华学堂已经遭遇了款项不能及时发放的问题。武昌起义后 ,袁世凯为对付革命

军,又将赔款挪用为军饷,一度导致清华闭校。为了复校,唐国安被迫向华比银行、华俄银行和卡利基基金借贷,由于借贷到期,无从偿还,唐国安便向外交部递交报告,要求退回之前袁世凯挪用的款项,他在报告中称:“国安焦灼万分,屡从借款着想,四处磋商,乃无一路应手,彷徨无措计,唯有吁请我总、次长大力维持,咨询财政部,将所欠本学堂之款二十余万两,迅予拨发,以济急需。”此外,病中的他还表示庚子赔款既然已明确规定应用于办学,就应专款专用,不可随意挪用,何况“退行赔款六十余万美元全数到校,且尚有不敷之虞也”。经他多方奔走呼吁,款项终于退还,大部分用于归还华比银行、华俄银行和卡利基基金的所借债务,其余继续用于学校开支。

至于清华校园,亦是在唐国安时代迅速扩充。极具长远眼光的他,于 1913 年春向政府申请,将清华园西侧的近春园划拨学校使用,获准。此后,又向政府申请将近春园西侧的长春园东南隅划拨学校,是年冬天获准。尽管当二次扩充的批文下达时,唐国安已然去世,但短短一年间,清华校园已在他手上扩充了 480 亩,总计达 1200 亩。清华俗称的“四大建筑”,即科学馆、体育馆、图书馆和大礼堂,也是由唐国安最初计划兴建。

在学制方面,唐国安努力与美国教育体制靠拢,使得中国学生在清华学校毕业后,其学力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高年级,为留学提供了有效衔接。

信仰的魔力

在唐国安的生命中,有一个细节屡屡被我拾起,反复玩味。

这个细节见于教育家陈鹤琴的回忆。1911 年夏天 ,陈鹤琴插班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一年级 ,入学不久 ,便有一次祭孔活动 ,朝廷要求学堂的中国教员和学生都必须参加 ,行跪拜大礼。当时 ,已有不少学生信仰基督教 ,便不愿参加这类活动 ,设法躲避。后来陈鹤琴听说唐国安也借故不去。他后来还曾写道 :“学校监督是唐开森(即唐国安)先生。他是一个基督徒 ,待人非常诚恳 ,办事非常热心 ,视学生如子弟 ,看同事如朋友。可惜做了(校长)不久 ,就得病去世了 ,我们都觉得很悲痛 ,好像失掉了一个可爱的慈母。”

当年的留美幼童中 ,因在美国长期生活 ,耳濡目染 ,不少人都成了基督徒 ,而宗教信仰也成了留美幼童们被清政府提前强行召回的一大原因。但人在官场 ,不少事情都得违心而为 ,比如开会啊应酬啊 ,这些都是你再不喜欢也在所难免之事 ,祭孔一事 ,更是连请病假都得好好掂量一下的大活动 ,唐国安却选择了逃避 ,可见其信仰之虔诚。

当年的留美幼童中 ,不乏清室忠臣 ,比如后来被称为“帝制余孽”的梁敦彦。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似乎都对清政府相当淡漠 ,唐绍仪便是例子。这倒不是说他们不爱国 ,相反 ,他们多半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只是 ,在他们心里 ,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他们向往民主共和多于向往大清朝的“向天再借五百年”。而且 ,我私心认为 ,当年在学业未完成的情况下被强行召回 ,回国初期又如犯人般被关押 ,使得他们对清廷有所抵触。

所以 ,对于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 ,他们往往抱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当然 ,如果这个王朝敢于改革 ,放手一搏 ,他们亦会表示欢迎并全力配合 ,在晚清立宪的那几年中 ,留美幼童们的活跃便是明证。但当大清灭亡之际 ,他们的惋惜并不多于对民主共和的憧憬 。

相比之下 ,以教育为最高事业的唐国安 ,对清廷似乎更加淡漠些 ,对

信仰也更虔诚些。

我常常思考信仰与理想的关系,有信仰的人未必有理想,但有理想的人往往有信仰。也许,正因为有纯粹的信仰,才会超越那些世俗的东西吧,抛弃官场富贵荣辱,以育人为己任,不计得失。这种信仰,也许来自西方,也许来自传统,却在某一个年代尽皆消失,以至于有那么一代人,因为没有信仰,所以没有底线。

唐国安的信仰还给清华带来了另一样东西——外籍教师。校医博尔特曾经回忆,清华学堂聘请美国教师,恰恰是因为唐国安的建议。这位基督教徒委托美国基督教青年会选聘教师,最终组成 17 人的美籍教师团,另外还聘了一位体育指导。这批美籍教员在清华服务多年。

清华之变

唐国安带给清华的,并非只是土地、建筑、学制和洋教师。

1912 年 5 月 13 日,唐国安在校内发布公告,表示"本监督职务既紧,诸生功课亦多,而欲彼此常相会晤,不亦戛戛乎其难哉!然而师生之间,首重感情;教育之方,端赖道德。不有聚会之时,何由达此目的?爰定于每星期二下午七时至七时五十分,聚会一次。高等科在礼堂,中等科在食堂,由本监督演说一切道德,或宣布意见,届时诸生前往各处齐集勿误",以此活动增进师生交流。他还创办道德奖,奖励品行优秀的学生,并将全校学生分编成团,每团指定指导员,指导学生学业、就业等问题,可算是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的初始。

学生社团也在唐国安时代出现。早在清末,即 1911 年秋,学校便出现了学生社团。1912 年春又诞生了益智学会、达德励志会等。1912 年

秋 ,清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 ,开展读经、礼拜等活动 ,还创办校役补习学校和义务小学等 ,同年圣诞节还举办了数百人的庆祝大会。1913 年 ,学生社团越来越多 ,尤以演讲、读书和办杂志为多。

当年留美幼童普遍重视体育 ,在美国曾以棒球和赛艇扬名 ,唐国安执掌清华期间亦大力发展体育。当美籍体育指导到位后 ,就开始组织各类田径比赛和球赛。1912 年清华开始固定举行运动会 ,学生亦要参与五项运动考核。

当时 ,学校还有硬性固定 ,学生每日下午必须户外锻炼一小时 ,这一规定让我极感亲切 ,1993 年 ,我随父母从青岛返乡 ,在孙中山之子孙科于 1936 年所建的一所老学校里读书。当时 ,青岛的中小学多不重视体育课 (这也有学校占地普遍较小 ,活动区域狭窄的问题),回到中山 ,该校地处孙中山故居后 ,占地极广 ,仅篮球场就有数十个 ,学校亦有规定 ,除每日晨练外 ,下午 4 点半后学生自由运动 ,每日打篮球直到 6 点半 ,然后一年四季不论寒暑风雨无阻的露天冷水澡 ,都让我体格强健。可惜的是 ,这样的学校在当下中国终究是少数 ,多少学生因为 1000 米长跑考试叫苦连天?

1913 年春 ,清华派学生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远东运动会 ,唐国安亲自出任代表团团长 ,并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率团参加大型国际体育比赛的第一人。在比赛中 ,潘文炳夺得个人总分第一名、十项全能第一名、五项全能第二名、跳远第三名等成绩 ,其他参赛学生均得到名次。当时的校歌中亦有“In contests all of very sort ,We win Whatever we do ;Our athletes gain unbounded praise ,And number not a few .(各种比赛到处竞争 ,在我权操必胜。夺得锦标赢得英名 ,济济师师称盛。)”的句子。

这种全方位向美式教育靠拢的方式 ,使得外界啧啧称奇。哲学家罗

素就曾在参观后向唐国安表示:“你从美国移来了一所大学。”

1913 年夏,清华学校培养出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共有 16 人。这是一个成才率极其惊人的名单,每每读到这份名单,都让我感叹这所学校当年的荣光。在这批学生中,没有诞生什么官员,可当中的大多数都足以名留青史。他们是——

中国化学工业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即院士)、“侯氏制碱法”创始人侯德榜;中国植物病理学奠基人、中国真菌学创始人、中科院学部委员戴芳澜;国学大师、西洋文学专家、清华国学院创办者之一、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哲学家、逻辑学大家金岳霖;中国物理学宗师、清华百年四大哲人之一、中科院学部委员、桃李满天下的叶企孙;33 岁便辞世,却主持设计、建造了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的中国近现代建筑奠基人吕彦直;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创办基泰工程公司,主持设计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大楼,打破洋人对中国建筑设计市场垄断的建筑设计师关颂声;物理学家、曾任圣约翰大学首任校长的涂羽卿;曾任东吴大学校长的教育家杨永清。

这才是一所大学应有的荣光。

与此同时,唐国安亦不忘推动留学,每年都将毕业生送往美国留学,共送出两届 59 名学生。

身后事

1913 年春,唐国安被查出患有心脏病,其后发病三次。至 8 月 21 日,他向外务部递交“自请免官”报告,即本文开头的那篇辞呈。次日下午,他因心脏病突发,逝于清华园,时年 55 岁。

这位教育家并无子嗣 ,曾留下遗言 ,表示不留私产 ,全部财产待夫人过世后捐给慈善事业 ,藏书亦全部捐给清华图书馆。《共和西报》孔宪立曾撰写《前北京清华学校唐介臣先生传》,严桢将之译成中文 ,其中有“若先生者 ,乃真耶教之信徒、社会之义士、而中华民国之忠仆也。其赤诚为国大公无我之行 ,载之口碑 ,必能使四百兆同胞永矢勿忘吾中华民国有唐氏第一人”。后民国政府“国史馆”以《唐国安先生传略》之名 ,将此文收录于史。

1913 年 10 月 28 日 ,时任国务总理熊希龄、外交总长孙宝琦和教育总长汪大燮连衔呈文给大总统袁世凯 ,表示“查该前校长(指唐国安)在外务部任职多年 ,创办游美学务处暨清华学校。始终其事 ,擘画一切 ,毫无贻误。此次因病身故 ,实系积劳所致 ,现拟酌给一次恤金一千圆 ,以示优恤”。大总统批复“应即照准此批”。

1914 年 4 月 12 日 ,清华举行唐国安纪念铜牌揭幕典礼。典礼在前游美学务处大门(即今工字厅院)前举行 ,纪念铜牌置于大门门廊东侧壁上 ,由继任校长周诒春主持。经历多年沧桑后 ,据说此铜牌已然不见。同年 8 月 ,清华出版第一期英文版《清华年刊》,扉页上有“本刊献给刊清华学校已故校长唐介臣先生”字样。

如今 ,唐国安的功绩已得“组织认定” ,不再被湮没。加上历史名人早成重要资源 ,唐国安便成了红人。2010 年 9 月 ,珠海市唐国安纪念学校落成。2011 年 3 月 ,珠海市唐国安纪念馆落成并开馆。

这两个紧挨在一起的纪念项目都位于唐国安的故乡 ——唐家镇鸡山村 ,坐落于凤凰山脚下。也是在这里 ,还有迁址重建的唐国安故居。

我一向对“迁址重建”这样的做法不以为然。所谓故居 ,就是故人故地 ,“迁址重建”无异自欺欺人 ,怎么看都是假东西。

学校采用清华大学校园的三合院布局,纪念馆内则有唐国安的汉白玉雕像,设计倒是美观,不过我更喜欢的还是去鸡山村里走走,唐国安的故居原址就在村中。

村子不大,村口有旧时的石板桥。如今,村中如珠三角大多数村落一样,新楼旧宅交织。新楼多是典型的两三层农家房子,马赛克外墙,虽无美感可言,但也可体现村民生活的改善。旧宅多是青砖灰瓦的房子,其中不少大屋,我曾走访珠三角大量村落,这种掺杂着南洋风格的大屋,一看便知是华侨归乡所建。唐国安故居是一栋砖瓦平房,面积不大,仅有两间房,被村民的新楼所围绕,并不起眼,门口挂着"唐国安故居"的牌子。据载,这栋房子由唐国安父亲唐涛福于 1872 年所建,已有 140 年历史。若按常理,这种修建时便相对简单的房子,很难经得住岁月沧桑,向老村民请教,果不其然,如今我所见的这栋故居,其实是 1976 年经过整体修缮复原后的建筑。

让我疑惑的是,以唐国安的身份,虽非高官,但也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怎不衣锦还乡?为何故居仍是这栋仅仅两间的小房子?

唐国安绝非不重视家庭之人,早在当年赴美留学时,他就因家道中落,将政府发放的零用钱省下来,寄回家乡供家人使用。只是,他一向低调务实,又忙于教育,便无衣锦还乡的念头。担任清华校长期间,他也曾回乡省亲,有意修缮早已破旧的故居,但因公务繁忙作罢。

这位在近代留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其实无须豪华宅子来证明自己曾经的辉煌。

值得庆幸的是,唐国安故居与许多同时代的珠三角名人故居一样,并未在历次运动中遭遇灭顶之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反动人物"的故居被毁、墓地被掘,虽各地都有幸免于难者,但能普遍留存,保护多

于破坏的 ,唯有珠三角。

当我们慨叹那个疯狂年代导致农民淳朴不再时 ,也应庆幸一点 :传统在这个自古便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并未消失 ,人们对天地仍有敬畏之心 ,认天理不认政治 ,对集体癫狂有着天生的抵御能力 。

由此联想 ,当年广东人的大胆出洋 ,在海洋文明中领风气之先 ,近年来的开放务实 ,都并非偶然。

梁敦彦 :清朝最后一任外务大臣

1854 年 ,容闳于耶鲁大学毕业 ,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也是那一年 ,天地会在广东佛山举事 ,呼应太平天国起义。后来 ,首领陈开率军转战广西 ,建立大成政权 ,自称镇南王 ,1861 年兵败被杀。回国后的容闳 ,曾在广州见到两广总督派军平乱、屠杀天地会众的景况 ,感慨万千。

陈开起事之初曾占领家乡顺德。有一当地男子出面 ,召集村中妇女为天地会众洗衣做饭。当天地会被镇压后 ,这个男子也被指控为匪党 ,遭到追捕。

大概 10 年后 ,也就是 1871 年 ,此男子的一个侄子通过了层层考察 ,成为容闳负责招募的首批赴美留学幼童之一 。

很显然 ,侄子一家成功隐瞒了这位四叔的“历史问题”。要知道 ,作为中国首次官方组织的留学行动 ,首批留美幼童的审查过程极为严苛。除天赋、知识和身体之外 ,考虑到中美政治体制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 ,为免幼童被美国同化 ,走上邪路 ,身家清白是最基本要求 ,与太平天国、捻军等有牵连者必须被排除在外 。

如果抛开四叔的历史问题不说 ,这位幼童其他方面的素质几乎无可挑剔。他年幼时 ,父亲去南洋做生意 ,他则前往香港 ,与在香港西环行医

的祖父梁振邦一起生活。祖父将他送入香港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读书,因此自小便懂英语,也是那批留美幼童中唯一有英语基础的。加上他身处香港这种西化之地,耳濡目染,视野开阔,人又聪明灵活,自然是上佳之选。何况,他在幼童考试中也名列一班第一。

他是梁敦彦,晚清最后一任外务大臣。

戛然而止的留学

光绪三十三年,即 1907 年,经耶鲁大学的一批教师和校友联名推荐,梁敦彦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学士学位和名誉博士学位。

这是迟到了 20 多年的学位。

当年的首批留美幼童,初至美国后被全部安排于哈特福特小学。一年后,梁敦彦考上了哈特福德中学,这也是美国第二古老的公立中学。这间中学有个俗例,高中毕业班要举办演讲比赛,各班的参赛者都是优秀学生。梁敦彦毕业那年便参加了此项比赛,演讲题目为“北极熊”,主题是俄土战争,猛烈抨击沙俄的侵略行径,引来全场动容。

1878 年,梁敦彦考入耶鲁大学,这也是容闳的母校。据说,他原本喜欢自然科学,尤其擅长数学,但祖父希望他为官,光宗耀祖,在国内的李鸿章也对这群高中毕业生有各种考量和建议,于是他选择了法学系。

当年的留美幼童,因接触先进文明,除视野开阔、知识结构丰富外,与国内同龄人最大的不同就是长于体育运动,绝非只会读书的书呆子。梁敦彦就组织了“东方人棒球队”,本人为球队投手,队友还有詹天佑等人。这支球队曾游历美国,参加各地比赛。梁敦彦还与时下一些初至异国就一头扎进唐人街的年轻人不同,他认为留美幼童不该抱团,而是应

该多参加当地人的社交,融入当地文化。

这种观念在如今看来自然先进,但偏偏是清政府最为担心的。在清政府的构想中,留美幼童走的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路子。他们希望留美幼童能够与美国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文化绝缘,只学习科学技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幼童们根本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他们必然会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被美国同化。

梁敦彦等幼童的开放心态引起了监管官员的严重不满,何况,这批幼童穿洋服,做礼拜,甚至还剪去了辫子!

据载,梁敦彦赴美后,住在教师巴特利家中,巴特利太太对梁敦彦视同己出,照顾周到,还解答梁敦彦在功课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并为他推荐英文小说。仅仅半年后,梁敦彦的英文便如当地人一般流利。而对梁敦彦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巴特利一家的宗教信仰,他们全家信仰基督教,巴特利夫人专门送给梁敦彦一本《圣经》,梁敦彦每周都会跟随他们去做礼拜,他曾说《圣经》中的英文是最好的英文。

幼童们的这种成长与变化,终于使得清政府无法容忍,于 1881 年将所有幼童召回。此时,仅有詹天佑一人因工程科目学时短而大学毕业,梁敦彦等人仍差一年才能毕业。

归国时,途经旧金山,他们还接受了当地奥克兰棒球队的挑战。梁敦彦作为投手出场,对手被三振出局。可惜,这已是这支球队的绝唱。

值得一提的是,回乡探亲后,梁敦彦与唐绍仪、温秉忠乘船前往天津报到,轮船经过福建时触礁沉没,三人借小舢板逃生。这次逃生之举无疑改变了历史——唐绍仪是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温秉忠更处重要地位,很多年后,他带着三个外甥女又走上了赴美留学之路,这三个外甥女都姓宋,一个叫宋霭龄,一个叫宋庆龄,还有一个叫宋美龄。

一度潦倒的生活

半途回国的留美学生们并没有得到优越的待遇 ,刚回国时甚至被视为犯人一般关了几天禁闭 ,这段经历成了不少人的噩梦。之后 ,他们又被随意分配至各地 ,不按专业、不按特长。他们未曾参加过科举 ,没有功名在身 ,留洋也绝非什么金字招牌 ,回国初期都极为窘迫 。

但在洋务兴起之际 ,在袁世凯等实用主义者纷纷上位后 ,这些留美生们的仕途普遍发生了大逆转。他们视野开阔、懂得洋务 ,是那个时代的真正精英 ,回国初期的这段蛰伏也让他们懂得隐忍与变通 。

梁敦彦的蛰伏时间颇长 ,而且艰辛。他先在天津电报学堂教授英文 ,待遇极差。他在困苦之中给远在美国的巴特利夫人写信 ,对方在回信中表示 ,人应做有益于世界的事业 ,作为教师 ,就应该安心尽力教育学生成才 ,不必介意薪水 ,于是梁敦彦安贫乐道 ,再无牢骚。当时 ,若想改变命运 ,唯一途径就是参加科举 ,于是梁敦彦授课之余 ,也埋头于八股文 ,计划参加科举。

1884 年 ,梁敦彦的父亲去世 ,他回顺德办理丧事 ,花光了所有积蓄 ,竟连返回天津的路费都无法凑齐。因他逾期不归 ,教职丢了不说 ,一度还遭通缉。曾有香港牧师得知他熟读《圣经》,便聘他去教堂讲《圣经》,月薪百元。这本是个暂解燃眉之急的好办法 ,谁知梁敦彦初至香港时 ,教堂的人见他是华人 ,便让他走后门。他为此力争 ,并拒绝入职。之后他又去广州谋生 ,未寻得出路 ,好在巧遇同村亲友 ,在人家的店铺中暂住 ,穿的是用当年留洋时所用床单改制的短衫 。不过 ,梁敦彦曾挨过苦 ,对此早已不以为意。

有一日,他在街头偶遇当年在天津电报学堂的学生胡君。胡君见老师竟如此落魄,极是惊讶,他当时在张之洞的电报堂当领班,便劝老师同往,负责管理电报翻译事务。

张之洞作为洋务派中坚人物,急需洋务人才,又有识人之明,很快便将干练的梁敦彦引为心腹,1888 年奏保其为候补知县。赵凤昌曾在《国学辜汤生传》中记载,张之洞曾称自己与五位幕僚为“六君子”,赵凤昌本人便是这五位幕僚之一,另外四人分别是辜鸿铭、蔡锡勇、梁敦彦和凌福彭。以张之洞封疆大吏之位,与五名职位低微的幕僚并称,可见他对这几人的器重。

在这几位幕僚中,梁敦彦属于多功能复合型人才。他一方面可算是张之洞的“洋务文胆”,与辜鸿铭共同负责洋务文案。一向狂放不羁、眼高于顶的辜鸿铭对梁敦彦的广博极是佩服,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时,便请梁敦彦亲笔题签。另一方面,梁敦彦也凭借其干练负责了大量实操性事务,如中法战争后,他负责广东、广西和湖南等地的电报线路建设,游走于崇山峻岭,最终完成了南方电报网络的建设,并培养出了大量电报专才,堪称中国电报业先驱。他还承担了大量向外国购买军火的工作,经手银子不下千万两,换作别人早已借机中饱私囊,他却拒不受贿。

从幕僚转向真正的仕途,梁敦彦只需要一个机会。

与晚清共沉浮

1900 年,义和团之乱爆发。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梁敦彦受命部署,安抚人心,使得两湖之地未受太大影响。事后,他被提拔为江汉海关道台。

次年 ,《辛丑条约》签订 ,赔款事宜急需核算人才 ,但当时国内偏偏缺乏此类人才。梁敦彦恰恰精于算学 ,在重新计算、审核中为清政府争回不少利益 ,遂被张之洞推荐给慈禧。

1904 年 ,光绪颁下上谕 :“直隶津海关道员缺 ,着梁敦彦补授 ,着即迅速赴任。”这个天津海关道的职位 ,虽然按如今的标准仅仅是个厅级职位 ,但却是晚清政治体系内最著名的肥缺之一。1870 年 ,李鸿章奏请设立此职 ,正四品 ,全权负责外交通商事宜 ,有自己的办事衙门 ,可直接向皇上奏事。这个让大家争破头的岗位 ,不但是极好的敛财工具 ,也是“后备干部”们展示自己的平台。在李鸿章挑大梁的时代 ,郑藻如、周馥和盛宣怀等日后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在这个岗位上历练过 。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 ,这个岗位几乎又成了留美学生们的跳板。在梁敦彦之前出任此位置的就是唐绍仪 ,之后两任同样是当年的粤籍留美幼童 ,分别为梁如浩和蔡绍基。

前任唐绍仪在任期内干得不错 ,关税白银倍增 ,还从洋人手中收回了天津和秦皇岛口岸的管理权。作为继任者 ,梁敦彦亦不遑多让 ,备受嘉许 ,得加二品衔。

与此同时 ,他还兼任北洋大学校长。留洋出身的他 ,与旧同学们一道 ,促成北洋大学送学生出国留学之事 。在意义极其深远的“庚款留美”一事中 ,他亦从中出力。当时 ,美国主动提出退回部分庚子赔款 ,但要求清政府必须用于办学 ,可清廷意见不一 ,袁世凯希望投资实业 ,徐世昌力主开发东北 ,已迁任外务部右丞的梁敦彦则认为应用于教育 。时任驻美总领事的欧阳庚也是当年的留美幼童 ,他们“内外结合” ,终于促成此事。

1908 年 ,中美政府达成协议 ,梁敦彦代表中方签字。协议规定从 1909 年起 ,每年用退款遣派 100 名学生赴美留学 ,从第 5 年起减至每年

不少于 50 名,依此循进,至 1940 年结束。主持此事的同样是梁敦彦的留美同学、香山人唐国安。

与铁路结缘,与詹天佑结亲

留美幼童作为一代精英,与旧官僚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处理实务的能力。在外交和经济领域,他们都建树极多。铁路作为当时的经济命脉之一,亦是他们极为活跃的舞台。

1907 年,梁敦彦负责与德国谈判修路事宜。当时德国金融不景气,梁敦彦便坚持"借款不能以路作抵"原则,力争中方的控制权。最终德方让步,双方签订《津浦铁路借款合同》。合同中明确规定:"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管理。"

此事引来朝中重臣的夸赞,纷纷当成重大政绩上奏,认为此合同"确能于造路、借款划分两事,不特利权均无损失,于原订之草合同多所补救,即凡兴工、用人、购料以及提款、还款各事宜,均操之在己,毫不授人以柄。较之他项路约,实为周密"。

梁敦彦兼任京奉铁路总办时,英国建议清政府修建京张铁路,以图插手,俄日两国也蠢蠢欲动。梁敦彦及时进言,认为京张铁路是北京通往蒙古的唯一要道,必须自主控制,不得由别国插手。他还力荐老同学詹天佑主持此工程,此时的詹天佑正在广东水师学堂任教,为打消袁世凯等人对詹天佑能力的疑虑,他不惜以身担保。

詹天佑不负所托,主持修建了这条难度极大的铁路,提前两年竣工,并节省白银 28 万两。这对昔日同学、老友,后来还成了亲家,梁敦彦的女儿梁霭珊嫁给了詹天佑之子詹文琮。

也是在 1907 年 ,梁敦彦奉诏出任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公使。谁知辞行时 ,慈禧见他博学干练 ,又相貌堂堂 ,便让他留在京中 ,升任外务部右丞。也正因为这次升迁 ,耶鲁为梁敦彦颁发了荣誉学位。

没得到多少好处的清室忠臣

后来的梁敦彦 ,因参与张勋复辟而成了“帝制余孽”,被国民政府通缉。

有人说这是晚节不保 ,可是 ,梁敦彦明明是大清臣子 ,他的晚节不就应该是忠实于清室吗? 其实翻开历史 ,很多争斗无非“各为其主”四字 ,忠实于内心的人即使迂腐 ,也有值得尊重之处。

何况 ,梁敦彦与许多仕途顺利或有祖荫可依靠的人不同 ,他没有背景 ,仕途亦多波折。直到 1909 年 ,即从美国归来 28 年后 ,他才升任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 ,成为中枢大员。而且 ,他在这个位置上仅仅待了 8 个月 ,便被迫因病乞休——之所以说是“被迫”,是因为他并非真病 ,而是受了袁世凯去职的连累。与他同样命运的 ,还有老同学唐绍仪等 ,这些当年的留美幼童 ,不少都成了袁世凯的心腹班底。

1910 年 ,清廷以“养病”的名义派梁敦彦赴欧美游历 ,要求他联络邦交 ,并与各国商议加税免厘。同时还得密授 ,要与德国商谈重整中国陆军的合作 ,与美国洽商币制改革借款事宜。

历代王朝都充斥着权斗 ,宦海浮沉中难见公平公正 ,许多能臣无用武之地 ,甚至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像梁敦彦这样 ,在权斗中被波及 ,被迫乞休 ,可若是朝廷需要他解决洋务问题时 ,又会唤他出来 ,甚至不给名分便让他干活。

但即使如此,梁敦彦仍是晚清大变中少见的忠臣。我想,这才是他的难得之处吧!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走出了立宪的关键一步:成立内阁。但这个被称为"皇族内阁"的名单,引来了如潮批评,清政府风雨飘摇。在这个名单中,满人贵族多达9人,其中又有7人为皇族,梁敦彦作为汉人官员位列其中,任洋务大臣,只算是个点缀,他也没有就任,继续托病,甚至没有回国。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组阁,再次任命他为洋务大臣,并催他回国,但他鉴于国内形势不明,仍未回归。

1913年,梁敦彦与周诒春、颜惠庆、王正廷、顾维钧和詹天佑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欧美同学会,成为中国最早、规模最大、并延续至今的留学生组织,并担任首任会长。

1914年,因母亲病逝,梁敦彦携家人回国奔丧,随后任徐世昌内阁的交通总长。微妙的是,当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上级袁世凯谋求称帝时,梁敦彦并不支持,还以年老体衰为由辞职,隐居天津。这位日后的"帝制余孽",所维护的并非帝制本身,而是那个对他并不算太好的清王朝——想来,这也是原则吧。

1917年,张勋复辟,他参与其中,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议政大臣。复辟失败后被国民政府通缉,隐匿于东交民巷。1918年,国民政府下赦免令,他再次隐居天津,1924年于京去世,葬于西郊万泉庄梁家花园,后移至福田公墓。

在我所写过的旧时海归中,以香山人为最多。我是中山人,亦属当年大香山范畴,自然对此极感亲切。而更让我感到亲切的是梁敦彦,他是我的正牌老乡——广东顺德勒流人。当年,我爷爷从顺德勒流迁居中山,在中山开枝散叶,如今,这一支已人丁茂盛,绵延四代。

如今的顺德极是繁华 ,勒流镇也极兴旺 ,梁敦彦的故乡龙眼村以龙点睛闻名 ,周边镇区的龙舟队每年都来这里举行龙舟点睛仪式 ,已成传统。

据说 ,光绪末年 ,慈禧曾赐梁敦彦“尚书第” ,由其回乡兴建。这处宅院颇为豪华 ,有房数十间 ,进门有水池石马 ,但在“文革”中被毁 ,如今只余花岗岩墙根。梁氏族人还建过一座名为明馨堂的宗祠 ,抗战胜利后 ,这里办了乡立第一小学 ,祠堂还悬挂有“外务部尚书”、“御赐紫禁城骑马”等牌匾 ,是乡民以梁敦彦这位一品大员为骄傲的见证——即使 ,那时的他早已是“帝制余孽”。可惜的是 ,这座祠堂与梁敦彦的“尚书第”一样 ,都已不存。

曾经衣锦还乡的梁敦彦 ,并未叶落归根 ,而是去世于风云诡谲的京城 ,亦葬在那里。而他的夫人连氏 ,则以一品夫人的身份葬在勒流镇连村岗。

历史一向冷酷 ,决定荣辱的往往是立场。梁敦彦这位晚清最后一任外务大臣 ,尽管建树极多 ,却被“帝制余孽”四字抹杀 ,甚至在历史中难见痕迹。如今能寻到的旧迹 ,怕只有北京麻线胡同三号了 ,这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挂有“梁敦彦故居”的牌子。这处宅院当年曾辉煌一时 ,早年是协办大学士敬徵的府邸 ,后被唐绍仪购得 ,不久便转手给老同学梁敦彦 ,晚年的梁敦彦亦隐居在此。

作为早年的棒球场神投手 ,梁敦彦并未放弃他对体育的热爱 ,据说他曾建立中国第一个网球会。只是 ,昔日留美时的意气风发 ,终究不再。

欧阳庚:专注外交 45 年

在地质灾害史上,1906 年是个惨痛的年份。那一年里,阿拉斯加、旧金山、厄瓜多尔、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地均爆发了 7 级以上大地震。当年 4 月 18 日,美国旧金山发生 7.8 级大地震,因天气干燥,地震后发生了持续 3 天 3 夜的火灾,2.8 万座房屋被毁。

当时,香山籍华人聚居的旧金山洛克镇受灾极为惨重,死者众多。有一位名叫骆丽莲的女医生,她的大女儿也在灾难中丧生,伤痛中的她不顾大火威胁,救出大量华侨孤儿,在救灾过程中不幸被柱子压倒,重伤毁容。她的丈夫时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这位外交官也无视自身安危,积极参与救助同胞和孤儿,其间遭遇了肋骨折断等伤痛,左边头部也遭严重烧伤,从此不长头发。

这位外交官如今声名不彰,却可算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传奇。他横跨晚清和民国,在外交领域持续工作 45 年,辗转美国、加拿大、巴拿马、智利和玻利维亚等地。据说,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小学教材中都有记载他护侨事迹的文章。

他是欧阳庚,当年的留美幼童之一,广东中山张家边镇大岭村人。

外交世家

1872 年 ,14 岁的欧阳庚作为首批留美幼童的一员启程赴美。先后在纽约西海文小学、纽海中学和耶鲁大学就读。1881 年被强令回国时 ,他与詹天佑是仅有的两名大学毕业生 。

欧阳庚涉足外交领域只因“家学渊源”,他的堂兄欧阳明时任清廷驻美旧金山总领事 ,任内勤于政事 ,积极保护侨民和华工利益。欧阳庚被堂兄招入领事馆见习 ,后接任总领事 ,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 20 多年。

在那场大地震中 ,他救死扶伤 ,事后还向旧金山银行担保贷款 ,组织当地的香山华侨重建这个清朝后期就已成为香山人聚居地的洛克镇 ,并自己出资建立孤儿院 ,收养数十名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 。他还撰写了《同一经纬地震史》、《震灾防火》、《重建金山中华街》、《大坑香山移民史》等文献 ,是地震史和华侨史上都颇具价值的文献。但地震带给他的伤痛使他始终未能平复 ,甚至在 3 年后 (1909 年)又狠狠地刺了他一刀 :他的夫人骆丽莲医生因旧伤不愈而去世 ,年仅 37 岁。

骆丽莲是混血儿 ,父亲是出生在美国的香山籍华人 ,经多年打拼后 ,创办“维仁茶行”,生意兴隆 ,母亲则是美国的英格兰人后裔。美丽窈窕的骆丽莲考入了耶鲁大学医学系 ,是当时华人子弟中少有的大学生 。兼具东方知性美和西方女孩开朗活泼性格的她 ,曾在新生联谊会上表演过钢琴独奏 ,优雅大方 ,立时便引得欧阳庚的注意 。这对小男女就此结识 ,并在一次赛艇比赛后定情 。当时 ,耶鲁与哈佛两校在各方面都竞争激烈 ,哈佛赛艇队均为美国人 ,耶鲁赛艇队却以在海边长大的中国广东籍男孩为主 ,日后大名鼎鼎的蔡绍基、詹天佑、钟文耀、黄开甲均是赛艇队

成员,欧阳庚更是担任舵手。在那场比赛中,耶鲁队完胜,欧阳庚凭毅力赢得了骆丽莲的芳心。

也是在骆丽莲的引导下,欧阳庚成了虔诚的基督徒。

1881 年,留美幼童被强行召回,这对小情侣天各一方,却仍情系彼此。直至 1884 年,欧阳庚再次赴美,进入领事馆工作,二人才重逢,并于 1891 年喜结连理。可惜的是,骆丽莲早早辞世,这场原本甜蜜的婚姻在 18 年后告终。

1914 年,丧妻 5 年的欧阳庚再娶,续弦是画家陈锦梅。他们育有 5 个孩子,在这个家庭里,官员和知识分子两种元素并存,几乎又是一个民国精英家庭的样板,我忍不住详细记录——

他们的长子欧阳可宏毕业于辅仁大学物理系和美国尼瓦达州大学无线电系,后参军,进入陈纳德的飞虎队,在缅甸和昆明参与抗战。次子欧阳可亮毕业于东吴大学和日本拓殖大学研究院,后在拓殖大学和春秋学院任教授,著有甲骨文研究的《集契集》,多次回国参加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史研究会,1992 年 5 月在日本逝世。三子欧阳可祥肄业于辅仁大学,抗战期间运送物资时牺牲,为辅仁大学八烈士之一,时年仅 26 岁。四子欧阳可强毕业于辅仁大学物理系,1980 年后移居日本,曾任拓殖大学八王子分校、樱美林大学讲师。幼子欧阳可佑,辅仁大学化学系及台湾工业试验所硕士毕业,曾任台湾糖业公司工程师、西德拜耳大药厂台湾总代理、建盈化工公司总经理。

翻看民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家庭谱系,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枝繁叶茂的形态,它不以一家子部长厅长局长为荣,官二代们也未必“子承父业”并“进步神速”,反而注重学术,也有责任感,比如在抗战中前仆后继。

我们确乎有那么一个时代,虽然距完美甚远,虽然戛然而止,却始终

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

足迹遍布全球的外交官

欧阳庚的外交官生涯被 1911 年的大变革切分为两个阶段 ,在晚清时代 ,他曾出任驻旧金山总领事、驻温哥华总领事、驻墨西哥条约特使、第一任驻巴拿马总领事等。民国时代 ,他曾出任荷属爪哇 (即印度尼西亚)总领事、驻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驻智利国第一任公使和驻玻利维亚条约特使。

在他的外交生涯中 ,有两袖清风、力保主权、力护侨民等美誉。还有人为他赋诗 ,“华夏后裔历八方 ,五洲万国有虞唐 ,老人若叙移民史 ,怀德每称欧阳王” ,所谓“欧阳王” ,是指“庚”的译音为“king” ,意译为“王”。相关记载颇多 ,不再赘言。倒是有几桩八卦可以一提。

1910 年 ,欧阳庚出任驻墨西哥特使 ,处理 1908 年墨西哥动荡中有华侨被杀害之事。出发前 ,又因有印第安人为殷商后裔这一流传已久的传说 ,有人专门委托他进行查访 ,看看当地华侨有无当年殷人的痕迹 ,此事还得到了摄政王载沣的批准。委托者也值得一提 ,他们当时是著名外交官张荫棠的幕僚 ,日后一个成了国学大师 ,涉猎甚广 ,另一个则是考古学奠基人之一 ,也是著名农学家 ,这两人相交莫逆 ,日后却闹出一桩公案——没错 ,前者是王国维 ,后者是罗振玉。

欧阳庚抵达墨西哥不久 ,便有印第安人殷福布 (Infubu)的族人集体到清廷驻墨西哥使馆请愿 ,表示之前动荡中有 700 多名印第安人被杀 ,这些印第安人都是中国血统 ,殷人后裔 ,所以称殷福布族 ,3000 年前漂洋过海至此 ,希望清政府代为索赔。但摄政王载沣认为此事无据 ,“传闻难

作 3000 年前之历史”,不予理睬。凑巧的是,1922 年,欧阳庚又前往智利,担任中华民国驻智利的首任公使。当时,他在使馆后发现三亩涕竹。涕竹在中国已灭绝,只见于传说,据称其截两节再剖开便可为舟,甲骨文中的“舟”字便是涕竹舟的象形。当地的印第安人告诉他,涕竹笋是印第安人的祖传外伤药,绵延 3000 年,恰与中国古代小说志怪集《神异经》中有关涕竹笋可治外伤的记录相符。这《神异经》上所题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东方朔,到底是真作者还是假托其名,尚无定论,所载也多荒诞不经,但偏偏与数千年后的印第安人说法一致。

此事近年来越传越神。据说在玛雅人的传说中,也有自称“三千年前由天国乘涕竹舟经天之浮桥诸岛,到科沈河畔种豆麦黍粟”的说法。史载,公元前 1047 年,商纣王派侯王喜率大军十余万讨伐东夷,自己却遭周武王讨伐,兵败自焚,可侯王喜率领的这支大军却在山东半岛失踪。有史学家认为,这支大军在去国之际,选择乘涕竹舟出海,并被季风送到中美洲,并创造了中美洲史上极具殷商文明特征的奥尔梅克(Olmeca)文明。

此事属考古学界范畴,并无定论,只堪一笑。倒是欧阳庚,在那个相对闭塞的时代里辗转于世界各地,总能适逢其会。

还有一桩事,颇有纪念价值。民国成立后,谈成首个平等条约的原无约国为南美的玻利维亚。双方于 1919 年 4 月开始接触,几经波折后,于 1924 年 12 月互换条约。欧阳庚作为驻智利公使,直接参与跟玻利维亚政府的交涉,后来还担任全权代表交换条约。

因为辗转于世界各地的缘故,他所著书籍甚至日常公文都成了极珍贵的外交史和华侨史文献。比如 1910 年 4 月 18 日,时任清廷驻巴拿马总领事的欧阳庚在致外务部的报告中写道:“我华民商务之在巴国者,以

巴京(巴拿马城)为最大,次则个啷埠(科隆市)。由巴京至个啷埠开河一带,火车所经共华里一百四十余地,华民店铺约三百家,零星散处各埠者亦不下百十家,约共三千余人。”这个记录确实与巴拿马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1908 年,巴拿马的零售业就有 79% 被中国人控制。

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也曾像自己的堂兄欧阳明那般极力提携后辈。1906 年的那场旧金山大地震中,丧生者众,遗下不少孤儿。有一个 10 岁的混血女孩欧阳瑛,父亲虽在美国出生,但祖籍为香山县大岭村,可算是欧阳庚的同乡,母亲是白人,在地震中,她的父母和两个哥哥均遇难。欧阳庚的夫人骆丽莲女士将她收养,安排在欧阳庚出资建立的孤儿院中。

有人曾考证欧阳瑛的身世,指其先祖欧阳愈曾是年羹尧的部将,年羹尧被杀后,欧阳愈逃至缅甸,后潦倒而死。其子欧阳光前卖身葬父,到美国做奴隶。欧阳光前的儿子欧阳汝飞也为奴隶,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才获得自由,迁移到旧金山洛克镇购置土地,经营饭店,其子欧阳克航就是欧阳瑛的父亲。

骆丽莲女士因旧伤病逝后,欧阳庚痛心不已,又因工作关系,无法照应孤儿院的孩子们。恰好美国洪门的郑所南夫妇前来吊祭骆丽莲,郑夫人愿意担任孤儿院理事长,孤儿院方得以维持。后来,欧阳瑛考上航空学校,1924 年自驾机长途飞行,由洛杉矶抵达智利圣地亚哥,比 1930 年英国女飞行家阿美约的英澳飞行还早 6 年,引起轰动,得总统接见。欧阳庚曾将此事报告给当时北洋政府的执政者段祺瑞,但北洋政局动荡,段祺瑞也未予重视,此事一度遭湮灭。1932 年,欧阳瑛在空难中不幸罹难,年仅 36 岁。据说,其后代前些年曾回如今的中山市张家边镇大岭村寻根。

欧阳明的幼子欧阳日如也曾受欧阳庚之恩。欧阳日如在欧阳庚资

助下完成了耶鲁大学的学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东官银钱局总办,上海永安公司、新新公司财政总管,津浦铁路总稽核。

力保同乡孙中山,力促庚款留美

1894 年,孙文在美国檀香山组建兴中会,次年发动首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事败后,他逃出广州,经"中国香港"日本,又来到檀香山。

孙文于檀香山入境时,需人担保。他登记姓名孙逸仙,并致信欧阳庚,要求这位香山老乡作保。欧阳庚爽快应承,还为他安排生活,方便其在美国华人中传播革命。他还向孙文引荐了自己的表弟。这位表弟后来成为孙文的忠实追随者,堪称左膀右臂,他名叫廖仲恺。

欧阳庚为孙文作保,很快便被清政府知晓。面对追查,欧阳庚以"我不知道孙逸仙即孙文"来搪塞。此事经过漫长调查,始终未平息,直到 1902 年,清政府还专门派梁诚前往美国调查此事。

凑巧的是,梁诚也是当年的留美幼童,他属第四批(即最后一批),可算是欧阳庚的学弟。二人暗中商定,在调查报告中将孙文进入美国之事写成由洪门中人经办,与欧阳庚无关。据说,作为报答,欧阳庚暗中"回馈"了梁诚一项功劳——提出庚款留美。

欧阳庚的这次"报答",似乎只是其后人的一面之词,但细细推敲,似乎又非没有根据。若此事为真,那倒真是阴差阳错,因为,当事双方不可能想到,这桩"功劳"竟然会成为中国近现代极具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从此梁诚名垂青史,欧阳庚却罕为人知。

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改善中美关系,有意退还部分赔款,美国议

会内部有所分歧。凑巧的是 ,欧阳庚曾出资供胞弟欧阳祺在哈佛留学 ,欧阳祺与罗斯福刚好是同学 ,欧阳庚借此面见罗斯福 ,多方斡旋 ,希望将退款用于办学。后来欧阳庚因在旧金山大地震中受伤 ,一度休养 ,便推荐欧阳祺继任旧金山总领事 ,继续谋划此事。

这件事情终于在 1908 年正式敲定 ,美国国会通过了退款议案 ,中美双方商定后 ,清政府于 1909 年派出了第一批庚款留美生 ,其中包括金邦正、梅贻琦等人。

在史书中 ,梁诚作为庚款留美的首倡者被记载 ,唐绍仪和梁敦彦也因曾出力而着墨不少 ,可欧阳庚却仿似与此事无关。

因为史料稀缺 ,我只能根据各种蛛丝马迹主观推测 ;以欧阳庚的老外交官身份 ,其弟与罗斯福的同学关系 ,还有他与梁诚的师兄弟关系 ,参与此事可算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但是否是首倡者 ,又是否将首倡之功“转赠”梁诚 ,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

民国建立后 ,这位前清外交官继续从事着外交工作。从他早年义助孙中山一事中 ,已可看出早年的留学生涯对他的巨大影响 ,想来 ,他应也期盼着民主共和。另外 ,多年的海外经历 ,或许也使得他对那个遥远的清政权感到淡漠了吧。

蔡绍基 :北洋大学首任校长

蔡绍基 ,香山县北岭村 (今珠海拱北北岭村)人 ,首批留美幼童之一。

1879 年 ,他于哈特福特中学毕业时 ,在毕业会上以“鸦片贸易”为题进行演讲。一腔爱国之心 ,尽在抑扬顿挫中。

1881 年 ,成绩优秀的他考入耶鲁大学就读法律专业。在那支由留美幼童组成、名噪一时的“东方棒球队”中 ,亦有他活跃的身影。但随着清政府强行征召幼童回国 ,他的学业戛然而止。

回国后 ,他先被分配到大北电报局担任译员 ,之后又转到上海海关担任翻译。与大多数留洋同学一样 ,刚刚回国的他未受重视。但到了 1883 年 ,他等到了一个机会 ,也遇到了一位“贵人”。

当时 ,清廷筹备在朝鲜开办海关 ,唐绍仪被选为随员 ,他随即推荐了自己的香山同乡、留美同学蔡绍基和梁如浩。三人赴朝不久 ,便结识了袁世凯。

袁世凯其实是许多当年留美幼童的共同“贵人”。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 ,袁世凯深谙何为人才 ,在他的心腹幕僚中 ,传统的八股人才不多 ,懂外语、懂洋务的干才则是主流。他在偶然机会中认识了唐绍仪 ,极为激赏 ,立刻引为心腹。唐绍仪又为其举荐蔡绍基和梁如浩 。再加上陆续入幕的梁敦彦等老同学 ,当年的留美幼童构成了袁世凯的心腹班底 。

此后的袁世凯 ,一度掌管铁路、电报等重要部门 ,留美幼童均成为其得力臂助。蔡绍基先后出任直隶总督府北洋洋务总办 、牛庄海关道台和天津海关道等职。其间 ,他还曾涉足外交领域 ,负责与日方谈判 ,商讨日俄战争后辽东半岛的归还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海关道一职。在袁世凯大权在握的时期 ,这几乎成了留美幼童们的历练平台 ,唐绍仪、梁敦彦等人都曾在这个岗位上获取政绩、积累声名 ,之后扶摇直上。

在北洋大本营天津 ,蔡绍基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各种关键时刻 。除天津海关道这个极具标志性意义的岗位之外 ,直隶总督府北洋洋务总办也可谓“洋务秘书长” ,举足轻重。也正因为他与留美同学们都曾在天津显赫一时 ,所以 ,他们还于 1907 年在天津建了一座广东会馆 。

如今的天津以小洋楼闻名 ,其实清代建筑也遗留不少 ,比如这座广东会馆 ,便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规模也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会馆这一事物 ,可算是历史标志之一 ,无数悲欢离合、起落浮沉发生于其间。而会馆的大小、规模 ,往往也意味着地方势力的大小、人才的多寡。这座广东会馆 ,其建筑呈潮州式风格 ,有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室内剧场 ,还有独立戏楼与客栈。如今 ,会馆内仍可见镌刻着捐款人姓名的石碑 ,其中有一个个显赫的名字 :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周寿臣以及蔡绍基……

有趣的是 ,除了天津海关道这一岗位外 ,还有一个职位也成了留美幼童们轮番表现之所 ,那便是北洋大学堂督办 (即校长)。

北洋大学堂即今天津大学 ,是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1895 年甲午战争战败后 ,有识之士痛定思痛 ,深知办洋务购枪炮只是治其表 ,人才方是强国根本 ,于是决意效仿西方推行新式教育 。1895 年 10 月 ,时任天津

海关道(又是此岗位)的盛宣怀与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携手合作,兴办了中国第一所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896 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

建校之初,学校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学制均为四年,前者为大学本科,后者为大学预科。蔡绍基为二等学堂的首任总办。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京,天津亦被占。北洋大学堂校舍先后被美军和德军占领,教学设施与档案资料均遭破坏,被迫停办。蔡绍基临危受命,以直隶总督府外交官员的身份与联军交涉,力争复校。在联军拒不归还校舍的情况下,他又选择废弃的西沽武库重新建校,1903 年终于复校,他主持校务。学校在新址逐日扩充,北洋大学校歌中有"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的描述。

这位北洋大学堂督办(即校长),是当年的留美幼童中最早出任大学校长的一人。不久后,他调职他往,接替他的是老同学唐绍仪。唐绍仪离任后,又由另一位留美幼童梁敦彦出任此职,梁敦彦的继任者为梁如浩,也是他们的老同学。到了 1908 年,蔡绍基出任天津海关道,再次兼任北洋大学堂督办,直至清亡。

在这四位留美幼童的任期内,北洋大学堂发展极快,尤其是 1908 年蔡绍基再次出任督办之后,学校全方位效仿哈佛与耶鲁,更有"东方康奈尔"之称。而他们四人的最大贡献,则是在任期内促成了资送学生出国留学之事。

如今说起留学史,人们往往会第一时间想到留美幼童以及庚款留美生。前者贡献了唐绍仪、梁敦彦和詹天佑等人才,并因留美幼童们在官场上逐渐掌握话语权,间接促成了庚款留美;后者则贡献了胡适、梅贻琦等影响近现代进程的人物。北洋大学堂的留学生群体则往往被忽视,但

实际上 ,蔡绍基等四人先后执掌北洋大学堂 8 年 ,送出数十名学生留洋。蔡绍基主持复校当年 ,便将王宠惠、陈锦涛等人送往耶鲁大学留学。1906 年 ,梁敦彦在任内将第三班 34 名毕业生全部派出留学 ,其中三人赴法国 ,其余均进入哈佛、耶鲁、康奈尔和麻省理工等美国名校。

这批学生成才率极高 ,其中包括了近现代中国法学奠基者之一、曾任外交部部长和国务总理的王宠惠 ,这位精通多国语言的法学家是第一个将《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的人 ,其译本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都被公认为最好的英译本 ,在很多美国大学被当作教科书 ,他还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此外 ,还有著名外交家、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的王正廷 ,经济学家马寅初 ,数学家、财经专家秦汾 ,曾任交行董事长的金融专家钱永铭等。

蔡绍基作为当年的留美幼童 ,不仅仅在仕途上与老同学们共进退、相扶持 ,私交亦甚好。他最好的朋友 ,是当年曾在朝鲜共事 ,并同得袁世凯提携的唐绍仪与梁如浩 ,这两位也都曾任天津海关道一职 ,同时也都是天津广东会馆的捐建人与创办者。据说当年中山县的同乡来到天津 ,会馆必包吃住。蔡绍基的儿女亲家邝荣光也是当年的留美幼童 ,是中国第一代采矿工程师。值得一提的是 ,蔡绍基的妻子也来自香山 ,而且同样是今珠海拱北北岭村人。北岭村有两大姓 ,一为蔡 ,一为徐 ,蔡家出了蔡绍基 ,徐家则更是有名 ,其代表人物是四大买办之一、近代民族工商业创始人之一徐润 ,蔡绍基的妻子便来自徐润家族。作为早年的大买办 ,徐润家族当时已经发迹 ,蔡绍基却只是个留洋归来的学生 ,没经过科举 ,谈不上功名与前程 ,一度为徐家不喜 ,可蔡妻却执意要嫁 ,终于成就姻缘 ,还为蔡绍基生下 10 个孩子。

在历史重大转折面前 ,蔡绍基同样与自己的同学共同进退。与其他

许多留美幼童一样,他赞同民主共和,拥护革命。而作为袁世凯一手提拔的亲信部下,蔡绍基无疑对袁世凯有感激之心,但与有志共和的唐绍仪一样,他后来也站在了袁世凯的对立面。

辛亥革命后,北洋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洋大学,蔡绍基一度踌躇满志。但袁世凯谋划帝制,笼络这位老部下,许他工业大臣一职。蔡绍基坚拒,使得袁世凯大为光火,甚至放话说"登基"后要杀的第一人就是蔡绍基。

此后的蔡绍基,选择辞去公职,隐居于他宦海沉浮的天津,经营实业。有趣的是,1922 年,其第五子蔡国葆的长子出生,他为孙子起名"克文",与著名的袁二公子袁克文同名,俨然一副占袁世凯便宜的架势。不过蔡绍基若真执此心,反倒为我不喜,终究是过于刻薄了。

1917 年,蔡绍基出资在天津日租界宫岛街与明石街(今鞍山道与山西路)交叉处开设了游艺场"大罗天",成为清朝遗老和北洋政客的消遣之所。不久后,有人提议在这里办古玩展览,就此形成了固定的古玩市场。因天津人头复杂,清朝遗老度日艰难,常变卖古玩换取生活费,北洋政客又多在天津拥有物业,可算是古玩市场重要客源,加之九国租界中有大量外国商人、使节,亦是古玩消费的主力军,"大罗天"的生意极是兴旺。除古玩外,这里的戏院也极是热闹,梅兰芳、杨小楼、孟小冬和程砚秋等都曾在此演出。

他在天津的故居,名为"小白楼",现已不存,湮灭于城市改造大潮中。但在当年,这里可是名流荟萃之所。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早已被敷淡为传奇,关于二人的相识之所,坊间传说甚多,蔡绍基的小白楼便是其中之一,据说他们在蔡家的舞会上相识,此外,还有在赤峰道张学良少帅府和大华饭店舞厅相识等说法。

据蔡氏后人回忆 ,小白楼占地 9 亩半 ,位于马场道。1949 年后 ,一度改建为医院。喜欢热闹的蔡绍基 ,除常常举办舞会后 ,还曾邀请名演员来家中做客 ,据说范朋克就曾来过。据说天津还有一处蔡园 ,也曾是蔡绍基的家 ,我查不到具体地址 ,与之无缘。

蔡绍基曾连续三年被选为英租界议员 ,他去世后 ,英租界还为之下半旗。

我也曾去过他的故乡——珠海拱北北岭村。如今可见的与之有关的遗迹 ,仅有蔡氏宗祠 ,但据村中人说 ,宗祠也即将迁移到愚园 ,那曾是同村另一位名人徐润的私家花园。也因要搬迁的缘故 ,宗祠颇为荒凉 ,内中杂乱 ,瓦砾遍地 ,倒是大门口还留着一副门联 :“西山世胄 ,北岭家声。”

还有一处北岭小学 ,前身为北岭义学 ,本是蔡绍基于 1906 年主持修复的。当时与他一起主持此事的 ,还有徐润与村中另一位名人徐振鹏 ,这位徐振鹏是第三批留美幼童 ,算是蔡绍基的师弟 ,曾参加甲午战争 ,后任海军次长。可惜的是 ,如今的北岭小学并非原校址 ,而是 1985 年择地新建的。

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 ,在家乡却几无痕迹 ,算是他与其他香山籍留美幼童的一大不同吧。所幸的是 ,在天津大学建校 110 周年的庆典上 ,蔡绍基的照片悬挂于北洋广场。尽管历史曾被遮蔽 ,但依然有人记得他。

蔡廷干:军政文三界名人

My bed was radiant with a shining light
Which I, in wonder, took for frost so bright
With upraised head the shining moon I spied
With drooping head I thought of home and sighed.

这是李白名作《静夜思》的英文版,译者蔡廷干,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华人世界中系统性将唐诗翻译成英文的第一人。

留美幼童成才率极高,在政界、外交、经济、铁路、电报、法律和海军等领域均有专业人才,如唐绍仪、梁敦彦和詹天佑等,都是个中翘楚。这位蔡廷干则更是传奇,做了复合型人才,横跨军政文三界。

他早年曾服役于北洋水师,后得授中将,任海军副司令;他做过外交总长,代理过内阁总理;作为华人中系统地将唐诗译成英文的第一人,他于1932年出版了《唐诗英韵》;他还是中国引进关键词索引的第一人,以西方"词语索引"方式研究、译注老子的《道德经》,出版《老解老》一书,算是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甲午海战中的战俘

蔡廷干是香山县上恭都上栅村人(今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村)。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先后就读于哈特福德学校、新不列颠中学,还曾在高中毕业前夕被分配到麻省罗沃尔机械厂学习。这位顽皮的年轻人曾被同学称为“好斗的中国人”。也因骨子里的叛逆,他成为幼童中最早剪掉辫子的几人之一。剪辫本是大逆不道之举,但去机械厂实习反倒给了他很好的“掩护”,因为在机器旁工作,辫子有卷入的危险,所以清廷监督官员特别允许实习学生剪去辫子,此前已将辫子抛弃的蔡廷干“奉旨安全”。

1881 年,留美幼童被强制召回,蔡廷干被分配到大沽水雷学堂,学习有关鱼雷、电机、采矿和测量等课程。这座始建于 1876 年 4 月的大沽水雷学堂,堪称近代中国军事技术教育发源地。在它成立 5 年后,即 1881 年,天津水师学堂才告成立,至于 1885 年成立的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学校——天津武备学堂,更是比它晚了接近 10 年。该学堂不仅聘请西方水雷专家任教,还制造水雷。

1884 年,他赴北洋舰队实习,毕业后服役于福建水师,参加过 1885 年的中法战争,1888 年以“守备衔尽先补用”调入北洋水师,次年以“都司衔补用守备”升任北洋水师鱼雷左一营都司,委带左队一号鱼雷艇。1892 年改为实授守备,后调任为“福龙号”鱼雷艇管带(武职正四品),并赏绘花翎顶戴。这一年的蔡廷干,刚满 31 岁,在一众留美旧同学中,他算是仕途相对顺利的一位。当时他还有一名下属,日后亦大名鼎鼎,名叫黎元洪。

但 2 年后,他与他的国家都遭遇了极大的挫折。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黄海海战打响时,原在大东沟近岸航行、担任北洋舰队侧翼警戒的蔡廷干率“福龙号”及本部其他鱼雷艇,随“平远”、“广丙”两舰进入大东沟海域参战。

海战当日下午 2 点半,“平远”、“广丙”两舰与日军的“西京丸”、“岩岛”以及旗舰“松岛号”交火,中方两舰火力不强,又是木质船身,虽击中敌舰,却未造成重大伤害,自己却受创撤退。蔡廷干在这种情况下,调动鱼雷艇队,包围敌舰“西京丸”,同时冒着炮火,指挥“福龙号”全速冲向对方,并在途中连续发射两枚鱼雷,但均被“西京丸”转舵避开。随后,“福龙号”冲至“西京丸”左舷侧,距离仅 40 米,随后发出第三枚,也是最后一枚鱼雷。

在当时的“西京丸”上,有个在日本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即在甲午海战前复出担任海军军令部长、主持组成联合舰队,筹划对中国作战、争夺制海权的桦山资纪。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那第三枚鱼雷——“目睹此情,本舰已无法躲避,我也只好闭目待毙。”蔡廷干也曾在战后报告中写道:舰上官兵都认为这枚鱼雷“定中无疑”,甚至开始欢呼。

但意外的是,双方等了良久,鱼雷仍未爆炸,又过了几分钟,那枚鱼雷才出现在“西京丸”右方海面,随即沉入水中。原来,它竟从“西京丸”的舰底穿过。“福龙号”的三枚鱼雷全部用完,只好退出战斗,并在撤退途中救起不少落水清军。

对于第三枚鱼雷在距离仅 40 米的情况下射失,后人有几种说法,一是认为原厂对鱼雷定深过深,导致射程和曲线出现问题,才从舰底穿过;二是“福龙号”距离“西京丸”太近,以至于鱼雷下沉时恰好从军舰的底部通过;三是认为“福龙号”在转舵时船体倾斜,舷侧鱼雷已深入水中,导致

偏差 ;还有一种说法 ,认为这暴露了蔡廷干平时训练不严的问题 ,并引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中将在战前的警示 :“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 ,无人掌管 ,外则铁锈堆积 ,内则污秽狼藉 ,使或海波告警 ,业已无可驶用。”

更大的争议发生在之后 ,黄海海战后 ,日军取得制海权 ,北洋舰队又因禁战命令而困守威海卫基地 ,蔡廷干所在的鱼雷艇队始终在威海卫和烟台之间海域游弋警戒。

1895 年初 ,日军由海陆两路进攻北洋水师基地。混战之中 ,蔡廷干与左一营管带王登云率十三艘鱼雷艇和两艘汽船分别突围 ,途中遭日军连续截击 ,溃不成军。“福龙号”因锅炉管道受损 ,被日军的“吉野号”追上 ,蔡廷干受伤被俘 ,被押送到日本大阪的一座寺庙中囚禁。

关于鱼雷艇队的突围 ,史学界多认为这是一次擅自突围 ,说白了就是逃跑 ,近年来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个人看法倾向于前者 ,军人违反军令 ,当然有错。自杀前的丁汝昌也曾感叹“自雷艇逃后 ,水陆兵心皆形散乱”。海战过后 ,清廷也曾通缉蔡廷干 ,要求“严拿正法”。

如此看来 ,蔡廷干被俘反倒成了幸运 ,否则难逃杀头。不过这种幸运也只是暂时的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 ,许多被俘的清朝官兵都被遣返 ,回国后均遭革职遣散处分。蔡廷干也在被遣返名单之列 ,但他作为被通缉人员 ,若被遣返 ,必要入罪。可他又一次被命运眷顾 ,他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师诺斯罗普正在日本游历 ,他的一个女学生是日本某伯爵夫人。蔡廷干得知后致信老师求助 ,终于将自己的名字从遣返名单中剔除 ,暂留日本 ,之后又前往美国继续读书。

1905 年 ,袁世凯向清廷上奏 :“已革北洋海军都司蔡廷干 ,其才可用 ,

甲午之役委系被虏并非潜逃,请将该员严拿正法罪名销去,仍留北洋差遣委用。”

袁世凯又一次成了留美幼童的贵人。他为何为蔡廷干开脱?有记载是因为唐绍仪的举荐,留美幼童的关系网再次发挥了作用。另外,袁世凯急需人才为小站练兵搭班子也是一大原因。在 1901 年出任北洋大臣后,袁世凯不断保奏,在甲午战争后被罢黜的海陆军人纷纷复职,蔡廷干只是其中之一。

与袁世凯共同进退

被袁世凯罗致麾下的蔡廷干,很快便因熟练外语和开阔视野脱颖而出。1909 年,袁世凯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回项城隐居,蔡廷干也随之退隐,以示共同进退。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重新出山,立即上奏,要求委任蔡廷干为海军部军制司司长,补授海军正参(即参谋长),但蔡名义上是海军将领,实则却负责外事。

后人推测,袁世凯的此种安排,与南方革命军的情况有关。当时在武汉主持革命军大局的黎元洪,当年恰恰是蔡廷干在北洋水师鱼雷艇队的部下。蔡廷干也确实与黎元洪有所接触,他作为袁世凯的私人代表,与刘承恩秘密前往武汉与黎元洪谈判。

这次秘密谈判后来变得不再秘密。这是因为革命军政府的其他成员并不真正信任被他们捧上台的黎元洪,当然也不会给他们密谈的机会,而是将蔡廷干等二人直接接入军政府议事厅,当众对其晓以大义。

1911 年 11 月 16 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 3000 多字的稿件,名为《蔡廷干上校来访接谈纪录》,作者是赫赫有名的乔治·厄内斯特·莫理

循。莫理循时为《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 ,号称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王府井大街在民国时代就曾因其被命名为“莫理循大街”。

此时的莫理循已年届 50,是绝对的老记者。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问题的专家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蔡廷干的交情。他压根儿不懂中文 ,他对中国政治的了解 ,各种消息的获取 ,主要来自于蔡廷干 ,他曾说蔡廷干“是我最熟悉的中国人……在我知道的中国人中 ,他英语讲得最好”。

蔡廷干赴武汉秘密谈判 ,亦被他得知。在那篇报道中 ,他记录了蔡廷干口述的谈判经过 ,文中有“最初蔡氏列举事实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制 ,但是在与革命党人交谈后就改变主意而赞成共和政制”的说法。

在这篇报道中 ,莫理循指蔡廷干起初坚持表示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 ,认为如果将省类比为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州 ,反而会有分裂危险。蔡廷干还转述袁世凯的意见 ,认为应保留清朝 ,限制君权 ,效仿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在他眼中 ,英国是最稳定廉洁的政体 ,共和国却往往腐败 ,如法国。当军政府代表让他举出一个君主制比共和制稳定的例子时 ,他以墨西哥和南美诸国为例 ,认为这些国家在建立共和制后 ,往往陷入动荡 ,隔三岔五闹革命。

莫理循还写道 ,蔡廷干内心其实也反清 ,但他更信任袁世凯的能力 ,认为袁世凯比革命党人更有稳定中国的希望。这次“密谈”虽然变成了公开会议 ,但对于蔡廷干而言却收获颇丰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与军政府人员当晚聚会 ,“亲如一家”,更因为他得到了强烈的暗示 ;只要袁世凯与革命党合作 ,逼清帝退位 ,就能成为未来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这恰恰也是袁世凯派他南下的目的。

也正因此 ,回京汇报的蔡廷干得到了袁世凯的嘉许。袁世凯亲自为

其请功,上奏表示:“海军正参领蔡廷干,娴悉外交,志趣纯正……即委令赴鄂宣谕,往返数次(‘数次’一说存疑),黎元洪迄未受抚,该员等单舸匹马,蹀躞枪林弹雨之间,卒能侦悉革党内情,于军事甚有裨益。自应量加奖励,以酬其劳。海军正参领蔡廷干,拟请以三品京堂候补,并赏给二品衔。”

进入 12 月,当唐绍仪作为和谈代表与伍廷芳在上海谈判时,蔡廷干与刘承恩再次作为“暗线”,秘密赴南方谈判。次年 1 月 18 日,蔡廷干致信莫理循,表示“我们同南方的革命党人还取得充分的谅解,待会面时再和你谈”。

表面看来,蔡廷干似乎是个守不住秘密的人,领导交给他秘密任务,他却跟记者大嘴巴乱说。其实不然,以蔡廷干的干练,将消息透露给莫理循,绝非头脑发热,而是别有目的,希望借助莫理循的记者身份和《泰晤士报》这一重要的国际性平台,选择性放出一些“内幕新闻”,以影响外界态度和局势。

当然,莫理循也并非仅受利用而无收获,他得到了大量独家新闻,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条莫过于 1912 年 2 月 17 日于《每日邮报》发表的“袁世凯剪辫子”新闻,其中有“今天下午蔡(指蔡廷干)当着一位秘书和袁的儿子袁云台面前,剪掉了袁世凯的辫子”之语。在之前那天,即 2 月 16 日,蔡廷干致信莫理循,信中说:“随函附上孙逸仙至袁宫保的电报,他们同意由我去剪掉大总统(指袁世凯)的辫子,而不去叫理发师傅,因为他会感到难为情,这是你的独家新闻。”

有趣的是,在 5 天前,即 2 月 12 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的当天,蔡廷干便已迫不及待地要剪掉袁世凯的辫子。袁世凯当时并未同意,蔡廷干当日便向莫理循抱怨,说自己的上司“讨厌至极”,“连辫子都不肯剪掉”。

在留学美国时代便以顽皮和桀骜著称的他 ,虽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极为感激 ,但却绝非袁的附庸 ,仍有独立意识。

莫理循与蔡廷干的“默契合作”,也使得这老外进入了袁世凯的视野。1912 年 8 月 1 日 ,莫理循被聘为民国政府政治顾问 ,辅助袁世凯处理外交事务、国际舆论引导等。这位已年届 50 ,本有意在新闻界隐退 ,却苦于拿不到《泰晤士报》退休金的老记者 ,突然迎来了新的工作 ,而且十分风光。

代表民国政府为莫理循双手奉上顾问合同的 ,恰恰是他的老友蔡廷干。合同约定 ,民国政府每年向莫理循支付 3500 英镑的顾问费 ,还有房租津贴 250 英镑和聘请机要秘书津贴 200 英镑 ,并免费配翻译一名。5 年合同期内 ,每年有 2 个月带薪假期 ,旅费报销。

这是一个惊人的大合同 ,因为何刚德曾在《客座偶谈》中写道 ,民国初年 ,袁世凯规定京官“无论大小 ,每人月俸六十元”,对这个标准 ,何刚德十分满意 ,表示“然即如此 ,已较前清宫俸倍蓰矣”。曹汝霖曾回忆 ,当时外务部总长的月薪不过 1000 元 ,次长只有 600 元。

有趣的是 ,其间还发生了一宗假新闻事件。1912 年 8 月 31 日 ,英国的《插图伦敦新闻报》为了体现莫理循在中国备受重视 ,也尽心为袁世凯效力 ,将一幅蔡廷干向袁世凯请示的照片移花接木 ,把莫理循的脑袋安在了蔡廷干的身子上。

此时的蔡廷干也得晋升 ,被袁世凯委任为高等军事参议、中将衔海军副司令兼大总统府副礼官 ,并授予二等嘉禾勋章。这是因为他在逼迫清帝退位一事中的积极表现 ,当时 ,他曾提议利用上海商会通过英国驻华公使约翰 · 朱尔典“向庆亲王和皇帝的父亲提出请愿书 ,敦促皇帝立即退位 ,理由是皇室妨碍和平 ,而没有和平是不可能恢复正常贸易的”。

这显然是从经济领域施压,而且利用上海自身的经济影响力与上海商会的号召力,促使全国各地商会跟随施压。南北议和时,他除了数次前往武汉外,也曾在京游说载洵等清廷显贵,使他们不再抗拒清帝退位。

1913 年,蔡廷干又被授予"勋四位",派充盐务稽核总所总办、税务处会办,位高权重。

离开政坛

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蔡廷干自然心存感激。毕竟,作为一个甲午战争中的战俘、一个清政府要严拿正法的逃兵,他不但仕途终结,连性命都已难保,是袁世凯使他免罪,并一步步将他提拔为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人物。而且,那时的袁世凯确实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人物,相比清室,他更有魄力,相比此前仅能依靠暗杀和零星起义整出点动静来的革命党,他更有声望;相比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极其关键作用的立宪派,他又更有军事实力。唐绍仪、蔡廷干和梁敦彦等当年留美的才俊,纷纷将希望寄托于袁世凯身上,并非只是报其知遇之恩,更有理想主义的因素。

可袁世凯多少让他们失望了。近年来,史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有所改观,肯定了其积极的一面,如在"二十一条"一事中,他的表现并非如传统教科书中那样铁心卖国,而是积极谋划、据理力争,并借助国际舆论,揭露日方阴谋,争回了一些权益。1915 年 2 月 5 日,袁世凯召见莫理循。莫理循后来这样回忆:"日置益对总长、次长的态度傲慢。他坚持(中国政府)全盘接受('二十一条')。但总统向我保证,决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作为弱国领袖,袁世凯的表现并非传说中那般不堪。但称帝与独裁,始终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也是蔡廷干、唐绍仪

等人与之渐行渐远的主因。

起初的蔡廷干仍坚定站在袁世凯这一边 ,将孙中山成立的“中华革命党”视为乱党 ,但随着袁世凯在帝制之路上越走越远 ,他的态度有所变化。也是在这期间 ,蔡廷干与老友莫理循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莫理循作为顾问 ,对民国政府确实有一些切实的帮助 ,如在“二十一条”一事中引来海外舆论发声 ,向日方施压。但他在西藏问题上偏袒自己的祖国英国 ,公然向袁世凯提出“不要把西藏当成中国的一个省”。

1915 年 3 月 2 日 ,蔡廷干曾致信莫理循 ,信中说 :“世界上的祸害来自‘做得过火’;德国人的罪过在于‘做得过火’;日本人的罪过在于‘做得过火’。陈友仁正在做得过火 (陈当时在报纸上声讨日本),但是我将派我们办公室的董先生 (董显光)去劝他温和一点。”

此信看似寻常 ,但其中多少有蔡廷干内心情绪的流露 ,比如对日本的厌恶 ,对袁世凯执政的失望……

据说 ,袁世凯死前不久曾致电蔡廷干 ,二人在袁卧室中相见。袁世凯对蔡廷干说“听说各国公使都认为我必会辞职”,蔡廷干的回答是 :“所有的人都认为您很需要休息 ,您应该去休息。”

显然 ,蔡廷干在这次试探中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也正因为与袁世凯的最终决裂 ,蔡廷干在段祺瑞执政时代仍得重用。值得一提的是 ,在袁世凯死后 ,蔡廷干的老下属黎元洪上台做总统 ,老朋友莫理循一度打算故技重施 ,希望担任黎元洪总统的顾问 ,但蔡廷干没打算为他牵线 ,一口回绝之 ,自己也习惯不做 ,隐居京中。

1917 年 10 月 7 日 ,段祺瑞授予蔡廷干“二等宝光嘉禾章”。1918 年 5 月 ,蔡廷干出任修改税则委员会主任兼全国税务学校校长 ,同年 10 月被授予“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年底被任命为总统府副大礼官 ,重返他一

度阔别的总统府。1919 年 1 月,他出任“敌国侨民遣送事务局会办”,4 月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这次任职颇具重要意义,前会长沈敦和被迫辞职,这标志着北京政府全面接管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由此前的半官半民组织变成官方组织。

1919 年 9 月,蔡廷干又被北洋政府授予“一等大绥嘉禾章”,10 月,被授予“一等文虎章”,1920 年 1 月,被授予“一等大缀宝光嘉禾章”,一连串的嘉奖,可谓礼遇甚隆。

段祺瑞之所以如此礼遇蔡廷干,一方面是因为他“站队”正确,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了他在外交方面的资历与才干。在袁世凯时期,蔡廷干并没有实际担任外交领域职务,但却是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隐形负责人,声望资历均极高。

不过,这位老资格的外交干才虽尽心竭力,却往往直率,不给人面子。比如 1921 年,他以税务处会办身份出席于华盛顿举办的国际税务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各国达成协议,准备于 3 月份在上海召开关税修订会议,由蔡廷干担任会议主席,计划讨论、签订协定后,次年 1 月开始执行修改后税率。但北洋政府迟迟未提出解决“二十一条”的方案,这种低效率和不作为导致会议期间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受到阻碍。蔡廷干对此大为不满,与共同担任代表的王宠惠、顾维钧和颜惠庆共同辞去代表工作,认为“政府坐失良机,漠视会议内英、美、日同流合污给中国施加的无理压力”。

这四位会议代表,实则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代精英,阵容极其豪华,在外交和法学领域都是货真价实的专家,但在当时却无用武之地,实在可叹。

好在,他们的抗议引来了国内舆论的支持,迫使政府积极介入。四

人也重任代表 ,继续为国家争取权益。

此后 ,他又被任命为整理国内外债务委员会成员和“筹备特别关税会议”委员会主任。1925 年 10 月 26 日 ,国际特别关税会议在北京召开 ,蔡廷干、王宠惠、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黄郛和莫德惠等 13 人组成中国代表团 ,为中国利益据理力争。会议虽因直奉战争而一度停顿 ,但在次年复会时 ,蔡廷干继续力争 ,最终各国代表一致同意“中国关税应由中国自主”。其间 ,他还曾担任多项职务 ,参与公共事务 ,如中国赴美留学生会会长等。

1926 年 6 月 ,走马灯一般上台下台的北洋政府迎来了新一届内阁——杜锡珪内阁。这位海军名将在内阁总理位置上仅仅待了 4 个月 ,但在北洋时代 ,这个时间却不算短。蔡廷干是这届内阁的外交总长 ,杜锡珪于 10 月去职后 ,他一度代理内阁总理 ,尽管局面尴尬 ,却也是他从政的最高峰。

1927 年 5 月 ,蔡廷干去职 ,隐居大连 ,从此离开政坛。

晚年从文 ,一代儒将

隐居大连时的蔡廷干 ,曾因声望而备受野心勃勃的日本人看重 ,日本领事、商人都曾对其邀约拉拢 ,蔡廷干始终坚拒。九一八事变后 ,他离开东北 ,回北平定居。这位中英文底子都极其深厚的老人 ,是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客座教授 ,主讲《中国文学》。他以英文译中国古典名著亦从此时开始 ,《老解老》和《唐诗英韵》都因此诞生 ,这两本书都曾展出于美国圣路易博览会。此外 ,他还翻译过《阅微草堂笔记》、《红楼梦选篇》,惜未成书。也正因此 ,他得了“儒将”美誉。

1935 年 9 月 20 日,他病逝于北平——这是他一生中所处时间最长的地方。

他的家乡呢?似乎从他远赴美国开始,这个名词就已在他的生活中淡出。据载,他留学归来后,仅仅返乡一次,且并非是在留学归来的初期,而是在晚年。

如今的我们,对此也许很难理解。即使留学是被迫停止而非主动回归,但毕竟离家多年,就算不是归心似箭,回家看看也是情理中事吧?即使当时前程未卜,可安顿下来也可以返乡吧?即使宦海浮沉、忙于公务,也总有衣锦还乡之时吧?可是,这件大多数留美幼童都曾做过的事情,蔡廷干偏偏没干过,直到晚年,他才短暂回乡,几乎未留下什么痕迹。

想来,这也许与他骨子里的叛逆有关——早在留学时,他就以顽皮反叛著称。

不过也正因为这样,蔡廷干这位曾在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家乡却声名不彰。如今的珠海已经无法寻得他的故迹。资料中所记载的故居——上栅村两围城长巷 19 号,如今也是一栋后来兴建的普通民宅,故居早已被毁。相比同乡唐绍仪等人的大名鼎鼎,他几乎不为本地民众所知。

据记载,在蔡廷干晚年短暂回乡期间,曾在与祖居相隔不远的珠海淇澳岛隐居。当时,他的同学、老友唐绍仪正在修建著名的共乐园。他还曾在淇澳岛的一块大石上书“松涧流泉”四个大字,如今,这块大石早已不存,小岛历经数十年变迁,目下已修有崭新的柏油马路,海岸亦成了许多人就近拍婚纱照的选择,还有个不大不小但颇趣致的公园,可爬山观海,是我常去的地方。不过,尽管大石已经消失于水利工程,但“松涧流泉”已成淇澳八景之一。

蔡廷干与香山的另一联系 ,是他娶了同乡为妻。这位同乡出身赫赫有名的珠海徐家 ,是大买办、中国近代工商业奠基人之一徐润的妹妹。香山名人们的彼此联姻 ,是那个时代一个极有趣的话题 。

梁诚 :促成庚款留美的功臣

早年的留美幼童中 ,广东人占半数以上 ,其中香山人又占半数以上 ,以至于我在寻访留美幼童故居时 ,总在如今的中山与珠海两地打转 。

香山留学生之所以多 ,与澳门有极大关系 。香山人在澳门这个窗口耳濡目染 ,见识先进文明 ,自然得风气之先 ,对西方心生亲近靠拢之意。当时的广州是“一口通商”时代的“独苗” ,虽不似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那般全面开放 ,但也可以给市民们提供开眼看世界的机会 ,所以亦涌现了不少留洋先驱。

留美幼童梁诚便是广州黄埔 (即今广州海珠区黄埔村)人。当时的黄埔村 ,依偎着黄埔港 ,黄埔港是粤海关的挂靠口 ,也是商船主要停靠的地方。与商船上的洋人做生意 ,提供各种航海所需用品 ,早已是黄埔村民生活的一部分。梁诚从小便见惯了新式轮船和各色人等 ,视野自然比同龄内陆儿童开阔 ,加上其父早早便远赴美国经商 ,更使梁诚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

他是第四批也是最后一批留美幼童之一 。当时的留美幼童 ,不但需要考试 ,也需要保人 ,他的保人是族兄梁肇煌 ,时任顺天府尹。1881 年 ,他与其他幼童一样 ,被强行征召回国。

回国后的幼童们一度遭屈辱对待 ,分配亦是随意而为之 ,完全不看

专业、年龄和经历。但梁诚运气不错 ,进入举足轻重的总理衙门任职 ,算是当年幼童中分配去向较好的一个 。

1886 年 ,梁诚以候补县丞身份随驻美公使赴美 ,后升任参赞 ,正式步入外交领域 ,开始了自己的外交官生涯。1897 年 ,他又随公使赴英国 ,参与维多利亚女皇登基 60 周年庆典 ,返国后得授直隶候补道 。

这位将梁诚带在身边的驻美公使 ,其实也是将之招入总理衙门之人 ,堪称梁诚生命中的贵人。他是晚清著名外交官张荫桓 ,籍贯广东南海 ,与梁诚有同乡之谊。张荫桓曾深受光绪信任 ,还曾向光绪举荐了自己的同乡康有为。戊戌政变后 ,张荫桓被流放新疆 ,但梁诚并未遭受牵连。

1900 年 ,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庚子拳乱”中被杀 ,次年 ,梁诚随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谢罪”。威廉二世提出无理要求 ,要求中方人员叩头道歉 ,中方拒不接受 ,梁诚则建议以西方礼节代替 ,鞠躬表示歉意 ,化解双方争端 ,此事引来英美舆论界赞赏 。

这桩事情 ,在某些人看来或许仍是屈辱 ,以鞠躬代替磕头 ,似乎半斤八两。但实际上 ,弱国无外交 ,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当事人的巨大努力 ,许多如今看来貌似可笑或无用的细节 ,在当时却足以耗尽一代精英的心智。若非如此 ,苛刻的英美舆论也断不会关注这个细节 ,并大加褒扬。

1902 年 7 月 ,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等国公使伍廷芳任期已满 ,梁诚接替 ,赏三品衔 ,出任以上各国钦差大臣 ,于次年 4 月到任。1907 年 6 月 ,他离任回国。他人生中最大的历史贡献 ,就出现于这 4 年任期内。

梁诚抓住了美国政府的心理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与列强签下《辛丑条约》。在赔款所用货币尚未明确时,美国先期同意清政府以白银交付赔款,但后来各国一致主张以黄金交付赔款,美国也改为跟随。后来,清政府因金银汇率变化,深感以黄金赔付的压力太大,便命梁诚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改用白银交付赔款。在庚款退还一事最终促成后,梁诚曾这样回忆:"此事之缘起,系我国政府命予商请贵国政府将辛丑条约所载赔款,暂改收银,因该约所载赔款数目之用金用银,欲求公允,尚需重议也。"(见于 1907 年 9 月 30 日香港《中国日报》编译的《鸟约泰晤士报纪美国减收清国赔款事》)

但既然以黄金支付对美国有利,对方又怎会轻易更改?1905 年 1 月 19 日,梁诚致函外务部,表示"诚遵即面告美外部海约翰(指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海云此事前接康使来电,经已复令按照各国一律办理。诚告以赔款用银,美国独倡其议,且已慨允于前,安可反复于后,海云当时用金用银之说未定,美国顾念邦交,特允暂行用银,以待各国公议,今各国既得贵政府允认还金,美国自当一例相待"。

也是在这份公函中,梁诚还写道,他极力劝说海约翰,表示:"中国财政支绌,贵大臣所深知,现筹赔款已穷罗掘,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艰于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祸患何勘设想。贵大臣素主保全宗旨,当能为我筹也策。"

不得不说,梁诚的策略十分正确,他告诉美国人,若中国财政出现问题,就只有加税一途,但加税必然引发民怨,进而冤有头债有主,激发仇洋情绪。这个思维路线图画得挺长远,但恰恰是美国政府最担心的。早

在 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前的谈判过程中 ,负责谈判的美国专使柔克义就曾致函海约翰 ,表示 :“我们必须尽可能防止因偿付赔款而对中国百姓开征新税 ,因为这样做会加深和延续他们的敌对情绪 ,我们最终所受的损失会比现在所要取得的几百万还多得多 。”海约翰也曾致电柔克义 ,表示“本政府认为 ,更多的优惠和实行行政改革要比大量的金钱赔偿更合乎需要”。也正因此 ,签订《辛丑条约》时 ,美国已经比他国显得更为克制 ,在赔款问题上主张“这些赔款的总额不应超过一个合理的数目 ,应该完全在中国的偿付能力之内”。

在政治角力中 ,最忌讳的就是短视 ,涸泽而渔、焚林而猎都为智者不取 ,相比争取中国人的“信赖” ,进而获得更大利益 ,钱反而变得次要。梁诚此时的劝说 ,恰恰与柔克义几年前的说法一致。

梁诚在公函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听完梁诚的劝说后 ,海约翰“动容 ,默然良久 ,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 ,现在各国还金已有成议 ,美款较少 ,即使收银亦省无几”。

听到“原属过多”这个词后 ,梁诚便不再在“黄金还是白银”这个问题上纠缠。他转而调查当年的赔款数字 ,发现当年美国的实际损失尚不及所摊分庚子赔款的一半。关于赔款的具体数字“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苏云峰曾在查阅美国政府于 70 年代后逐步解密的档案后披露 ,美国在庚子事变中的实际损失为 1165.5 万美元 ,但所获赔款为 2444 万美元 ,即多收赔款高达 1278.5 万美元。还有一说 ,指梁诚经调查后发现 ,这 2444 余万美元的赔款中 ,“美国商民应收之款仅计二百余万 ,而当时海陆军费已由飞猎滨(即非律宾)防次全案报销” ,即美国政府手头掌握赔款达 2200 万美元 ,故梁诚在致外务部的公文中 ,也有“两千两百万金”的说法。

聪明且不拘泥的梁诚明白 ,相比赔款支付方式 ,美国多收的这些钱

才是大头。于是,他改变了目标,转而游说海约翰退还庚款,他曾记录:“诚以其(海约翰)语意较松,或不过于坚执,因语以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海言贵大臣所言确有至理,自当极力代谋。”显然,相比庚款,美国政府更在乎那个“如能倡首,义声所播”的好名声。海约翰也曾表态,“此事倘议院不生阻力,必于贵大臣(指梁诚)任内办妥”。时任总统的罗斯福也对退款一事不表反对,一切似乎充满曙光,只待议会讨论批准。

此时的梁诚也已经想好了退还庚款的用途。1905 年 4 月 10 日,他再次致函外务部,函件中写道:“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在我国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益损益已适相反。”

但弱国外交注定波折多多,庚款的退还绝非一帆风顺,等待梁诚的是又一轮艰苦的谈判。

离任前促成庚款退还

1905 年,抵制美货运动爆发,加之日俄战争的缘故,庚款退还一事陷于停顿。其间,梁诚多方奔走,成效不大。也有一种说法,指抵制美货运动有梁诚的暗中谋划。在此前的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华工勤劳,且愿意接受较低工资,为美国当地人所不喜,加之种族主义者的推波助澜,美国形成了排华高潮,国会通过排华立法。梁诚就任公使后,虽反复交涉,但始终不能改变美国政府的排华倾向,于是他转而向清政府建议,暗中鼓励民间的抵制美货运动,并积极维护在美华人权益。1905—1906 年,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直线下降 ,对美国政府也大有触动。

此外 ,由于排华问题 ,中国人的海外留学多转向日本 ,也使得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在这些因素之下 ,美国自身的战略考量 ,最终为庚款退还并用于中国人留美提供了契机 。

1906 年 ,美国伊里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致信总统罗斯福 ,表示 :“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 ,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 ,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 ,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 ,那么 ,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 ,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 ,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 ,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 ,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 ,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这个说法显然能够打动罗斯福和美国政府。

1907 年 ,停顿已久的庚款退还谈判重新开启。梁诚在核实庚款数字时尽心竭力 ,有“能得一分之核实 ,即可少一分之本利 ,即可纾一分之财力”之语。当年 8 月 ,他又托时任美国内政部长的詹姆斯 · 加菲尔德、时任商务和劳工部部长的奥斯卡 · 斯特劳斯二人向罗斯福总统进言。罗斯福亦表示同意退款。

但在此时 ,梁诚遭遇了又一个难题——他将卸任回国。《纽约时报》就在 4 月 23 日刊登了梁诚将卸任回国 ,担任外务部右侍郎的消息 ,这个消息的来源即使不是梁诚本人 ,也是其身边亲信。事实上 ,此时的梁诚早已是“超期服役”,当时驻外公使任期多为 3 年 ,他则于 1902 年 7 月被任命 ,任期已近 5 年。

在《纽约时报》刊登其离任消息的 3 天后,即 4 月 26 日,美国詹姆斯敦博览会开幕,罗斯福莅临开幕式,梁诚亦受邀参加。据载,二人私交甚笃,梁诚亦借机谈到庚款退还一事,罗斯福同意安排时间会谈,并表示会在梁诚离任前解决此事。

5 月 1 日,梁诚与罗斯福等人共进午餐,即离任前的话别。次日,他又与罗斯福进行会谈,核减庚款数目。而在 5 月 3 日,梁诚接到了清廷外务部的电报传旨,梁敦彦将出任美墨秘古四国大臣,接替梁诚的工作。次日,外务部又发来电报,指梁敦彦不能立即到任,但梁诚亦不能留下,应委托他人暂时代理使馆事务,速速回京报到。此时正值庚款退还谈判的关键时刻,梁诚自然不希望功亏一篑,便向外务部回电,表示:"连日迭晤美总统、外部,磋商减收赔款事,今晨与总统、外部三面商妥,准所开海陆军费多至一千一百万元,总统允分行海陆军部,切实核减,再由外部备文来告,作为证据。称约两旬可宣布。俟宣布后,立即订船期赴京供差。"

在军费核减一事上,梁诚转述美方说法,指"约两旬可宣布"。但由于海陆军军费开支增大,庚款数目的计算变得复杂,所以,即使有罗斯福总统亲自责成海陆军方面进行核减,仍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过程。当月下旬,梁诚还曾给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发电报,称减收赔款一事必可办成,张之洞则于 6 月 5 日回电,大赞梁诚之壮举,认为"减收赔款事,久无成议,今承荩筹干运,居然允许,具见诚信远孚,为中国收回巨款,似此折冲樽俎,屡有裨益大局之举,海内外实无伦比,钦佩万分"。

1907 年 6 月 15 日,梁诚终于收到了美国方面的外交照会,他立即向清廷外务部发电:"辛丑赔款,美国二千四百四十万金圆有奇,利息称是。诚抵任,探知开销之数,实不及半,经与外部切实磋商,并将办法,随时函

报在案。本日接外部文 ,现计美国政府商民支恤款项 ,不过一十一兆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二金圆六角九分 ,愿将中国允还原议更正 ,照数减收 ,奉总统谕允 ,令国会照行 ,以表两国交谊等情。查所拟收数 ,比较原数实减让一十二兆七十八万五千余金元 ,利息一十五兆一十三万余金元 ,统共约合华银三十三兆五十余万两……”

也就是说 ,美国终于决定核减庚子赔款 ,由本金 2440 万美元减为 1165 万美元 ,退还中国 1278 万余美元。

此后的一系列礼尚往来 ,当时的媒体与后世学者均有记载。

6 月 18 日 ,梁诚发表声明 ,表示自己已于 15 日收到美国政府的照会 ,罗斯福总统将在下届议会上提议放弃 1165 万美元之外的全部款额。6 月 20 日 ,《纽约时报》以“全世界的一个榜样”为题 ,赞扬美国的高尚和慷慨。6 月 23 日的《纽约时报》则发表梁诚专访 ,题为“中国赔款是如何减低的 :中国公使梁诚爵士透露有趣的最近外交史 。他首次讲述如何为他的国家省了 2700 万元”。

当时 ,清廷外务部因未接到美国照会函件 ,暂时未向罗斯福致谢。梁诚作为深谙形势的外交官 ,于 6 月 22 日致电外务部 ,表示 :“减收赔款事 ,美外部文 ,语意确实 ,总统嘱诚转达。彼既有此美意 ,似应早沛纶音 ,勿令稍生疑虑 ,伏祈核夺。柔使训条 ,当系邮递。”

6 月 24 日 ,他接到外务部电报 ,电文是 :“初五日 (6 月 15 日)电悉 ,减收赔款事 ,美总统笃念邦交 ,义行独倡 ,实深欣感。已奏闻 ,奉旨 ,传旨致谢 ,钦此 ,即钦遵译达。”

6 月 28 日 ,梁诚给外务部回电 :“奉十四日 (6 月 24 日)电 ,与总统订期 ,十七日 (6 月 27 日)赴其乡居 ,传旨致谢 ,礼成。”当日的《纽约时报》也刊发了梁诚向罗斯福致谢并话别的通讯 ,刊登了清廷给美总统的感谢电

的内容。

7 月 3 日,也就是梁诚离开美国的当天,他写下这样一份奏折:“圣鉴事:窃臣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1907 年 5 月 3 日),承准外务部电开,本日奉旨,梁敦彦著充出使美墨秘古大臣,钦此。二十二日承准外务部电开,新使到任需时,希派员代理使事,迅即回京供差,等因。适臣与美外部磋议减收赔款一案,正有头绪。当经电咨外务部,俟赔款议妥,得有照会作据,立即定期起程。去后,兹接美外部来文,减收赔款,事已妥协。自应遵照部电,将美墨秘古使事,遴选暂留美馆二等参赞官周自齐代理,定于五月二十三日(7 月 3 日)由美都起程,即于是日交卸。”这也算是对庚款退还及推迟回国一事的详细交代。

当天,他与家人向使馆人员和朋友告别,并与代理公使周自齐一起身穿官服,来到车站,并发表演说。次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梁诚离开的消息。

国家大事解决了,但梁诚的“个人问题”却变得扑朔迷离,因为,就在这短短月余时间里,国内官场局势变得十分复杂。

梁诚的仕途疑云

前面提到,梁诚接到了清廷外务部发来的调令,但这个调令有个古怪之处:它并未指出梁诚将改任何职务。

这个在官场上极不合情理的情况,让这边正在等待美国核算军费的梁诚很难不“一心二用”。于是,他发电报给驻英国大使汪大燮写信了解情况,5 月 14 日,他收到汪大燮的回电:“函悉,燮系外部折,奏明回京供职。公居忧,故云供差,度外税两事。省亲假,宜电奏,满即入都。减赔

事慰贺。”也就是说 ,汪大燮也接到调令 ,他还猜测梁诚可能会在外务部或税务司供职。次日 ,他又接到了继任者、也是当年留美同学梁敦彦的电报 ,问他何时回国 ,梁诚回电表示计划于 8 月 5 日抵达上海。按当时交通情况推测 ,他应该以为庚款退还一事将于近日内有结果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直到 6 月中旬 ,美国政府才完成各种核算 ,发出照会。

收到照会的第二天 ,即 6 月 16 日 ,梁诚便订好船票 ,准备回国。也是那天 ,他致电外务部 ,表示 :“本月二十三日 (阳历 7 月 3 日)起程 ,遵派参赞周自齐代理使事。此次回国 ,船经“中国香港”距原籍只半日海程 ,拟乞天恩 ,赏假半月 ,回籍省亲。假满 ,遵即回京供差 ,不敢自外生成 ,乞代奏。”6 月 18 日 ,他收到回电 ,赏假半个月 。

而就在之前那天 ,即 6 月 17 日 ,清廷发生了一件大事 :军机大臣兼政务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被解职 ,开缺回籍。

权倾一时的瞿鸿禨之所以被解职 ,是因为得罪了慈禧 ,又与同为军机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关系不睦。与庆亲王来往甚密的袁世凯指使侍读学士恽毓鼎弹劾瞿鸿禨 ,慈禧则顺坡下驴 ,将瞿鸿禨踢出京城。此事即“丁未政潮”。

瞿鸿禨此前是梁诚的直属领导 ,作为驻美公使 ,梁诚曾与兼理清廷制度改革的瞿鸿禨有频密书信往来 ,在行政和外交方面都有献言。此前 ,《纽约时报》曾传出的梁诚将回国担任外务部右侍郎的消息 ,想必也与瞿鸿禨的人事安排有关。当时 ,原任外务部右侍郎的唐绍仪调任奉天巡抚 ,右侍郎一职空缺 ,梁诚便是外界主要猜测的继任人选 。

也正因此 ,后人大多如此推断 :若梁诚能够在 5 月 4 日接到调令后立刻选择回国 ,就会在瞿鸿禨被免职之前得其重用 ,出任外务部右侍郎。但因为梁诚忙于庚款退还一事 ,推迟回国 ,国内又遭遇“丁未政潮”,瞿鸿

襞人走茶凉,外务部右侍郎的职位又必然被其他谋缺之人觊觎,最终导致梁诚与这一位置无缘。

我倒是对此持保留看法。梁诚热心于庚款退还一事,不但功在千秋,对自己而言亦有几分“积福”的意味。若他及时回国,即使真的能出任外务部右侍郎,但瞿鸿禨失势,其所提拔的人在新领导面前也未必能顺风顺水,甚至会遭排挤。官场倾轧甚多,派系林立,远离漩涡绝非坏事。

从历史来看,但凡能够放弃一己私利,为后世谋福的官员,往往能在阴差阳错中得到老天庇佑,避开政治漩涡。即使一时未得升迁重用,又焉知非福?

既然说到历史,便再说一个细节吧。前文所提到的那份由梁诚于 7 月 3 日离美当天发出的奏折,也被后世学者常常引用,这原本正常,但有些人将之曲解,认为这是外务部强行命令梁诚于 7 月 3 日卸任,还称梁诚离美当天还得到了美国国务卿的会晤邀请,却已无法参与。

之所以有如此曲解,多少有点意识形态的因素作祟。清政府一度是封建腐朽落后的代名词,按照“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理论,清政府怎能干好事?偶有封建官僚干了点利国利民之事,背后若无清政府添乱干涉的戏份,简直“对不起观众”。于是,梁诚的回国,必须加上清政府的百般阻挠。

其实,晚清政府远非想象中那样腐朽,具体到此事,梁诚也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空间。从来往电报来看,并无任何上级对梁诚有苛刻要求。作为外交官,梁诚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清政府显然相当尊重远在海外的外交官的处事权。

不过,回国后的梁诚,确实有些失落。他在家乡休假半月后,于 9 月

初抵京 ,慈禧太后召见了他 ,并赏赐一品顶戴 ,但这些都是虚玩意儿 ,他并未被安排实职 ,之前传闻的外务部右侍郎 ,以及汪大燮猜测的税务司任职 ,都未落实。

也是在 9 月 4 日 ,刚刚将瞿鸿禨挤走的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后世一般认为这是慈禧的权谋 ,明升暗降 ,夺去了袁世凯的兵权。于 9 月 13 日上任的袁世凯 ,第一时间做出了一个人事安排 :将原先要赴美接替梁诚的亲信梁敦彦留下 ,任命为传闻中要授予梁诚的外务部右侍郎。

很显然 ,梁诚不像梁敦彦 ,不是袁世凯的“自己人”。

当年的留美幼童 ,但凡仕途得志者 ,多为袁世凯的亲信。甚至可以说 ,袁世凯是许多留美幼童的贵人 ,若无这位实用主义者的不拘一格 ,曾被忽视甚至遭歧视的留美幼童很难有出头之日 。唐绍仪、梁敦彦和蔡廷干等人都是袁世凯的心腹。

但是 ,梁诚却不是。

有人说这是因为梁诚曾经留学 ,又长期在国外工作 ,习惯了西方的人际关系模式 ,不谙官场之道。这当然是一个原因 ,却非主要原因 ,同为留美生的唐绍仪等人便八面玲珑。而且 ,梁诚既然能够长期为官 ,并在外交工作中如鱼得水 ,必有其人情练达的一面。后人的所谓“不谙官场之道” ,实则是惋惜式的褒扬 ,但却有点“为尊者讳”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梁诚的仕途经历 ,相比他的同学们 ,梁诚的起点明显要高 ,早早就得到了张荫桓的提携。而唐绍仪却经历过沉寂 ,蔡廷干一度成为日军俘虏 ,梁敦彦甚至在回乡为父亲办丧事后一度潦倒 ,连返回天津工作的路费都没有 ,在广州街头流浪。

换言之 ,大家都需要袁世凯这个“贵人” ,梁诚却刚好不需要。

而且,早在 1905 年 1 月,梁诚就与袁世凯闹过一次不愉快。当时,袁世凯给远在美国的梁诚发电报,要求从驻美大使馆中借用一人:“崧生(即梁敦彦,时任天津海关道台)为莲府(即杨士骧,时任山东巡抚)邀钟子垣赴东,务允借用,并饬速来,至感。”梁诚则回电,称“钟守现充驻吕(吕宋)总领事,繁要难离,歉甚”。

有人说袁世凯当时正得势,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还有六路新军做靠山,梁诚居然放弃了这个跟领导拉关系套近乎的机会,反而选择了拒绝,可见梁诚为人耿介,不满袁世凯的专横跋扈。这个结论其实又有意识形态的痕迹,甚至可以说是先有结论(“袁世凯专横跋扈”),再以结论倒推论据。其实,官场上借个人本是寻常事,应承与否也极寻常,并不能说明问题。而且,虽然袁世凯得势,但梁诚选择拒绝未必能说明自己耿介,也可能有派系不同、后台够硬之类的因素,至于说袁世凯跋扈,那更是荒谬——循正途借个人,哪里跋扈了?

之后,袁世凯仍想借调钟子垣,钟子垣本人也发电报给梁敦彦表达了自己想被借调的愿望。据载,当时钟子垣在吕宋岛解决华商贸易的纠纷,当地商会竭力挽留,梁诚也坚持要他解决问题后再走。这个要求本不过分,不过钟子垣的这次借调还是拖了半年之久才告完成。

有人认为梁诚就是因此事得罪了袁世凯,其实得罪倒也未必,但梁诚并非袁世凯的“嫡系”,则是可确认的。

好在梁诚并未赋闲太久,由于粤汉铁路事务恰好无人署理,广东方面邀请梁诚前往担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后来,袁世凯失势,梁诚又回归外交领域,1909 年 8 月随海军大臣载洵出访美国,1910 年又得摄政王载沣征召,领内阁侍读学士,任出使德国大臣,直至清廷覆亡才解职回国。

民国成立后 ,尽管老同学唐绍仪、老部下周自齐等人都曾力邀他出山任事 ,但他始终拒绝 ,不知是不是与袁世凯的不睦有关。但可确定的是 ,他不愿做民国的官 ,并非是以清朝遗臣自居 ,因为就在 1912 年 2 月 5 日 ,他还联合时任驻英公使的老同学刘玉麟一起上奏 ,请清室速速颁旨退位。

此后的他 ,返回家乡广州黄埔村侍养老母 ,后举家迁往香港 ,1917 年病逝 ,时年 57 岁。

为何被遗忘?

梁诚这一生 ,不但有促成庚款退还的功绩 ,还曾协助张之洞从美国手中夺回粤汉铁路的租让权 ,还曾制止美国、墨西哥颁布极具歧视性的“华工契约”,可谓功勋卓著。他曾获得多枚外国授予的勋章 ,其中两枚爵士勋章来自英国 ,此外还有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罗斯和日本等国的级勋章。但这一切 ,似乎早早就被人所遗忘。

《吴宓自编年谱》中就曾记载 :“宓在文案处一年 ,得阅读许多秘密之档案 ,备悉早年清华创办之实况与详情……例如美国何以独慷慨愿退还此一部分之‘庚子赔款’? ——实由我国驻美公使梁诚 (广东省人),曾在美国国务院阅读其秘藏之档案 ,又在美京国会图书馆翻阅各种记载、文件 ,得知美国政府 1901 年向中国政府索取庚子赔款时 ,其所提出美国人在北京等处所受义和团焚杀劫掠之损失 (生命财产),事实不尽正确。故由此根据而造成之赔款数目字 ,亦是曾经妄为扩大 ,实嫌太多……彼美国人已承认其为‘虚构捏造 ,不合事实’,而责评其‘索取过多 ,不合道德’者矣……梁诚公使乃取此类之事实与文件 ,分别编录成册。暇时 ,辄与

所识美国国务院及外交部之官员,从容谈说。最后,乃直对国务卿海约翰氏婉言:以美国之富,与中美邦交之厚,美国岂吝此区区资财。若能根据切实之调查,将其中‘多取、不应取’之部分,全数退还中国,又须善为使用该款,例如派遣中国男女学生,赴美国留学,则在美国既光明正大、改正其错误,中国亦感激受惠之深,从此更诚心倾向美国矣,云云。海约翰氏深为所动,遂有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之义举。此 1907 至 1908 年事也。”

吴宓还曾感叹:“六七十年来,即由清华出身之留美学生中,有几人得知美国此义举半出于被动?谁知梁诚公使之智术与伟功哉?”

其实,在吴宓感叹此事的很多年前,梁诚就已经被遗忘。1918 年,也就是梁诚促成庚款退还的 11 年后,清华出版《清华年刊》,其首页献词为“献给为退还庚款做出贡献的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可 3 年后,即 1921 年,清华出版《建校十周年纪念刊》,其中《清华园与清华学校》一文中写道:“可是退还赔款一件,既非我国政府的起意,也非美国政府的自动。我们要推求本校第一的功人,还应该感谢促成此事美前外交总长海约翰和当日外务部之中堂尚书,劝令美国减收赔款及主张办学以兴起美人之观感的驻美梁前公使……主持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一举,在我国由梁氏(即梁诚)独争,在美国亦由梁氏首倡……独梁氏的劳绩至今没人提及也没人知道,这是我们所不可不牢牢记住的。”可见仅仅 10 余年后,梁诚就已被人遗忘。

冯友兰的一个笔误使得梁诚这个名字进一步被遗忘,1931 年,他为清华撰写《校史概略》,提到庚款退还一事,称赞梁诚“志不少衰,努力进行”,但却将梁诚写成“梁晟”。1981 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仍沿用此错误写法。

而在旧时各种留学史著作中 ,更是一度将庚款退还一事视为美国政府的主动行为。胡适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更是直指罗斯福为最关键人物 :“西历千九百零七年十二月 ,美国总统罗斯福君咨文议院 ,中有一节论赔款善后事宜 ,其言曰 :当日政府之初意 ,本欲俟各种损失清偿之后 ,即以盈余之数交还中国 ,以为友谊之证 ,云云。是为美国退还赔款之议之肇端。罗氏又云 :此邦(美国)宜竭力助中国之教育发达 ,使此地大人众之帝国 ,能振拔以适于今日之竞争世界 ,即如招致中国学生来此邦留学高等教育 ,亦达此目的之一法也。据此则赔款遣学生 ,其议实创自罗氏也。”

此后 ,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留学史著作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作者封新城 ,写于 20 世纪 30 年代),还有林子勋所著的《中国留学教育史》,都将庚款退还视为美国政府的主动行为 。还有人认为幕后功臣是美国牧师史密斯(中文名为明恩溥),此说的来源为康纳里斯 · 贝顿于 1924 年所撰的文章 ,其中提到 :“在这两次会议的餐后演讲中 ,史密斯博士曾谈到庚子赔款的尚未动用部分 ,该项巨款经过各方合法的要求 ,已为华盛顿国库所冻结。按照史氏的意见 ,此巨款应该真诚地归还中国 ,不过 ,必须在巩固两国友谊的方式下来实现……可以规定必须用在选送优秀中国青年来美深造 ,同时更规定此项学生回国后 ,必须担任公职 ,或从事于公众福利事业。”此说得到李绪武的《清末留学教育之研究》引用 ,认为“美国放弃此项赔款 ,史密斯博士之功也 ,史氏为美国传教士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回国 ,力主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 ,适当运用 ,以增两国之国交”。

历史总能遮蔽一个人的功绩 ,让人慨叹。

抢了欧阳庚的功劳?

不过,在慨叹梁诚被遗忘的同时,不得不说起另一桩与他有关的公案。

近年来有一种说法,指梁诚其实也非庚款退还的第一功臣,关键人物应是他的留美师兄、同为外交官的欧阳庚。

此事与孙中山有关。1894 年,孙文在美国檀香山组建兴中会,次年发动首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事败后,他逃出广州,经"中国香港"日本,又来到檀香山。

孙文于檀香山入境时,需人担保。他登记姓名孙逸仙,并致信欧阳庚,要求这位香山老乡作保。欧阳庚爽快应承,还为他安排生活,方便其在美国华人中传播革命。

欧阳庚为孙文作保,很快便被清政府知晓。面对追查,欧阳庚以"我不知道孙逸仙即孙文"来搪塞。此事经过漫长调查,始终未平息,直到 1902 年,清政府还专门派梁诚前往美国调查此事。

梁诚与欧阳庚二人暗中商定,在调查报告中将孙文进入美国之事写成由洪门中人经办,与欧阳庚无关。据说,作为报答,欧阳庚暗中"回馈"了梁诚一项功劳——提出庚款退还一事。

欧阳庚的这次"报答",似乎只是其后人的一面之词,但细细推敲,似乎又非没有根据。若此事为真,那倒真是阴差阳错,因为,当事双方不可能想到,这桩"功劳"竟然会成为中国近现代极具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从此梁诚名垂青史,欧阳庚却罕为人知。

当时,欧阳庚曾出资供胞弟欧阳祺在哈佛留学,欧阳祺与罗斯福刚

好是同学 ,欧阳庚借此面见罗斯福 ,多方斡旋 ,希望将退款用于办学。后来欧阳庚因在旧金山大地震中受伤 ,一度休养 ,便推荐欧阳祺继任旧金山总领事 ,继续谋划此事。

因为史料稀缺 ,我只能根据各种蛛丝马迹主观推测 ,以欧阳庚的老外交官身份 ,其弟与罗斯福的同学关系 ,还有他与梁诚的师兄弟关系 ,参与此事可算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但是否是首倡者 ,又是否将首倡之功“转赠”梁诚 ,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

不过 ,从时间上推断 ,即使欧阳庚和梁诚之间真的有此协定 ,欧阳庚也只是倡议者而非实行者 ,只能说是欧阳庚想出了这么个点子 ,而梁诚的功绩无从抹杀。

后　话

根据文献记载 ,梁诚不仅仅是力促庚款退还的功臣 ,也是提出以退还庚款兴办留学的第一人。不过 ,他的主张最初并未得到袁世凯的支持。袁世凯认为退还庚款应“用以整饬路矿 ,作为举办学务之成本 ,即以所获余利分别振兴学校”。

1908 年 ,美国国会最终通过庚款退还议案 ,时任外务部总理大臣的奕劻也以“体会新近贵国总统希望鼓励我国学生赴美入学校及求高深学问之诚意……此后当按年派送学生到贵国承受教育”的言辞答谢。但即使如此 ,袁世凯仍有心将退款挪为他用 ,并借亲信唐绍仪赴美之机 ,试图与美国政府交涉 ,将退还庚款抵押 ,借款开办银行。但美国政府拒绝 ,表示退款必须用于留学 ,否则将无限期拖延。

这一坚持 ,为中国带来了一代堪称空前绝后的人才 。掌舵清华的梅

贻琦,执掌北大的蒋梦麟与胡适,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都是庚款留美生。20 世纪中叶“后来的中科院院士和台湾地区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科院院士中有半数为庚款留美生。叶企孙、周培源、侯德榜、茅以升、梁思成、胡明复、姜立夫、江泽涵、吴有训、庄长恭……这一连串数之不尽的名字,见证了近代以来学界的辉煌时光。

丁崇吉与曾笃恭:两位曾经的报人

晚清的知识分子,除出仕为官外,投身洋务、担任买办,或专注技术,从事铁路、电报等新行业,都是流行出路。此外,报人也是一个后起的职业,办报者或针砭时弊,或记录世情,前者的典型例子是《苏报》案中的章太炎与邹容,后者则更为持久中肯,契合报业本质,如堪称近代中国史头号资料库的《申报》。

不过,作为一代精英的留美幼童,曾为报人者却不多,这显然与时代背景有关。幼童们初回国时,报业尚不发达,仅租界内有些许施展空间,而当清末报业日渐发达时,幼童们又多已功成名就,官场中的大多位高权重,技术领域则有詹天佑这样的翘楚,即使籍籍无名者,四五十岁的年纪也使得他们很难从事这一工作。

目前可查的曾从事报业的留美幼童仅有 3 名,分别为唐国安、丁崇吉和曾笃恭。

作为清华首任校长,唐国安曾任上海《南方报》编辑,1905 年,他与颜惠庆合作开辟该报英文版,面向读者群是旅居上海的外国人。后来,他赴京任职外务部,进入官场,便结束了自己的报人生涯。

丁崇吉的经历与唐国安类似,报人经历只是人生过渡,他的"人生主旋律"是任职海关,曾出任海关副税务司,改变海关高级官员多由洋人充

任的局面。

至于曾笃恭,报人经历比前二者都长。他也曾入官场,却没做过清廷的官,而是任职于民国政府。这也是当年留美幼童中颇罕见的,他那些曾经为官的同学们,多半横跨晚清和民国,两朝为官,少数则像梁诚那般,清亡后便退出官场,曾笃恭却刚好相反。

视野改变命运

在 4 批留美幼童中,广东籍占了一半多,其他也多来自东部沿海地区,比如宁波籍幼童便为数不少,其中 1873 年 6 月出洋的第二批幼童中有 4 人,分别为丁崇吉、陈乾生、王凤喈和王良登,1875 年 10 月出洋的第四批幼童中则有沈德耀和沈德辉兄弟二人。

那时的江浙地区,虽不似广东那般开放,但也因航运和上海开埠的缘故,远较内陆地区开放。

因为身在侨乡,对华侨史一向感兴趣,如今又"盯上"留学史的缘故,我翻查、阅读了大量有关华人出洋的资料,并顺带着读了不少其他学科的相关书籍,比如涉及中西方建筑文化交融的近代中国建筑史。读得越多,便越发感受到视野是何等重要。

即使同为一贫如洗的出身,有些人一辈子无法走出大山,有些人则从小就见到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并心生憧憬。早年漂洋过海的粤籍华工,就是"敢为天下先"的最佳例证,而南粤地区至今仍随处可见的华侨大屋,其中西合璧的风格也是文化交融的见证。

视野往往可以改变命运,甚至改变时代。比如容闳与他的同学黄宽、黄胜,尽管均出身贫困,却在澳门的教会学校里接受了先进文化,并

敢于出国留学。也恰恰是容闳 ,主导了幼童留美 ,而在那个闭塞的时代里 ,又有 100 多对父母敢于签下“生死各安天命”的协议 ,将孩子送往大洋彼岸那一切未知的国度 ,尤其是以出洋和买办闻名于世的珠海唐家 ,更是无比积极。也正是留美幼童中的唐家子弟唐国安、唐绍仪 ,和他们的留美同学梁诚、梁敦彦和欧阳庚等人 ,一起努力 ,才促成了庚款留美 ,缔造了一代影响中国百年的精英。

薪火相传的背后 ,是这一代代人的开放视野。甚至可以说 ,直到今天 ,是否沐浴过海洋文明 ,仍可在极大程度上左右人的视野。

出生于 1860 年的丁崇吉 ,其实家境极为贫苦 ,若在内陆地区 ,最大的可能便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但在他的家乡浙江定海 ,则多了一条可影响他一生的路。

丁崇吉 6 岁那年 ,母亲去世 ,兄弟姐妹 9 人全靠父亲丁长绶做豆腐维持生计。排行第六的他从小就常年以稀饭和盐巴果腹 ,甚至因为床铺不够 ,睡在做豆腐用的大缸缸盖上。但即使如此 ,丁家仍重教育 ,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 ,丁崇吉就于 9 岁那年进了私塾。他的两个哥哥成年后都随着叔父赴上海从事外贸生意 (丁家后来亦因此而发迹 ,逐步成为定海第一大户人家 ,后文详述),也使得丁家像那个时代的许多江浙家庭一样 ,视野逐渐变得开阔。于是 ,在容闳招收留美幼童时 ,丁长绶便决定送丁崇吉出洋。据说 ,除了老六丁崇吉之外 ,丁长绶还打算将老七也送出去 ,但老七不愿去 ,方才作罢。

赴美后的丁崇吉 ,先在麻省某高级中学读书 ,后考入哈佛大学。在哈佛 ,同学们送他一个绰号 ,叫作“宁波丁” ,据载 ,哈佛现在仍保存着他的入学卡。但一年后 ,留美幼童们被强行召回 ,丁崇吉也未能毕业。可这段经历 ,已足够改变其一生。

“益仙”之名用一生

丁崇吉字“益仙”,也称“艗仙”,这个字是留美前所取。

据《留美幼童》一书记载,当时清廷认为幼童出洋,事关大清脸面,所以不仅人人须背景清白,姓名也要有书香门第的气息才行。所以,不少出身贫苦的孩子还在临行前被改名或加字。

丁崇吉的“艗仙”,拆开便是“益舟山人”,也许是取“一个对舟山有益的人”之意。据丁崇吉后人回忆,丁崇吉等留美幼童远渡重洋、在西海岸登陆后,在横跨美国的途中遇上了著名的劫车大盗杰西·詹姆斯,虽有惊无险,却让他们记忆犹新。后来,丁崇吉曾带儿子去看一部以杰西·詹姆斯的故事为背景的美国电影,还告诉儿子就是此人劫了他所乘坐的火车。

据载,在留学期间,丁崇吉曾经爱上一位名叫 Sussie 的美国姑娘,他晚年时非常喜欢自己的小孙女丁秀瑞,就为之取了英文名 Sussie,而“秀瑞”这个中文名亦是 Sussie 的音译,又取容貌秀丽、品行高洁之意,没有跟随同辈的“珠”字排行。

回国后的丁崇吉,最先被分配至天津大沽炮台鱼雷队,专门研究鱼雷操作。当时,鱼雷的操作可算是洋人的不传之秘,所以清廷专门延揽一群年轻人研究学习。李鸿章曾上奏朝廷,表示“其习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该学生等现有派充营哨各官及管驾、教习、官医各项差使者,亟应量其才能,酌保官阶,给予顶戴,以式戎行而资策励……为此酌拟奖叙,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仰恳天恩,俯念中

国选募学生 ,肄习西业以图自强 ,实为目前当务之急 ,值此风气初开 ,确有成效 ,准予照拟破格从优给奖 ,以昭激劝 ,可为培养人才渐收实用之一助……”在这份奏折后面 ,他还附录了一份申请破格提拔的人才表 ,其中写道 :“谨将拟保美国回华及天津招募学习水师、鱼雷、水雷、电报、医学各学生缮具清单 ,恭呈御览……丁崇吉……等三十四名 ,均拟请以把总尽先拔补……以上各生 ,现在兵船、鱼雷、水雷等营充当管带、帮带及蚊船、练船、兵轮、雷艇各项差使。”

把总为基层军官 ,又称“百总” ,意为统管百人。丁崇吉晚年也曾对后人述说这段经历 ,说自己做过百人官。不过 ,他次年(1885 年)就离开了军方 ,前往上海 ,为上海各家英文报纸进行采访工作。据说 ,当时记者还是个新鲜职业 ,国人多对此不了解 ,采访屡吃闭门羹 ,可丁崇吉却乐在其中。放弃军方的铁饭碗 ,离开体制内 ,跑去当一个当时并不受待见的小报人 ,这种选择就当时而言颇为奇怪。有人认为 ,此前发生的中法战争 ,尤其是马尾海战一役 ,可能是丁崇吉离开体制的重要因素。当时丁崇吉并未上战场 ,但也曾经待命 ,经此战役后难免对清廷失望 ,何况 ,在美国的民主共和氛围下浸淫多年的留美幼童 ,多半对清廷颇为淡漠。另外 ,丁家当时在上海已拥有了家族生意 ,想必这也是丁崇吉离开体制“下海”的原因。

也是在 1885 年 ,他得到哈佛校友德鲁的推荐 ,在担任记者的同时又供职于上海海关 ,任办事员。

摸爬滚打 23 年后 ,1908 年初 ,丁崇吉被任命为海关统计科代理副文案 ,并兼任海关代理副税务司 ,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出任海关副税务司的华人。

自从国门被强行打开后 ,中国海关一直为如赫德之类的外国人掌

握,高级官员更是清一色洋人。1906 年,清政府任命另一位留美幼童唐绍仪担任会办税务大臣,唐绍仪以魄力著称,且极强调中国的自主权,在权益之争上向来寸步不让。赫德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唐绍仪上任后,立刻要求各税务司"嗣后如遇用人之际,再不可多用洋员,漫无限制。其洋员向来职掌,须陆续多派华员中之通英文者充当",还任命张福廷为偏远的亚东关署理税务司,任用华人帮办 10 人,试图以此赢得唐绍仪的信任。

丁崇吉能够担任海关副税务司,也是因为唐绍仪的"威力"。据载,丁崇吉所担任职位的确切表述应该是"Acting Deputy Commissioner",即"代理副税务司",有些史料称"海关监督",其实有误。"海关监督"是另一个职位,为清政府任命,有职无权,纯属挂名。

丁崇吉在海关声望极高,这与其为人有关。作为华人,他长期为华人同事争取权益,频频上书总税务司。比如他曾写过一封信给赫德的继任者安格联,为华人同事争取升迁和加薪等权益,"今为最后而最要者,为等级之分别问题。此项问题,职屡次呈请,但未蒙嘉纳。如王锦屏,服务海关 42 年,始获得超等正前班同文供事之职位,有《职员录》可凭。然此项职位,他人尚未必可以达到,因有多人以年高之故,迫而告退,遂致《职员录》中,高级者尚多空白也。近年来洋内班中等级,业已重行分别,而于华人供事人等,则未之闻也。支给薪俸之标准,为前总税务司于 1908 年所订,今于供事中,仍然适用;不知现在生活,除受战事影响之外,已去昔时远甚!抑有更进者,海关升递之举,较之邮政、盐务等方面,最为迟缓。故职员等呈请供事中等级之分别,亟须研究,而升迁之举,须如此办法,以每两年升一级;供事中之等级,亟应缩小,而有功于职务,特别保荐者,更须正当奖励之亟也"。

在这封信里 ,他还详细列举了海关华人职员与洋职员在房租津贴、医药设备、病假、长假和差旅费等各个方面的不平等 ,以说明华人职员与洋职员待遇之悬殊。

据载 ,他退休后 ,同事送他一只银盾 ,上面刻满了赠送者之名 ,他十分珍爱 ,放在家中最显眼之处。

民族资本家丁崇吉

丁崇吉自海关退休后 ,在家族生意中担任管理工作。

在经商领域 ,他可算老资格 ,早在任职海关初期 ,便已与其弟合开商业公司。退休后则担任位于上海广东路的“锦章号”经理 ,这个自家生意主营德国礼和洋行的缝衣针批发的民族资本家 ,在上海还有些房地产生意 ,此外 ,他还曾参股合营老家定海轮船码头的“锦昌号”货栈和舟山轮船公司 ,曾拥有过 3 艘轮船。

丁崇吉的幼子为其晚年所生 ,他曾回忆老父晚年时的逸事 ,比如“他个子较矮 ,留着白胡子 ,喜欢吃鱼冻和溏黄的鸡蛋 ,稍不留神 ,鱼冻或蛋黄沾在胡子上 ,滑稽的样子引人发笑”。当年的留美幼童们虽多严重西化 ,但到了晚年 ,仍是穿长衫者多 ,丁崇吉却常年西装 ,也不喝茶 ,酷爱白兰地和雪茄 ,办公室桌底更是长期摆放一箱白兰地 。

不过 ,他晚年并非只是享受。据其后人回忆 ,他长期订阅 *China Press* 等报纸 ,还常备一套 1899 年出版的八部头百科全书式的自学教程 ,一本原版的《韦氏大词典》,因词典体积大 ,他还专门打造了一个如乐谱架般的木架子 ,将词典置于其上 ,长期翻阅。此外 ,他还常备一套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 .A .Giles)编撰的七大本《汉英词典》,也因其体积大 ,为其

打了一个分格的箱子,一本本分别存放,以便随时翻阅。他还常去家乡的私塾,坐在后排与孩子们一起听课,他说自己从小出国,中文底子太差,于是常读古书、练书法。

出身留美幼童的他,对教育和留学的事情自然也相当看重,曾将儿子丁金生送往由留美同学梁诚等人筹款创办的香港大学学习,将儿子丁联生送往美国留学,侄儿丁汉保赴美留学时,他亦给予资助。他所喜爱的小孙女丁秀瑞在读完初中后,因家族中颇多老人有浓厚封建意识,不准她继续读书,丁崇吉则力排众议,还为她交付学费。

1941 年,因对日军暴行深感激愤,他不幸中风,后来又摔了一跤,卧床不起,1942 年逝世于上海,时年 82 岁,在留美幼童中可算高寿,他去世时,故人多已零落。

定海北门丁家的荣耀

丁崇吉出身贫苦,但在上海打拼的哥哥却逐渐闯出一番事业,到了民国时代,定海北门丁家更是成为定海第一名门。

据载,丁家的发迹始于 19 世纪中后期(即丁崇吉留美前后),依托独家经销德国礼和洋行缝衣针,也就是丁崇吉退休后担任经理的锦章号。至 1890 年前后,锦章号开始兼营德士古火油。到了清末,锦章号已成为上海滩上最大的五金和火油商号,当时的经理丁钦斋于 1905 年被选为上海总商会第二任议董,并任上海总商会第二、三、五、六任会董。

丁钦斋除在上海广开业务外,还在老家定海开拓船运业。民国《定海县志》记载,定海城南海岸线上有个“可贵码头”,专供“可贵”轮停靠,“可贵”轮于清末开始运营,来往于上海、定海和海门,所有者即为丁家。

1840 年后 ,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水上交通多为外国轮船公司把持 ,民族资本不可在内河航运中运营。直至 19 世纪末 ,清廷才允许商人自办轮船公司。锦章号就是在这时开始涉足船运 ,创办“锦章航船局”。1902 年 ,“锦和”客轮开航上海经宁波、镇海至定海这两条航线。其后 ,便有“可贵”轮的运营。丁家此举也带动了民族资本参与船运的热潮 ,宁波籍大商人朱葆三和虞洽卿等都进入了这一行业 。

“锦和”轮几年后“退役”,“可贵”轮则于 1916 年在海门触礁沉没。至于丁钦斋 ,则于 1919 年因病猝亡。

丁钦斋与丁崇吉是兄弟 ,而且 ,丁钦斋之后的丁家掌舵人丁梅生 ,原本是丁崇吉的次子 ,只因生母猝亡 ,才于他几个月大时过继给了连生 5 个女儿的丁钦斋。丁梅生曾留学日本 ,学习农业 ,1918 年当选为定海农会会长。

丁梅生接掌锦章号后 ,大力开拓经营 ,1920 年赢利达 80 万两银子 ,还与朱葆三、朱祺祥等人共同捐资建造定海体仁局分局 。

1922 年 ,他又与朱葆三、许廷佐等合资 32 万元 ,创办上海舟山轮船公司 ,朱葆三任总董 ,许廷佐、程庆涛任副董 ,在上海瑞荣船厂打造了一艘 800 吨级的“舟山”轮 ,行驶上海、定海、穿山、海门航线。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发起人和最大股东 (占股份 48%),丁梅生并未担任总董和副董 ,但担任副董的程庆涛却是丁家心腹 、锦章号的副经理。据载 ,这位程庆涛是前清举人 ,丁钦斋的秘书 ,后担任锦章号副经理 ,在上海商界声望极高。丁钦斋死后 ,他又尽心尽力辅佐少主人丁梅生。因为丁梅生那时年轻 ,名气也不大 ,难与朱葆三和许廷佐相较 ,于是才推程庆涛担任副董。而且 ,丁家人在舟山轮船公司中所占分量也最重 ,根据其筹资股票上的签名可知 ,丁梅生的堂弟丁益生 (丁益生是丁崇吉的第

四子,所以二人名为堂兄弟,实为亲兄弟)与丁钦斋的女婿徐翔生均担任董事,经理丁似兰也为丁家人。

可惜的是,丁梅生也仅仅执掌锦章号 5 年,便英年早逝。其后,其堂兄丁慎庵(清末至抗战时期的美孚火油汉口总买办,统管长江上游美孚火油的销售)、生父丁崇吉和堂弟丁益生等相继担任经理。丁崇吉任经理期间年事已高,实际掌舵人亦为丁益生。不过直到 1942 年丁崇吉去世后,丁益生才真正被冠以经理头衔。

“舟山”轮的历史颇为坎坷。抗战时,因日军封锁海面,定海至上海的中国客轮停航,“舟山”轮改名“海福”轮,挂德国礼和洋行的旗号,并委任一名礼和洋行的德国人为船长,继续在定海、上海、海门和温州之间航行。丁家与礼和洋行的合作亦有数十年历史,发迹亦依托礼和洋行,此次又借其相助渡过难关。而礼和洋行的相助,也是丁家在舟山轮船公司地位的体现。1949 年,“舟山”轮又运载着国民党伤兵,被强迫驶往台湾,长期停靠于基隆港,1962 年左右被丁似兰变卖。

丁钦斋的那位女婿徐翔生也值得一提,他又名徐虎臣,民国著名资本家。他在上海开有鸣昌营造厂,还拥有大量房地产和股票。他与锦章号共有的上海永生金笔厂大楼,在 1949 年之前曾长期作为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被使用。1949 年后,他退出所有生意,坐吃股息,“文革”时被抄家,财产被查封,“文革”后才得解封。

报人曾笃恭

另一位报人曾笃恭,经历不似丁崇吉这般丰富。他是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可算是丁崇吉的师兄,1856 年出生,潮州人。

据载 ,他曾先后入读美国埃尔姆街文法学校 、斯普林菲尔德高中 、斯普林菲尔德学院 ,后考入耶鲁大学。

关于他的事迹 ,如今所留不多 ,即使是《潮州市志》这样的权威文献中 ,也没有关于他的记载。我极爱读的《听雨楼随笔》(高伯雨著 ,香港牛津版)中 ,曾提到他与另一位潮州籍留美幼童曾溥 ,指后者是潮阳县 (今潮阳市)人 ,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

钱钢所著的《大清留美幼童记》中也提到了二人 ,有人还综合此书与马幼垣所撰《北洋海军成军 120 周年研讨会论文》等各种资料进行考证 ,发现曾溥和曾笃恭其实是亲兄弟 ,1854 年出生的曾溥是兄。

这一考证相当有趣 :既然曾溥是兄 ,为何曾笃恭是第一批幼童 ,曾溥反倒是第二批? 而且 ,曾笃恭作为第一批幼童 ,16 岁的年纪已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曾溥以 19 岁“高龄”入选第二批名单 ,更是奇怪。想来也正是因为年纪的问题 ,在 4 批留美幼童的出洋资料中 ,他是唯一未注明年龄之人。

个中内情倒也不算复杂 ,主要与二人的父亲有关。二人之父名为曾兰生 ,本名曾恒忠 ,祖籍潮州 ,生于新加坡 ,父亲为潮州人 ,母亲为马来人。父母双亡后 ,他进入美国领事馆当侍从 ,在美国传教士引荐下入读教会学校 ,1843 年更是前往美国 ,1846 年留学于汉密尔顿大学 ,比容闳入读耶鲁还早 4 年。也正因此 ,有人将他视为近代中国留学第一人 ,但他出生于新加坡 ,严格来说只能算华裔。另外 ,因学费无着 ,他读了 2 年后便辍学 ,因此容闳作为首个在美国大学毕业的华人则全无争议 。

辍学后的曾兰生随即来到中国 ,在香港 、广州等地工作。1850 年 ,他与同为中马混血儿的南洋女子结婚 ,1853 年前往上海经商 ,曾溥和曾笃恭均在上海出生。

1866 年,曾兰生应聘为福州船政学堂的英语教员 ,1872 年 5 月被委派到上海 ,在出洋肄业局设立的留美幼童预备学校里教授英文 。由于曾家平时一直习惯用英语交谈 ,曾溥和曾笃恭也有相当基础 ,便一起任教。据说 ,因父子三人授课时都极其严厉 ,幼童们称曾兰生为“撒旦”,称曾家三人为“三恶魔”。

曾笃恭一边授课 ,一边参与了幼童选拔 ,得以入选首批幼童。曾兰生则作为首批幼童的翻译随团出行 ,而且与陈兰彬、容闳等人单身前往不同 ,曾兰生全家都随团赴美 ,包括其妻子和三子三女 。也正因此 ,曾溥在美读书时也受到清政府资助 ,并被列入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中 。

留美幼童被强行召回后 ,曾笃恭返回上海 ,曾在上海的《北华日报》和《字林西报》任编辑。他的报人生涯持续多年 ,其间还担任耶鲁大学中国校友会副会长 ,帮助编译校友会目录。直到民国成立后 ,他才进入南京政府外事局工作。晚年的他还曾任职于铁路局 ,任津浦铁路秘书和株萍铁路局长 ,直至 1916 年去世。

至于他的哥哥曾溥 ,在美期间同样考入了耶鲁 。幼童们被召回后 ,他又独自返回美国 ,继续就读于耶鲁 ,是 4 批幼童中第一个耶鲁毕业生。此后 ,他又前往德国弗赖堡大学攻读采矿业硕士 ,回国后成为矿业工程师。1889 年 12 月赴香港出差时暴病身亡 。

据潮州文化研究者记载 ,曾溥之所以事迹不彰 ,是因为他留学美国时 ,西化严重 ,是最早剪辫的幼童之一 ,属于清政府眼中的“顽劣之辈”,因此对其历史刻意抹灭 ,不予记载。我倒觉得这说法有点想当然 ,清政府固然不满幼童们的西化 ,因此才将他们强行召回 ,但要说反感一个年轻人 ,并在其去世后刻意抹杀其事迹 ,倒还不至于——在历史上 ,这可是反臣的待遇啊 ,曾溥只是性格叛逆 ,却非谋逆之人 ,清政府对他只是讨

厌 ,却未必会重视。

其实 ,曾溥被历史遮蔽 ,只因他并无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当年的留美幼童中 ,固然有唐绍仪、詹天佑这种大人物 ,但更多的则是曾笃恭和曾溥这种无甚名气、但亦颇有贡献者 ,他们是一代精英中的基石。

梁如浩 :其实他并非汉奸

1923 年 ,中英两国草签《中英威海卫条约》,引发国内民众抗议 ,民国政府任命的“接收威海卫委员会”委员长、本次中英谈判及签约的中国代表梁如浩更是被指为汉奸。

近年来 ,史学界逐渐正视五四运动的狭隘之处 ,尤其是其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后来影响极大 ,很多人片面强调主权 ,甚至以破坏取代建设。在外交领域 ,这种倾向极为明显 ,尤其是每逢外交谈判交涉时 ,某些人往往不问是非、不问客观情况 ,主观判定外交官员必然卖国 ,甚至有些时候会出现谈判尚未开始 ,外交官员已被指控为“汉奸”的情况。

其实 ,梁如浩作为接收威海卫的督办官员 ,在与英国人商讨各种条款的过程中并无什么真正的卖国表现。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对于弱国而言 ,每进一步往往要付出十倍甚至百倍于强国的努力 ,晚清与民国的许多外交官们 ,在谈判桌上尽心竭力 ,个中辛苦与勇气 ,绝非坐在家中嚷嚷两嗓子救国、骂人几句汉奸可比。而且 ,人们对梁如浩的指控主要基于当时的另一位谈判参与者陈绍唐的声明 ,根据史料分析 ,陈绍唐对梁如浩的种种抨击 ,实属污蔑。

袁世凯麾下干才

梁如浩是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 ,名滔昭 ,号孟亭、梦亭 ,字如浩 ,珠海唐家湾人。他赴美后 ,先后就读于哈德福德中学和史提芬工学院 。

1881 年 ,留美幼童回国 ,他被分配到天津西局兵工厂任绘图员。1883 年 ,清廷筹备在朝鲜开办海关 ,唐绍仪被德籍顾问穆麟德选为随员 ,他随即向穆麟德推荐了自己的两位老同学 、也是其香山老乡——蔡绍基和梁如浩。

三人赴朝后不久 ,唐绍仪便结识了袁世凯 ,并被袁引为心腹。他随后又再次推荐蔡绍基和梁如浩二人 ,三人都成了袁世凯的心腹幕僚。

1894 年 ,梁如浩跟随袁世凯回国 ,被委任为关内铁路运输处处长 ,后升任北宁铁路总办。当时的留美幼童 ,在铁路和外交领域最为活跃 ,梁如浩便是如此。1902 年 ,他得清廷委派 ,负责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关外铁路 ,并筹划铁路沿途的商贸开展工作。到了 1906 年初 ,袁世凯在奏折中对梁如浩大加褒扬 ,称“经该局总办道员梁如浩等 ,督率华、洋员司切实经营 ,洪纡毕举 ,遇事殚心筹划 ,设法招徕 ,使全路一千五百余里商货灌输 ,贸易往来日渐兴盛 ,所收车脚进款 ,顿形畅旺。除一切开支及按月摊还借款本息外 ,约共结余银一百八十余万两”。

1902 年 5 月至 1905 年 7 月 ,他又任唐山路矿学堂 (即后来的唐山交通大学 ,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监督 (即校长)。卸任监督后 ,他又被派驻荷兰 ,其间还捐资升任候补道。

1906 年 ,他接受了一个新任务 ,这或许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那条创造了诸多历史奇迹的京张铁路 ,其主持建设者除了家喻户

晓的詹天佑之外,还有位于幕后、出力奔波的他。

与詹天佑共修京张铁路

早在1902年,慈禧有意于次年“展谒西陵”,还突发奇想,打算乘火车前往。西陵当时并无铁路经过,所以需在高碑店到梁各庄新筑一条支线,限期6个月。

既然是修铁路这等高科技事物,按惯例自然得使用外国工程师,可英法两国为此事争得不可开交。眼看期限临近,袁世凯这位晚清能臣果断打破僵局,决定撂开争执双方,由中国人自己修筑。他让时任关内外铁路总办的梁如浩兼任西陵铁路总办,由詹天佑为总工程师。

梁如浩与詹天佑这对当年的留美同学齐心协力,用4个月时间修完了这条只有43公里的铁路,这也是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筹建、设计和施工的铁路。

这条铁路的修建,不但使得梁如浩和詹天佑二人平添极大声名,也使梁如浩得以在官场上走遍各路“肥缺”。此后,他先是担任锦山海关道兼关内外铁路总办,其后又转向海关领域,先后担任天津海关监督、牛庄海关道、天津海关道和上海海关道。

在担任关内铁路总办期间,梁如浩不但解决了京张铁路经费问题,还帮助老同学詹天佑名垂青史。

当时,清政府有意提取关内外铁路盈余,用于修筑京张铁路。关内外铁路本是清政府向英国借款230万英镑所修筑,英国人通过借款掌握了关内外铁路的控制权,将铁路每年的丰厚利润都存入汇丰银行,作为清政府的还款保障金。清政府想拿这笔钱来用,必须要先得到英国人的

同意。

梁如浩负责了这场谈判 ,他代表清政府提出 ,关内外铁路收入中 ,除划出 6 个月还款本息给中英公司外 ,其余全部提取出来用于修筑京张铁路。英国人则要求“备存一年本息”,梁如浩并不让步 ,坚持谈判 ,最终使得英国人同意此要求 ,这是晚清政府在外交领域难得的闪光时刻 ,梁如浩立下了大功。而且 ,在京张铁路的建设中 ,基本做到经费顺利调拨 ,未借任何外债 ,这全靠梁如浩在关内外铁路盈余中经营筹划 ,亦是大功一件。

就这样 ,他与詹天佑一起承担了京张铁路的建设工作 。

詹天佑能成为京张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司 ,也与梁如浩有极大关系。二人在留美期间就关系极好 ,回国后亦始终保持联系。作为袁世凯的亲信 ,梁如浩举荐了詹天佑 ,并给了他修筑西陵铁路的“露脸”机会 ,二人在西陵铁路修建中的默契合作 ,更使得外界对这对搭档平添信心。此外 ,早在京张铁路筹备期内 ,梁如浩就在关内外铁路局调了陈西林、邝景阳等多名工程师支援京张铁路局。

如今说起詹天佑 ,那是妇孺皆知的人物 ,但梁如浩却声名不彰 ,令人喟叹。

官场沉浮

正当梁如浩在官场上摸爬滚打时 ,一封弹劾的奏折出现了。

1906 年 ,被誉为晚清忠臣的学者梁鼎芬上奏折弹劾袁世凯 ,其中便提到了梁如浩等袁世凯心腹 ,指“梁如浩、蔡绍基、刘燕翼等 ,以行贿而任关道 ,纲纪荡然。恐自是以后。人知有奕劻、袁世凯 ,不知有我皇太后、

皇上矣”。

梁鼎芬是广东番禺人,晚清著名学者、藏书家。光绪六年(1880 年)进士,早年曾历任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因弹劾李鸿章声名大振,却也因此被贬。后来,在张之洞提携下,他重返官场,还得授二品衔,却又一次因言获罪,他先是弹劾庆亲王奕劻,其后又弹劾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说他“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陷人又能用人”。此举再次引来慈禧大怒,梁鼎芬“引疾乞退”。

后世对这位清室忠臣评价极高,认为他一团正气、不畏权势。具体到这件事,因为袁世凯早已被历史定为大反派,梁鼎芬的弹劾便更显正义。其实,梁鼎芬为人正直敢言不假,但官场弹劾,并非永远是一方正确一方有罪。将梁鼎芬的这份奏折视为正义宣言,其实也失之偏颇。

晚清时期的官场倾轧,许多时候与其说是忠奸之争,不如说是观念之争。守旧派中不乏清正之士,但观念陈腐;革新派中亦不乏袁世凯这种热衷投机的实用主义者,但却真正推动了时代进程。

仅以此事来说,袁世凯固然贪权,但野心勃勃的他志不在敛财。如以今日眼光来看,他手下的班底多是时代精英,真正的干才,绝非八股腐儒可比。在铁路、外交、电报和海关等领域,若无袁世凯的班底,清政府简直寸步难行。像梁如浩这样的人才,无论在铁路局还是海关道,都政绩斐然。八股取士出身的守旧官员,对这个国家的现状束手无策,却又对新派实干型官员看不顺眼,甚至处处刁难。慈禧对梁鼎芬的奏折十分不满,其实也是正常反应,她对梁的评价更是到位,“有意沽名,摭拾空言。肆意弹劾,尤属非是。着传旨申饬”。“沽名”和“空言”这两个词,道出了历朝历代不少“清官”的真相。清官固然可贵,但也有不少清官求名多于实干,甚至为了求名,不惜以恶毒攻击或吹毛求疵来显示自己“敢

言”。这样的所谓“清官”,往往有德无才,矫枉过正,破坏大于建设。

1908 年,慈禧去世,袁世凯亦失势,罢官回乡,韬光养晦。梁如浩作为袁氏心腹,亦辞去外务部右丞的职务。

到了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风雨飘摇,被迫让袁世凯重新出山,梁如浩亦被任命为邮传部副大臣。不过此时的梁如浩正在广东老家隐居,广东已然独立,时任都督的胡汉民提名其为广东交通部长。

唐绍仪当选民国政府首任国务总理后,曾在组阁时提名老同学梁如浩为交通总长,但未获参议院通过,这显然与当时北洋系与革命党人之间的斗争有关。

民国外交官

1912 年 9 月,袁世凯任命梁如浩为外交总长。

据名记者黄远生记载,梁如浩上任后曾向各国驻京公使发出通告,希望各国公使前来会晤。以外交惯例而论,外交总长高于公使,在官署接见公使实属正常。但外国公使们却找借口不来,认为之前清廷的外务部尚书上任后都主动拜会各国公使。这个理由其实是在混淆概念,因为清廷在外交领域的最高官员应是外务大臣,外务部尚书只是副手,将外务部尚书这一职位等同于外交总长,无疑是错误的。不过也正因此,民国政府经历了 1 个多月的外交真空期,作为外交总长的梁如浩,只见过法国公使,其他各国与之皆无联络。这也导致了外交消息不畅,俄国趁机在外蒙问题上加快动作。

当年 11 月 3 日,俄国与蒙古活佛签订《俄蒙协约》,梁如浩随后提出抗议,称“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各外国订条约之资格。

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11月8日,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面见梁如浩,将《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递交,声称“俄国与之订立条约,唯措词甚慎,始终并未提及蒙古脱离中国之语”,要求“中国在外蒙不殖民、不驻兵、不派官”。梁如浩则作出强硬声明,“中华民国继承前清之权力,外蒙古仍为中国之一部分,不能擅与外国订约”,“外蒙之事,全属内政问题”。

据载,梁如浩希望刚刚创建的民国可以采取强硬外交路线,但未获认同,于是提出辞呈,隐居天津。

被冤枉的“汉奸”

1921年,梁如浩重新出山,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1922年,他被任命为“接收威海卫委员会”委员长,次年与英国草签《中英威海卫条约》,引来争议。

其实,这场长达40轮的谈判异常艰苦。英方开出的条件十分苛刻,梁如浩其间曾一度中断交涉,回京请示。据载,为了尽快收回威海卫,也为了给回收其他租界开个好头,梁如浩作了小小让步,英方在整体交还威海卫之后,可无偿租借刘公岛10年,同时英国人可参与市政管理。这些让步当然有损中方权益,但参照晚清以降的外交状况,能够将租界收回,已是难得胜利。

2010年曾有一本好书出版,名为《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作者唐启华。在这本书中,详细记录了北洋政府在外交方面的种种努力。因为阶级史观、意识形态的缘故,北洋政府一直被视为腐朽无能的反动派,历史遭到湮灭,直到近年来,人们才重新审

视北洋时代和那时的精英。至少在外交领域,外交精英的努力和功绩,都足以令前人与后人敬仰。

但此时梁如浩的种种努力,却被山东人陈绍唐选择性无视。这位陈绍唐也是参与交涉的官员,却在关键时刻扮演了“愤青”角色。

威海卫于 1898 年被英国以“专为抵制沙俄”的借口强租(沙俄当时强行租借了大连和旅顺),在清政府与英方签订的《中英议租威海卫专条》中,规定英国“所租之地,系刘公岛并在威海湾之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十英里地方”,“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即 25 年)”。日俄战争后,在战争中失败的俄国被迫将大连和旅顺交与日本,所谓“专为抵制沙俄”的借口不再成立。清政府曾一度想借机收回威海卫,但英方的陆军部、海军部和殖民部均认为威海卫地位重要,不可退还。即使是认为威海卫可归还中国的英国驻香港总督弥敦,也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即要求中国政府将香港的九龙和新界由“租借”改为“永租”。最终,英国拒绝交还威海卫。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次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希望各国交还租借地的要求,但和会拒绝讨论此事。1921 年底,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除要求日本归还山东、废除“二十一条”外,又提出撤废中外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种种束缚。顾维钧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强烈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法国代表魏斐尼亚也发表声明,称法国准备随同各国在适当时机有条件地归还在华租借地。这迫使英国进行表态,1922 年 2 月 1 日,英国代表贝尔福发表声明,表示“唯威海卫即可归还”。

这一声明意味着威海卫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以和平谈判方式归还的租借地,但它的谈判从一开始就十分艰难。1922 年 2 月 3 日,贝尔福致

函施肇基,表示“必有若干事项须互相解决,以期两政府满意,然后方能实行交还”。这些“若干事项”包括准许英国船只夏季使用威海卫,以装卸、存储海军军需物品;保留上述事项所需产业;借用海面训练海军;保护外人财产权;准外人参与市政;中国允准建筑铁路以联络威海卫与内地……还要求“设一中英委员会,就地研究此问题,并向两国政府建议办法”。

随后于4月开始的正式谈判,英方始终坚持上述要求。梁如浩则与对方艰苦谈判,到了1922年10月7日(此时谈判已近半年),北洋政府决定将威海卫码头自行开辟商埠,其余重要区域仍保留备作军港。但英方仍希望续租刘公岛10年,以及期满后可续租之事。因为刘公岛一直被英国海军用作避暑场所,也是英国舰队在中国北方的供应站和驻地。为达到续租刘公岛的目的,英方要求中国应就英国在威海卫所交还的土地、房产的购价与改造费用给予经济补偿,其初步估价为200万元,梁如浩并未答应。

1923年3月,中英双方在北京继续开始谈判,互相提出议案。4月19日,“梁如浩变汉奸”事件的另一主角陈绍唐出场,被清政府任命为威海卫接收事宜的帮办。至5月31日,双方终于议定《接收威海卫委员会中英委员协商意见书》,即草签的《中英威海卫条约》。重点内容包括刘公岛借与英国海军10年,期满后在双方同意的条件下方可归还中国;准许英国舰队在刘公岛度夏以及在岛外海域操练;威海卫港区设董事会协助地方行政长官处理市政,董事中外国人不得少于2人,中国人不得多于5人……

这些内容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中国利益,一时间群情汹涌。其实,早在1922年9月,山东民众就曾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无条件收回威

海卫。至《接收威海卫委员会中英委员协商意见书》出炉后 ,陈绍唐将之公之于众 ,并在山东旅京同乡会上发表声明 ,声讨梁如浩 ,在《晨报》上登出 ,声明中写道 :“梁督办居心媚外 ,向英人献保留刘公岛之策。威海卫之交还关系军事上甚巨 ,梁氏甘心卖国 ,以无条件的交还 ,变而为继续的租借 ,且变而为永远的租借 ,无非另有交换 ,专谋利己……梁氏知余不可以利动 ,乃继以威胁。至激烈不能相下时 ,梁氏往往拍案厉声向余曰 ,此事我有全权办理 ,往往指挥左右将余扶出门外。余愤不可遏 ,曾屡次拟以身殉。一日余随手取一砚即欲向头自击 ,某英人观之大惊 ,向余劝阻 ,梁氏毫无所动也。”但所谓“无条件收回威海卫”,又谈何容易? 从晚清到民国时代 ,外交官并非中国局势的制造者 ,却要在具体外交事件中为国家积弱“买单”,一番忙活后还得背上“汉奸”骂名。

具体到这件事 ,另一位山东人陈干的意见则更为中肯 。陈干是老革命党人 ,1906 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时率民军击败清军张勋部 ,光复徐州 ,后曾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咨议。他曾全程参与中日青岛交涉、中英威海卫交涉 ,在他看来 ,陈绍唐的愤激恰恰中了英国人的圈套 ,英国人可以借机拖延谈判 ,百害而无一利 :“一、土地放弃 ,英人在威海尽可以从容经营 ,将来结果 ,契约有效与青岛案同等之害。二、外交孤立 ,所有各种应收回之事恐说不着 。三、此关已破 ,恐各国协以谋我 ,虽欲呼冤 ,不知向何国呼起。”他曾写道 :“弱国外交无便宜可占 ,只怕悬搁 ,使英、日得以从容开辟。起哄者有人 ,负责者无人。那些号称爱国者的用心 ,不外乎将二案断送 ,使陈某(指陈绍唐)少有树立。但只能徒供地方牺牲 ,将祖宗墓断送 ,名为爱国 ,其实害国 ,名为保乡 ,其实害乡。”

陈绍唐作为外交官 ,其实理应知道中国此时的外交现状 ,懂得以退为进、以时间换空间的道理 ,如此举动看似拳拳之心 ,其实是为了虚名 ,

而且也有利益关系作祟。当时山东政局复杂，派系林立，某些派系利用外交事件，捏造不实之词，煽动民众情绪，以图从中得利。

梁如浩面对陈绍唐的诬陷，愤怒不已，表示“确非事实，毫无凭证”，同时也心灰意冷，辞职而去。从此离开政坛，专心于慈善事业。

因为国内的反对，加之北洋政府政局动荡，威海卫归还一事最终搁置。直至 1930 年 4 月，双方才结束谈判，草签协定。同年 10 月 1 日，国民政府与英方在南京互换批准书，同日，中国海军亦抵达威海卫，举行中英交收威海卫典礼，直辖于南京政府行政院的威海卫地方行政机构——威海卫管理公署亦于同日正式宣告成立。威海卫就此被收回，这也是中国首个以和平谈判方式从外国殖民者手中收回的租借地。

此时的梁如浩，仍隐居天津。晚年的他曾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1941 年 10 月，他在天津去世。

张康仁:第一位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

在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律师还是一个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职业。后世有许多人认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律师是伍廷芳。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新加坡、在广州长大、在香港接受启蒙教育的伍廷芳,于1874年自费留洋,在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和大律师资格,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不过,"伍廷芳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律师"的说法或许并不准确,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写道"论者谓国人得为外国律师者,公为第一人",此"公"即为伍廷芳,但按照这一陈述,伍廷芳应是第一位取得外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与伍廷芳结亲的香港何家也诞生过一位华人律师——1864年,伍廷芳与何妙龄结婚,何妙龄的父亲何福堂是香港第二位华人牧师,何福堂之兄何卫臣即为香港第一位华人律师。不过何卫臣与伍廷芳谁执业更早,无从考证。

留美幼童当中也诞生了两位律师,一位名叫张康仁,另一位名叫曹吉福。关于曹吉福的资料,如今已无从寻觅,只知道他是江苏川沙高昌乡人,是川沙地区出国留学的第一人,后曾担任律师。张康仁倒是名气颇大,因为他是第一位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

首位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

张康仁为今人所知，主要是因为钱钢与胡劲草合著的《大清留美幼童记》一书。生于1860年的他是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的商人家庭。赴美之后，他先是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中学读书，后考入耶鲁大学，但并未读完便被清政府强行召回。

关于张康仁在美国期间的生活，后世记载有限，只记录了他与欧阳庚和罗国瑞一起居住在盖迪先生家中，熟悉美国社会情况后，入读哈德福德公立中学，与钟文耀一起寄住于威廉·史密斯先生家中。1878年，他进入菲利普斯预科学校，次年毕业时，还在毕业典礼上做了题为“希腊在希腊以外的影响”的英语演讲，之后便考上了耶鲁大学。此外，还有记载指他是第一个学会骑自行车并骑着上街的留美幼童。幼童们被强行召回国内后，张康仁与其他人一样，被随意分配，他的去向是福建水师学堂。他对于清政府的漠视十分不满，加上已无法适应中国社会的闭塞落后与专制，他决定离开。

我相信在当年的留美幼童中，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在那个年代，这并不容易实现。所以，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妥协，循“正途”在官场或技术领域打拼。张康仁却有着独特的优势，他的哥哥就在夏威夷经商。依靠哥哥的资助，也依靠自己的一点积蓄和借款，张康仁又回到美国。据说，在檀香山中转时，他还遇上了一位老同学，对方希望借钱回国，他就将自己全副身家交给对方，自己则重新赚取旅费和学费。回到美国的他，继续在耶鲁大学的学业，并在1883年毕业。此后，他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于1886年毕业。值得一提的是，在毕业时，张康

仁才剪去脑后的辫子。

我查过很多资料 ,都没有查到这条辫子是否是张康仁的第二条辫子——当年的留美幼童中 ,有不少人在留学期间偷偷剪去了辫子 ,这也是清廷将他们强行召回的一大诱因 ,不知道张康仁是否位列其中。回国后的幼童们又重新留起了辫子 ,直至清亡。

毕业时 ,当地报纸的报道中曾提到这位中国人 ,指“张康仁(Henry Chang)是第一位在美国毕业的中国律师……身材高大 ,有才华 ,在他的班级中 ,他在法学研究方面的能力是最突出的”。

但仅仅拿到学位 ,并不意味着他就已经真正成了律师。据载 ,按照美国通行制度 ,他必须成为州律师协会会员才能取得律师执照并从业。但当时排华法案已经实行 ,禁止华人入籍 ,而按《纽约州民事诉讼法》规定 ,只有美国公民才能在纽约州内成为执业律师 。这就使得张康仁没有资格参加律师协会资格考试。

一个人与排华法案的斗争

面对排华法案 ,面对自己拥有学位却无用武之地的窘境 ,张康仁开始了维权之路——这似乎也是他第一次学以致用。而抛开排华法案自身的不合理性 ,仅从张康仁的申辩和执业过程 ,也可看出当时美国的法制状况。

应该说 ,当时的美国精英阶层 ,也有不少人对排华法案持保留看法。张康仁作为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 ,得到了一些人的帮助。

1887 年 4 月 ,张康仁申请执业 ,并在纽约州长面前做了申辩。这次申辩显然起到了效果 ,5 月 2 日 ,纽约州议会专门通过了一个特别法案 ,

准许纽约市最高法院豁免张康仁的外国国籍因素,允许他在通过律师协会资格考试后加入州律师协会。

张康仁顺利通过了考试,据说分数也极高,三位考官一致决定接纳其为正式律师。

但意外的是,当张康仁随后向纽约市最高法院提出执业申请时,却遭到了拒绝。而且,纽约市最高法院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歧。

当时,大法官查尔斯·布朗特表示,州议会只是准许纽约市最高法院豁免张康仁的外国国籍因素,并允许他在通过律师协会资格考试后加入州律师协会,但"准许"并不等于"强制要求"。换言之,州议会只是给予最高法院自主权,最高法院可以违反排华法案和《纽约州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接纳张康仁,但也可以根据原有法律,拒绝张康仁的申请。而查尔斯·布朗特与另一位大法官查尔斯·丹尼尔斯的决定是:法院自主决定拒绝张康仁的申请。

根据《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困扰张康仁的问题仍是国籍问题。纽约州最高法院不会为了一个中国人突破自己的法律。

当然,最高法院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大法官约翰·布莱迪就认为应该接纳张康仁。他表示,此前已有州议会豁免律师资格申请者外国国籍的先例,而且法院当时也曾宣布:"看来州议会有宪法赋予权利把从事律师业务特权授予某些外国人。"

后世提起此事,多探讨排华法案的不公,为张康仁惋惜,但我更留意的却是美国的制度。没错,排华法案作为美国历史上唯一排斥某族群入籍的法案,确实不公,可算臭名昭著,张康仁的中国国籍也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遭遇了歧视。但抛开这些,在张康仁的申辩过程中,美国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和程序性都得以展示。

张康仁并非没有社会资源 ,他得到了州长的接见 ,还得到了州长的批示 ,州议会也进行了讨论和表决。但很遗憾 ,纽约州法院偏偏没有听话 ,而且 ,他们并非拍拍脑袋就决定不听话 ,而是同样经过了内部正规程序 ,支持者与反对者各自表明立场、态度和依据 ,并最终以投票形式做出决定。

相比之下 ,纽约市中级民事和刑事法庭的行为则让人啼笑皆非 。说它是反面教材吧 ,倒也算不上 ,因为它同样充分利用并坚持了司法独立 ,可做法却是滥收移民入籍。据说该法庭的一位法官曾创下一日内发放 1683 张入籍证明的纪录 ,也正因此 ,该法庭被戏称为“入籍机器”。张康仁在被纽约州最高法院拒绝后 ,也将入籍作为首要任务 ,于是转而向纽约市中级民事和刑事法庭申请入籍。1887 年 11 月 11 日 ,他在该法庭的法官乔治·胡森手中得到了入籍文件。

此后 ,他一边在一间纽约律师事务所工作 ,一边等待第二年的律师协会会员资格申请。1888 年 5 月 17 日 ,他获得纽约州律师协会会员资格 ,可以在纽约州执业 ,成为美国第一个华人律师。

1889 年 6 月 12 日 ,他又获得了美国公民护照 ,一切似乎都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美国国内舆论对张康仁入籍一事进行了猛烈抨击。《纽约时报》就撰文表示胡森法官同意张康仁归化毫无道理 ,因为 1882 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已经明确规定了中国人不得入籍 ,张康仁是第一个破例者。众多舆论都认为张康仁的入籍无效 。

之后的张康仁 ,选择前往华人最多的加州执业。1890 年 ,他申请加入加州律师协会。但加州方面拒绝了他的申请 ,加州最高法院大法官霍斯甚至直接断了张康仁的后路 ,裁定其入籍证件为“非法发放” ,是无效的。因此 ,张康仁不但没了律师资格 ,连入籍资格也没了。

这场斗争，以张康仁的失败告终。

并不潦倒的生活

曾有资料称，张康仁在失去律师从业机会后，潦倒半生，这其实是个想当然的结论。无法学以致用，不能从事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都极高的律师工作，确实对张康仁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但以他的学历、经历，在美国谋生根本不成问题。

他先是在银行担任译员，这算是个过渡性质的工作，随后又在清廷驻旧金山领事馆中担任顾问和翻译，1895 年时任职于旧金山的日本横滨银行。也是在旧金山期间，他与著名侨商、当地华人领袖余大之女余爱娣成婚，时为 1897 年。

1907 年，张康仁选择与家人一起回国发展，在上海担任总会计师，同时在南京某大学讲授国际法和银行学。据说他曾被清廷授予“法科进士”，或许正是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到了 1908 年底，他又重返美国，在华盛顿的中国使馆工作，1910 年到 1913 年间又担任中国驻温哥华领事。

1912 年，民国成立，他亦转而为民国政府服务。1913 年到 1914 年间，他任驻美使馆一等秘书、代办，据说其间曾参加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白宫为女儿举行的婚宴。1916 年到 1917 年间，他又在加州任中国海军学生监督，后因病退休。

1926 年，张康仁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时年 66 岁。他的妻子十分高寿，1972 年以 98 岁高龄辞世。据载，他们育有一子一女，女儿年轻时不幸在车祸中被烧死，儿子于 1927 年大学毕业，1974 年去世。

为洪门发声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洪门乃至会党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般人的认知中 ,会党就是当年的黑社会 ,但这只是会党面目的一部分。会党作为民间组织 ,是底层“抱团取暖”的一种主要形式 ,尤其是海外会党 ,其主旨是为侨胞谋权益 ,对抗各种歧视。

从晚清开始 ,会党就活跃于各种政治斗争中 ,尤其是同盟会等革命组织 ,都有着极深的会党背景 ,大量会员同时也是会党中人 ,许多武装起义和革命党人最热衷的暗杀 ,更是由会党出人出钱 ,占据主导。当年孙中山在海外筹划革命 ,也离不开会党的大力相助 ,其中 ,美国、加拿大地区的洪门致公堂贡献极大 ,它也是致公党的前身 ,孙中山就曾加入致公堂 ,被推举为“洪棍” ,成为其“大哥”级人物。

民国成立后 ,致公堂有意在国内注册立案为合法组织 ,并组织政党。1912 年 1 月 9 日 ,致公堂电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提出 :“前本总堂所委谢秋君偕公同至各埠筹饷事已经完全 ,是以今日本堂之谢秋君回国办理 ,偕翼汉君共为本堂代表 ,组织一完全政党 ,故望大总统……协力扶持完全政党之事。”1 月 29 日 ,维多利亚致公总堂又致函孙中山 ,提出“愿牺牲公产为民国军用 ,求大总统早日北伐 ,直捣幽燕 ,生擒建酋……故特命谢秋君、梁翼汉君回国见大总统 ,办理政党事宜。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 ,况且大总统是洪门总领 ,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成功之灵 ,慰同人仰望之心”。1912 年 3 月 ,美洲致公堂首领黄三德专程回国 ,向南京临时政府呈报洪门筹饷局的各种文件 、捐册 ,同时也向孙中山提出海外致公堂在国内立案活动的要求 。

老牌革命党人 ,曾撰写《革命逸史》的冯自由曾在加拿大温哥华担任

《大汉公报》主笔,在民国建立后被召回国,担任稽勋局局长。1912 年 7 月 21 日,他致函致公堂,调查其对革命之功绩,准备颁发勋章。1913 年,时任驻温哥华领事的张康仁致函冯自由,并请转呈国务院,表扬洪门功绩,其中写道:“慨然冒险而筹革命巨款者,则以加属致公堂为始……洪门致公堂者,实为世界历史所未有,殊非过言也。”对于洪门致公堂的合法性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由政府给以永久之印信,彰其盛德,表其固有完备之组织,及保全其爱国党派之真诚,如是则后世永远引为纪念,皆知洪门致公堂为最高尚之爱国模范”。

张康仁的态度也使得致公堂极为兴奋。于是,他们向驻加拿大总领事卢炳田及民国政府递交申请,希望批准致公堂为正式合法社会组织。卢炳田也做出批示:“据禀称,加属云哥华、域多利、兰拿、纽威士缅士打,并各埠致公堂同人,前创《大汉报》鼓吹革命,并慨捐革命军费前后逾数十万,自民国成立以后,主张统一建设,改良会章,以联络华人团体,讲求侨民自治,研究工商实业,赞助国家行政为宗旨,恳请立案,作为正式社会等情,查核所禀会章,与正式社会相符,应准如所请立案,以垂永久,仰该会员等,自此联络华侨,融和党见,实行自由,使我华人商业,彪炳寰球,裨益国家,本总领事有厚望焉。”

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共患难并不等于共富贵。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南京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从政治角度考量,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向执政党转型已是必然,这就迫使孙中山等人进行自身队伍的“净化”,尽量去除那些会落人口实的元素,“黑社会”元素当然在此范围内。因此,孙中山一方面不愿意继续保持致公堂的身份,另一方面也不支持致公堂在国内立案成为合法组织,尽管致公堂话事人黄三德专门为此事发函电希望获得其支持。

这样说也许会让很多人感到难受 ,但政治从来都不是讲义气的 ,也不会纯粹干净 ,而只有利益的考量。因为利益 ,当年的革命党人必须借助会党的力量去反清 ;也因为利益 ,革命党人会在夺取政权后考虑与会党撇清关系。

孙中山的态度让黄三德颇为心凉。当时 ,孙中山对致公堂发来的希望在国内合法活动的函电置之不理 ,还表示“如其犯法 ,则政府不得不以法惩治之”。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 ,他仍应付了事 ,勉强与黄三德在广州见面 ,口头答应致公堂在国内合法立案 ,正常活动 ,但要求黄三德必须循正常程序向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递交申请 。这种程序本属必要 ,可胡汉民作为孙中山的亲信 ,显然洞悉其用意 ,于是拖延不办。黄三德忍无可忍 ,再次致函孙中山询问此事 ,孙中山再度施展卸字诀 ,回信让黄三德继续找胡汉民交涉 ,胡汉民那边当然继续拖延。

这种长时间的拖延终于惹火了黄三德 ,他正式向胡汉民提出 ,如不批准致公堂在国内合法立案 ,那么革命党人应偿还当年洪门所捐献的军饷 ,并帮助赎回洪门为帮助革命而变卖典押的实业 。孙中山与胡汉民仍不为所动。黄三德悲愤之下 ,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盖为其自己组织政党起见 ,欲消灭而吸收之 ,不愿意洪门再成势力也。”

黄三德是广东台山人 ,出身农家 ,读过私塾 ,也好习武。15 岁那年漂洋过海前往美国旧金山 ,摸爬滚打多年后 ,成为美洲洪门致公堂的大佬。他为人急公好义 ,清正廉明 ,热心为侨胞争取权益。他与孙中山结识后 ,热心帮助革命 ,1904 年 ,孙中山在旧金山被美国海关当局以“中国乱党”的罪名拘禁 ,并有被遣返回国的危险 ,黄三德“倾全力以赴救孙”,甘冒巨大危险 ,为之多方奔走 ,将其保释后 ,又以 5000 美元高价聘请著名律师为其打官司 ,最终胜诉 ,使得孙中山成功入境。

孙中山赴美期间,吃喝住宿费用都由黄三德签单,出外时都由黄三德安排洪门中人护送,还为他介绍北美的各路华侨领袖,为其营造影响力。历次革命行动,黄三德都积极捐款捐物,甚至毅然抵押变卖致公堂的物业。

在此前多年时间里几近无条件付出的黄三德,在革命成功后居然遭遇如此冷遇,怎会不寒心?

到了 1913 年,被迫远走的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寄信给黄三德,希望洪门加入,将致公堂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黄三德对此更为不满。

倒是袁世凯在 1913 年 12 月 26 日给出了答复,批准了致公堂在国内立案的请求,“呈及简章均悉,该华侨等,倾心祖国,志存光复,实属深明大义,效忠共和,自应准予立案;至所请颁给铃记,应自行查照本月十八日公报内务部训令,按照仪式,自刊图记,呈由该管领事报院及外交部备案可也”。

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使得袁世凯在海外致公堂和华侨中赢得了相当的好感与政治资本。

后来的黄三德,与孙中山决裂。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三德数十年之心如一日,不慕名利,不求做官,当孙文得志时,亦无所求,虽数次回国,仍是空手而回。”1936 年,由黄三德口述,并由他人整理的《洪门革命史》一书出版,有人认为该书对孙中山有大量偏见,但不为尊者讳,未必就等于偏见。那时的黄三德已垂垂老矣,对孙中山也不见得有多少恨意(孙中山于 1925 年去世时,黄三德还曾大哭,深切缅怀),岁月所消磨的,不仅仅是当年的豪情壮志、快意恩仇,也许还有记忆。而此时,曾为致公堂发声的张康仁也已去世 10 年。

詹天佑:中国铁路第一人

在中国近代史上,铁路承载着极大的政治意义。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产物,它象征着交通的便利、工业的发展,也象征着开放。

在被强行打开国门后,清政府对铁路和电报这两大领域的认知也从零开始,由起初的不敢置信乃至惊惧,渐渐发展为适应与尝试,并将之视为强国之路上的规定任务。

清政府面临的最大困难,一是观念,二是人才。在观念问题上,朝中大臣一直分为两派,一派是实干派;另一派保守到可笑,对实干派处处掣肘,甚至以私德问题或捏造的罪名对实干派进行攻击。有趣的是,因为实干派官员中的袁世凯等人曾是"阶级敌人",所以根据"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一原则,保守派的一些官员还被当成了"疾恶如仇"的清官。至于人才,即使各地广开新式学堂,也因之前欠账太多,又受限于人才培养周期,根本无法满足发展需要。

也正因此,尽管留美幼童在学业未完成的状态下被强行召回,分配时亦极为随意,但仍然凭借着开阔视野、丰富知识而迅速成为兴办洋务最需要的人才。在铁路和电报两大领域,留美幼童们的表现都极为出色。其中,铁路领域的佼佼者自然首推詹天佑。

尽管国人的历史知识普遍匮乏,但很少有人会不知道詹天佑,因为

他的故事一直存在于中学语文课本中。

出发前便定下婚约

詹天佑祖籍是江西婺源,但出生于广东南海县。1872 年,年仅 11 岁的他入选首批留美幼童,前往美国。

当时,清廷规定“幼童选定后,取具年貌籍贯,暨亲属甘结收局注册”。所谓“甘结”,其实就是生死状。凑巧的是,在如今所留存的甘结中,就有詹天佑的那一张,如今成为众多研究文献中的必引资料。当时,詹天佑父亲詹兴洪“甘结”如下:“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兹有子天佑情愿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派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徽州婺源县人氏。曾祖文贤,祖世鸾,父兴洪。同治年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那时的詹家,正家道中落,詹天佑刚刚读完私塾,去向无着,因此才走上了当时并不被看好的留洋之路。詹家原本居住在婺源县庐坑村,曾祖父詹万榜是乾隆年间的人,在 8 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其父经营一家杂货铺,因入不敷出,子女只能分家自谋出路。詹万榜便迁居别村,挂牌行医。当时婺源茶叶享有盛名,还出口英国,广州即其中转站。因茶叶收购价极低,在英国售价极高,利润很大,詹万榜便收购了一批茶叶前往广州,结果却血本无归,连回家路费也没了,只能羁留广州。好在徽商众多,在婺源同乡帮助下,詹万榜在广州西关开起了名为万孚的茶行,生意渐好,还了各种债务,还捐了太学士官职。詹万榜的儿子詹世鸾也随父亲经商,并捐了候选布政司官职,列授儒林郎,相当于六品顶戴。但到

了詹天佑的父亲詹万洪这一辈 ,遭遇了两次鸦片战争 ,广州十三行在英军炮火下纷纷倒闭 ,詹家生意也难以为继 ,詹家只能前往南海居住 ,靠种田维持生计。

詹天佑之所以报名参加留美考试 ,是受父亲的朋友谭伯村鼓动。谭伯村是徽商 ,居住于香港 ,与詹兴洪关系不错。他见到容闳的招生简章后 ,专程从香港赶到南海 ,希望詹天佑可以报名。詹兴洪原有两个儿子 ,但小儿子夭折 ,詹天佑形同独子。尽管詹兴洪还是希望詹天佑可以循科举正途 ,但确实无力供养 ;可将孩子送往遥远的美国 ,也确实让他们为难 ,毕竟就当时而言 ,这可以算是生死未卜的行程。

但在谭伯村的极力劝说下 ,詹兴洪夫妇还是同意了让詹天佑报名。而谭伯村也在詹天佑临行前 ,让他和自己的四女儿订下婚约。

曾有人这样分析 :幼童赴美时大多为 11—13 岁之间 ,按照当初留洋 10 余年的构想 ,回国时都已 20 多岁。在普遍早婚的古代 ,幼童的婚事问题也许会成为父母的一大顾虑。而谭伯村将女儿许配给詹天佑 ,解决了其父母的后顾之忧 ,可算是以旧式婚约促成新式留学。

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

如今 ,在清末时期隶属南海县的广州荔湾区 ,仍有詹天佑故居留存 ,并已被辟为纪念馆。它位于荔湾区十二甫西街芽菜巷 42 号 ,为青砖木结构的西关大屋 ,詹天佑便在此出生 ,并度过童年 ,留美归来后也曾在此住过数年。2004 年此故居重修 ,并新建詹天佑故居纪念馆 ,2005 年正式开放。

在这个纪念馆内 ,除詹天佑故居外 ,还有展览厅和模拟八达岭段铁

路的小景公园。当然,少不了的还有詹天佑雕塑,不过,与大多数名人雕塑都是意气风发的成年版本不同,这个詹天佑雕塑却是孩童模样,站在轮船上眺望。

那是詹天佑漂洋过海时的情形。对于身处封闭社会的十几岁少年而言,那辽阔大海和钢铁轮船足以让他们震撼,未知的世界也会让他们充满憧憬。

在美国登岸后,幼童们又坐上了火车。后世提起詹天佑,常常会将他与火车的"第一次相遇"无限放大,认为这次经历让詹天佑确立了人生目标。其实这多少有些"为尊者讳",人们总喜欢这样附会,以求让故事变得更"美好"。我倒是更愿意相信,那时的詹天佑,年仅 12 岁的詹天佑,对眼前一切懵懂好奇,也充满憧憬。

不过,这条铁路确实意义重大。它横跨美国东西部,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干线。1862 年,它破土动工,在大量华工的努力下,工程仅用 7 年时间便完成,是原计划的一半。有人统计,每 3 英里的铁轨下就横卧着 5 个华工的尸体。

有了这条铁路干线,3000 公里的距离也变得不那么遥远,幼童们用 6 天时间走完了这次旅程,于 1872 年 9 月抵达美国康涅狄格河畔的春田城(即斯普林菲尔德市)。也是那一年的 10 月,同治皇帝大婚,英国公使提出在北京城外修筑一条铁路作为贺礼,遭到了拒绝。

最初的詹天佑,与同学们一样,寄宿在美国人家中,一边读书,一边学英语并习惯美国生活。当时,他与欧阳庚一起住在诺索布夫人家中,并就读于康州威士哈芬海滨男生学校,诺索布夫人恰恰是这所私立预备学校的校长。后来,詹天佑曾深情回忆:"亲爱的诺索布夫人,当读你的信时,我回忆起过去与你相处的日子。我们在你的园子里尽情快乐,在

你的住处欣赏美丽的黄昏。我也常常记起你对我们的慈爱和你为教育我所受到的辛苦。”1906 年 ,已担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的詹天佑致信诺索布夫人 ,他在信中写道 :“我现为七个孩子的父亲 ,三女四男。现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 ,本路为第一条全部由中国工程师负责兴建之铁路 ,企望吾人能顺利完成 ! 特附上剪报一份 ,使你知道当年在你监护下的一位中国幼童 ,现在已完成和将来继续要完成的任务 。他早期的教育完全受惠于你 !”

1876 年 ,他考取了纽海文中学。曾经读过一篇有关詹天佑的文章 ,里面提到他的这一经历时 ,为了表现“遥遥相对”的戏剧效果 ,也提到了当年国内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一年 ,国内第一条铁路通车了 ,即吴淞到上海的小铁路 ,当时的国内士绅见到铁路和火车后大惊 ,认为破坏风水 ,不利自家安全 ,居然聚众将铁路拆毁 ,将铁轨投入湖中。

这个国家有过几次闭关锁国的经历 ,与外界差异越大 ,所闹笑话就越多。

也是在 1876 年 ,容闳率领留美幼童们参加了一次集体活动——在美国费城举办的第一届世博会。那一年 ,清政府也应邀参展 ,带来了瓷器、茶叶和丝绸。可让留美幼童们震撼的 ,却是蒸汽机、电话、电梯和新式武器 ,此外 ,还有一段 3 海里的钢轨。留美幼童也让洋人们感到惊奇 ,这些黄皮肤的孩子们已经可以操一口流利英语 ,落落大方、侃侃而谈。

尽管此时的美国排华之风日盛 ,詹天佑以及其他的留美幼童都无法进入美国的陆海军学校学习 ,但仍可报考普通大学。1878 年 ,詹天佑考入了耶鲁大学的土木工程系 ,就读铁路工程专业。在那支由留美幼童组成的著名棒球队里 ,他也是主力。尽管是工科学生 ,詹天佑并不像如今的一些理工科学生那样狭隘无趣、忽视人文 ,而是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以

及民主著作。至于他所修读的课程,则包括德文、英文、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工程制图、球面三角学、力学、自然地理、植物学、经济学、等角投影绘图学、微分学、测量学、投影几何学、法文、积分学、地形测量学、野外工程学、铁路路线勘测学、路基土方计算、桥梁及房屋结构学、工程材料学、凿岩工程学、地质学、矿冶学、蒸汽机动力工程学、水力学和天文测量学等。

1881 年,当留美幼童被清政府强行召回时,詹天佑是仅有的两名学士学位获得者之一。他的毕业成绩为第一名,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码头起重机的研究"。这论文并非空谈,为了撰写论文,詹天佑专门前往纽哈芬港口的海陆联运码头,实地调查港口使用的一种巨型起重机。离开美国时,他的老师罗索夫人送给他一箱关于铁路的资料。

蛰伏多年

留美幼童回到国内后,分配极为随意。詹天佑的分配也不对口,去向是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轮船驾驶。搞笑的是,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出现了。

之所以用"搞笑"这个形容词,是因为这条铁路的修建过程确实搞笑无比。这条铁路的两端分别是唐山和胥各庄,主要是为了解决开平煤矿的运输问题。当时,李鸿章上书慈禧,要求兴建这条仅有 9 公里的铁路。慈禧一向反感铁路,但这条铁路距离京城颇远,而且极短,于是破例同意。但即使慈禧同意了,国内那些愚昧的守旧派官员也不会停止添乱,比如御史何福壁就上书道:"车轮所过之处,声闻数十里,雷轰电骇,震厉殊常,于地脉不无损伤。"一听地脉会受伤,慈禧立刻叫停。

但此时 ,铁路的路基已经建成 ,铁轨还未铺就。为免前功尽弃 ,李鸿章只好折中 ,上书慈禧 ,表示铁路还是要修完 ,但修好后以骡马而不是蒸汽火车头来拖动机车 ,保证没声音 ,可确保地脉无虞 ,慈禧方才同意。

以骡马拖动车厢 ,确实是铁路史上最大的笑话。在这样的笑话面前 ,詹天佑根本没有机会学以致用 ,他只能选择蛰伏。

在福建船政学堂期间 ,詹天佑因成绩优异 ,获五品军工衔。后调入福建水师的旗舰“扬武号”,参加了 1884 年的马尾海战。在这次海战中 ,福建水师因指挥不力、舰船落后而惨败 ,但詹天佑在战事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是他指挥船上官兵以尾炮击中法军指挥舰“伏尔他号”。上海著名的《字林西报》后来曾这样报道 :“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威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 ,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 ,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 ,鼓足勇气 ,在水中救起多人……”

战后 ,詹天佑被调入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习 ,同年得清政府授五品顶戴。这份教习工作 ,他一直做到了 1888 年 ,期间一直住在广州荔湾区十二甫西街芽菜巷 42 号的家中。

1888 年 ,詹天佑离开广州 ,北上天津 ,他在耶鲁大学的专业终于开始有了用武之地。他在天津的第一份工作是中国铁路公司的帮工程司 ,推荐人是他的留美老同学邝孙谋。也是这一年 ,李鸿章为了让慈禧熟悉、接受铁路 ,在皇宫西苑给慈禧太后造了一条小铁路 ,让慈禧坐着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慈禧坐的不是蒸汽机车 ,而是太监拉的火车。

詹天佑得到这份工作 ,背景并不简单。当时 ,英国工程师金达掌控了中国铁路的制造和维护。因此 ,中国铁路的路轨统一采用英国标准和英国钢材 ,有故障的话只能由他来维修 ,其他人不得插手 ,采购来源也指

定为英国厂商。到了 1887 年底,留德官员荫昌将德国工程师鲍尔安排进了中国铁路公司。这位鲍尔与金达之间有各种分歧,金达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决定起用中国工程师作为助手,他首先选中的是曾经在开平矿务局工作的邝孙谋。邝孙谋自知能力有限,却向金达推荐了自己的学长詹天佑。

詹天佑进入铁路公司后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修建塘沽至天津的铁路,他深入工地与工人同吃同住。而他参与的第一个大项目,则是由金达主持的唐山至山海关的关内段铁路建设。

据载,在这一工程中,设计长度为 671 米的滦河大桥是最关键之处,它也是我国在黄河大桥修筑前的最长钢桥,共有桥墩 16 座,桥台 2 座。1892 年,工程修筑至滦河大桥段,桥基所在的河床流沙层极厚,水流又急,时常带着砾石和漂流物急泻而下,因此英国人科克斯最初铺设的桥墩两次被冲毁,日德两国的工程师随后进行尝试,也均告失败。詹天佑对滦河底的地质土壤进行了周密测量研究后,又参考了北宋匠人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和明末清初学者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书籍,决定改变桩址,同时引进了当时属于新技术的压气沉箱施工,在有顶无底的箱体中输入压缩空气,下沉到坚硬层,再灌注混凝土,成功解决了难题,也使得工程得以在 1893 年如期完工。

这是中国首次使用压气沉箱技术,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得知此事后,于 1894 年选举詹天佑入会,他也是第一个入会的中国工程师。

其后,詹天佑又先后参与了多条铁路的设计与施工。1894 年,因中日战争爆发,关外铁路停工,他被调往津卢铁路(天津至卢沟桥),进行测量和修路工作。1895 年,他又被派往锦州铁路任驻段工程司,并指挥修筑沟帮子至营口支线。1900 年营口支线通车后,他又被派往江西萍醴铁

路 ,其间 ,他反对外国工程师采用窄轨轨距的主张 ,坚持采用标准轨距。1901 年 ,《辛丑条约》签订后 ,中国收回被英俄两国占据的关内外铁路 ,詹天佑迅速将之修复通车。1902 年 ,他终于迎来了独当一面的机会。

袁世凯的提携是留美幼童上位的标配

对于留美幼童来说 ,若想在回国后有所成就 ,基本都离不开袁世凯。甚至可以说 ,袁世凯的提携是留美幼童上位的标配。詹天佑也不例外。

1901 年 ,袁世凯上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留美幼童迅速上位 ,唐绍仪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 ,梁敦彦被任命为京奉铁路总办 ,蔡绍基任北洋大学总办……

次年 ,慈禧有意“展谒西陵” ,还突发奇想 ,打算乘火车前往。此时的慈禧已经接受了铁路 ,接受的原因颇为讽刺。庚子之乱后 ,慈禧与光绪逃往西安 ,直至《辛丑条约》签订后才返回北京 ,途经保定时 ,袁世凯特别安排慈禧乘坐了通车不久的卢保铁路。

后世认为 ,慈禧这次乘坐火车是一个象征性的政治信号 ,主旨是为了弥补在庚子之乱中与列强的裂痕。1901 年 12 月 17 日 ,慈禧在返京途中就要求各国公使“早行觐见 ,以笃邦交而重使事” ,还宣布觐见公使夫人 ,“用昭睦谊” ,“欲调和列强 ,凡可行者皆行之 ,使中外感情 ,重归于好 ,以为异日施政之本”。体验到了火车的便利的慈禧 ,回京后宣布乘坐火车前往西陵 ,在外界看来也是一种政治信号 ,因为皇室谒陵是绝对的大事 ,乘坐火车前往 ,可视为保守的清廷统治者开始转向开明 。

不过 ,要坐火车“展谒西陵”并不容易 ,因为西陵当时并无铁路经过 ,

所以需在新城县高碑店(现高碑店市)到易县梁各庄新筑一条支线,限期6个月。

袁世凯最初打算找金达做总工程师,但法国驻华公使认为,这条通往西陵的铁路由高碑店延伸而出,属于京汉铁路支线。京汉铁路是清政府向法国和比利时借款修建的,其支线当然应该聘请法国工程师修建。在这种情况下,英法两国扯皮达2个月,闹得不可开交。

眼看仅剩4个月期限,袁世凯果断决定:你们慢慢吵,我谁也不用,决定由中国人自己修筑。他任命的人选有两个,均是留美幼童出身:关内外铁路总办梁如浩兼任西陵铁路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

这对老同学顺利完成了任务,仅用了4个月时间便修好了这条只有43公里的西陵铁路(又称新易铁路)。这也是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筹建、设计和施工的铁路——我们的历史书上说京张铁路才是“第一”,不知有没有意识形态的原因。这条铁路仅仅被使用过两次,一是慈禧太后谒陵,另一次则是运送光绪的灵柩。

第一次独当一面就大放异彩,詹天佑得到了袁世凯以及慈禧的信任。慈禧在乘坐火车前往西陵时,心情甚佳,将车厢中所有陈列品都赏赐给了詹天佑和火车司机张美。詹天佑将自己所得的珍宝全部分发给修路人员,自己仅留下一个自鸣钟,这个自鸣钟如今还保存在詹天佑纪念馆中。

其后,他回广东为父奔丧时,还曾勘测潮汕铁路。返程时经过上海,又被聘为上海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参议,筹划江苏沪宁铁路并调查道清铁路(道口至清化)。

京张铁路的资金问题

詹天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无疑是修建京张铁路。

1904 年 ,袁世凯上书清廷 ,提议修建京张铁路。此举多少有点出于无奈 ,因为当时日本与俄国正为了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掀起战争 ,关内外铁路的修筑也因此受阻 ,无法由沈阳向北延伸。因此 ,袁世凯选择了连接北京与西北的另一要塞张家口 。

据记载 ,张家口一直是南北货物集散地 ,塞北的皮毛、牲畜 ,南方的茶叶、纸张和布匹 ,来往均需经过张家口。但张家口和北京之间横亘着太行山脉 ,以往只能依靠骆驼运送货物。也正因此 ,途中的鸡鸣驿还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驿站。

1905 年 ,清政府决定修筑京张铁路 ,委任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司兼会办 ,后升任总办兼总工程司。

这条铁路由北京至张家口 ,地形复杂 ,工程艰巨 ,且是通往西北的要道。曾与詹天佑一起完成新易铁路的老同学梁如浩 ,在这条铁路的建设中又出力不少。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司兼会办期间 ,梁如浩就担任总办 ,任期内解决了京张铁路的经费问题。

京张铁路的经费问题是个大难题 ,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后 ,巨额赔款已使得财政捉襟见肘。袁世凯最先想到的是关内外铁路 ,当时 ,关内外铁路客货两旺 ,始终盈利 ,1904 年除开销和归还英国贷款外 ,盈利达 800 多万元。

但关内外铁路本是清政府向英国借款 230 万英镑所修筑 ,英国人通过借款掌握了关内外铁路的控制权 ,将铁路每年的丰厚利润都存入汇丰

银行,作为清政府的还款保障金。清政府想拿这笔钱来用,必须要先得到英国人的同意。

英国人借机提出,由关内外铁路总工程师金达担任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以控制京张路权。俄国则认为张家口是其势力范围,京张铁路应由其修建和控制。这个局面就如之前的新易铁路一样,引来列强相争。而清政府的处理方式同样与修筑新易铁路时一样,撂开双方,决定自行修路。这一决定引来外界轻视,认为中国无力自行完成这一工程。詹天佑却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

在资金问题上,梁如浩负责了谈判。他代表清政府提出,关内外铁路收入中,除划出6个月还款本息给中英公司外,其余全部提取出来用于修筑京张铁路。英国人则要求"备存一年本息",梁如浩并不让步,坚持谈判,最终使得英国人同意此要求,这是晚清政府在外交领域难得的闪光时刻,梁如浩立下了大功。而且,在京张铁路的建设中,经费基本做到顺利调拨,未借任何外债,全靠梁如浩在关内外铁路盈余中经营筹划,亦是大功一件。此外,在京张铁路筹备期内,梁如浩从关内外铁路局调了陈西林、邝孙谋等多名工程师支援京张铁路局,也为京张铁路的修筑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大功臣是被历史选择性遮蔽的袁世凯。建路之初,他送给詹天佑一座鸟鸣钟,后来又在《致詹天佑函》中写道:"修筑京张铁路,乃大张我国人志气之举。"除了这些精神关怀之外,袁世凯的最大功劳是反复与清廷交涉筑路决策,在筹措资金方面也是坚强后盾,面对洋人阻碍干扰也不为所动。尽管他不在一线,但协调工作同样艰辛。

1905年5月8日,詹天佑率领勘测队抵达丰台,准备对京张铁路全线进行勘测。勘测前,他先进京拜见了时任关内外铁路会办大臣的胡橘

菜。胡橘棻告诉他 ,金达已先行一步前往京北南口镇山中游猎 ,所谓“游猎”只是幌子 ,实则是勘察地形 ,绘制铁路路线。因为英国人根本不相信中国可以独立修筑京张铁路。

5 月 10 日 ,詹天佑率领的勘测队也出发了。这是一支相当业余的队伍 ,除詹天佑外 ,仅有徐士远和张鸿诰两人懂得铁路工程技术。这两人都是山海关铁路工程学堂的第一期毕业生 ,是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铁路专业人员。

山海关铁路工程学堂创建于 1896 年 ,主旨是为了培养中国本土的铁路专业人才 ,但于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京后停办 ,仅有 17 名学生完成学业。这并不是中国最早的铁路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 ,早在 1888 年 ,天津武备学堂就附设了一个铁路班 ,但也仅仅毕业了 12 名学生。英国人金达是最早提出在中国建立铁路学堂的人 ,1893 年 ,他上书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 ,建议开设学堂 ,甲午战争后 ,清政府痛定思痛 ,王文韶等大员纷纷上书 ,建议成立铁路学堂 ,终于促成了山海关铁路工程学堂的成立。但学堂短短 4 年就宣告停办的命运 ,也侧面见证了中国铁路事业的艰难。

京张铁路大致分为三段 ,第一段由丰台柳村到昌平南口 ,地势较平坦 ,詹天佑仅用一周就完成了这 50 公里的勘测。第三段是从八达岭到张家口 ,总长约 110 公里 ,也比较平坦。只有 20 公里长的第二段关沟则是最难的地方 ,也就是居庸关所处的险要山隘 ,俗称“军都径” ,即南口至八达岭。詹天佑后来曾回忆 :“京张之间工程最难之点为南口关沟 ,曾经勘测七八条线之多 ,始定一线。”这里不但地势险要 ,也是“控扼南北”的“今古巨防”。清朝《畿辅通志》中指这里“两山夹峙 ,下有巨洞 ,悬崖峭壁 ,称为绝险”。

这里虽然仅有 20 公里的距离,但海拔升高了 600 多米,詹天佑在勘测报告中称“每前进 33 尺填高一尺”,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坡度 3%”。

以往只能以骆驼行走的险要山道,如今竟然要让火车通行,难度自然惊人。詹天佑后来给邮传部写报告时这样写道:“窃查职路由南口至岔道城(八达岭)计四十里,中间层峦复岭,石峭弯多,斜度最高,施工不易。弯线必宜取长,行车方能无碍。然山道险阻,展线最难,测量期年,图经数易,得寸取寸,得尺取尺,随弯取势,遇低培高……”

据说,詹天佑还曾在这一带另寻路径。其中一条会经过名为德胜口的沟谷,虽然不算险要,但曲折狭窄,线路更长,沿途还得爬山凿洞;另一条沿永定河道走,距离极远。距离一长,花费就大,而银子恰恰是詹天佑的大难题,于是只好放弃。据载,这两条路线当时虽被放弃,但 1949 年后均实现了道路铺设,前者成了国道,后者成了铁路丰沙线。

说到资金,不得不提京张铁路的成本预算。起初的工程预算是白银 500 万两,平均每公里造价不足 3 万两,相比之下,同时代的关内外铁路每公里造价为 9.46 万两,京汉铁路 9.56 万两,沪宁铁路每公里造价更超过 12 万两……可它们的施工难度却低于京张铁路。詹天佑在勘测后给出的预算是 729 万两,工程完成后的实际花费为 693 万两,从每公里造价来看,仍堪称奇迹。

被意识形态化的京张铁路和詹天佑

最初,詹天佑设想开挖八达岭隧道,后来,又有意绕行八达岭,即由青龙桥转向,翻过黄土岭,绕过八达岭。在京张铁路正式开工后,他再次前往青龙桥一代勘测,反复权衡。而最终决定的结果,却是两种办法兼

而用之 :先从石佛寺向东北青龙桥方向 ,然后再折返向八达岭方向 ,到半山腰时再开挖隧道穿过八达岭 。

这个在青龙桥一带的一进一退 ,即京张铁路的“人”字形设计。它类似于人们爬山时为节省体力所走的“之”字形路线。这也使得隧道长度得以缩短 ,由原先的 1800 米缩短到了 1091 米。但即使是 1091 米的隧道 ,仍被视作“中国人无法承担的艰巨工程”。

据载 ,当时许多西方工程师都曾以行猎为名前往施工现场窥探 ,见到中国工人只能使用钢钎和炸药这两样基本工具 ,便冷嘲热讽。曾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的詹天佑亦遭嘲讽 ,有美国报纸就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铁路工程师是从船上毕业的”。

但恰恰是因为詹天佑设计的直井施工法 ,使得这条隧道仅仅用了一年半就得以挖通。所谓直井施工法 ,即在隧道两端相向挖掘的同时 ,再从八达岭上开挖两个直井 ,垂直到隧道平面 ,然后再向两端开凿 ,这样就形成了六个工作面同时挖掘 ,大大提高了效率。

在京张铁路的建设中 ,直井施工法是詹天佑的最大创举 。也许有人看到这句话会质疑了 :“人”字形设计呢? 詹氏钩呢?

詹天佑的伟大和历史功绩毋庸置疑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多少被意识形态化了。所谓意识形态化 ,一般有两种表现 ,一是功劳被夸大 ,二是品行被粉饰。在功劳方面 ,“人”字形设计一度被视为詹天佑的发明 ,其实不然 ,它最早建于南美地区的森林和矿山铁路 ,绝非詹天佑发明。至于在列车连接上广泛使用 ,直到今天仍然可见的詹氏钩 ,被安插在詹天佑头上也是个“美丽的错误”。起初是很多人以为“詹”即指詹天佑 ,因此以讹传讹 ,可到了后来 ,甚至一些史书也这样记载 ,实属不该。

其实詹氏钩的发明者是美国工程师詹尼 ,詹天佑早在留学时 ,便对

此有所了解。那时的列车连接,有些用铁链,有些用插销,但詹氏钩无疑是最方便也最安全的。1905 年 12 月 12 日,也就是京张铁路开工不久时,铺轨工程开始进行,但就在铺轨的第一天,一列工程车的车钩链子折断,造成脱轨事故。当时恰恰是国内外广泛认为“中国人不能自修铁路”的当口,于是引来大量批评,詹天佑则使用了詹氏钩,顺利解决了这一问题。詹天佑后来曾译著中国第一部工程学词典《华英工学字汇》,在书中将原本译为“詹氏车钩”的词条改为“郑氏车钩”,显然是不想让人误会。

在品行上的粉饰,意识形态痕迹更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詹天佑都被包装为与洋人势不两立的爱国英雄,就差来个“上擂台痛打老外”的故事了。他爱国绝对不假,也堪得上“英雄”二字,但说他与洋人势不两立,纯属意识形态下的想象。作为一个留美高才生,詹天佑对西方政治文明和科学技术都极为推崇,绝不是那种动辄抵制洋货甚至打砸洋品牌的“愤青”。尽管他在保卫路权一事上寸步不让,誓不把权益让给洋人,但他绝不排外,即使是金达这样的“老对手”,他也十分尊重,甚至在技术领域与其惺惺相惜。在修路期间,他与美国同学和当年的老师(如诺索布夫人)常有书信往来,对美国生活也充满怀念。

还有一个关于詹天佑的故事基本可断定为谣言。在许多关于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的“英雄模范事迹报告”中,都曾引用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成功完成前两段工程后(即丰台柳村到昌平南口的第一段,以及八达岭到张家口这个最为艰巨的第二段),詹天佑在第三段工程中遇到了一个麻烦,修筑下花园到鸡鸣驿矿区岔道一段时,途经广宅家中坟地。广宅是人名,曾任道员,是时为镇国公的皇室载泽的亲戚,见状便率众闹事,阻止工程,私下还向詹天佑行贿,希望他改道。邮传部也不敢过问此事,但詹天佑绝不改道,也不受贿,以辞职相争。而且此处坟地众多,北

面是郑王坟 ,南面是宦官坟 ,西面是那拉氏父亲桂公坟 ,改道的话工程极大 ,会花费大量人力财力以及时间。争执之际 ,北京发生了五大臣出洋被炸一事 ,载泽受了惊吓 ,闭门不出 ,广宅失去靠山 ,最终只能同意铁路经其坟墙外通过。

这个故事首先在时间上就完全对不上。五大臣出洋被炸一事发生在 1905 年 9 月 ,那时京张铁路开工才不久 ,如何修到第三段? 再者 ,这个故事在思维上也极为可笑 ,郑王坟碰不得 ,桂公坟碰不得 ,只有广宅家的坟才碰得? 按这个逻辑 ,广宅反倒成了弱势者了。

这些年来 ,大凡提到有成就的人物 ,对其进行粉饰造假往往成了常态。仿佛没有对抗强权、绝不受贿之类的桥段 ,就不能塑造人物高大全的形象。但我们真的不需要这种被粉饰的詹天佑。

当然 ,这绝对不是说詹天佑在修路过程中没有遇过类似的阻碍。在那个愚昧的年代里 ,修筑铁路往往要背上“破坏风水”的罪名。相对见识广博的官僚、士绅已是如此 ,何况平民? 像当年义和团就曾极力排洋 ,许多家庭仅仅是因为有洋火(即火柴),便惨遭灭门。扒铁路也是义和团的一大爱好 ,原因就是在意风水。

1909 年 10 月 2 日 ,京张铁路正式通车 ,工期比计划缩短 2 年。当时 ,国内铁路因列强瓜分的原因而标准不一 ,比如德国用标准轨 ,俄国用宽轨 ,法国用窄轨 ,詹天佑在建设京张铁路时 ,选择“1435”标准轨距 ,奠定了中国铁路网与国际接轨的基础。

“京张”之后

成功修筑京张铁路后 ,詹天佑的声望达到了顶峰。清政府将他提拔为邮传部候补承参 ,1910 年还授其工科进士 ,在 12 名进士中排名第一。

按科举制度来衡量的话,即工科状元。此外,他还担任留学生主试官、学部咨议官。

在铁路领域,他也担任了大量顾问职务,如河南商办洛潼铁路工程顾问、四川商办川汉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理兼总工程师等职,来往于北京、洛阳、潼关、宜昌、广州、武汉等地。而粤汉铁路,可算是詹天佑内心的最大期待,他希望将商办的粤汉铁路与京汉铁路相连,实现南北大贯通。但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和随之而来的"保路运动",不但使得詹天佑的这一期待暂时破灭,也终于成了压倒晚清的最后一根稻草,辛亥革命终于爆发。此时的詹天佑已是清廷的二品官员,但他并未选择避难,而是坚守于粤汉铁路公司的岗位。在那个时代更迭之际,粤汉铁路公司无人离开,列车也正常运行,不似其他一些线路陷入瘫痪,其中自有詹天佑之功。

他还得到了孙中山的邀约,筹办汉粤川铁路公司。孙中山对铁路建设极为看重,认为"振兴中国首赖实业,而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这种观念也给了詹天佑极大的信心。1912 年 5 月,孙中山视察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与詹天佑相见,他对詹天佑说:"粤汉干路,关系民国建设前途盛大,且大利所在,并为振兴实业之首务……望速图之。"同年 9 月,他又在北京视察了京张铁路和张绥铁路工程局,并公开表示打算请詹天佑筹划全国铁路。

1912 年,詹天佑举家从广州迁往武汉,先后任汉粤川铁路会办、督办,交通部首任技监。如今,武汉仍保留有他的故居,位于江岸区洞庭街 51 号,由詹天佑本人设计和监造。这是一栋二层的砖木结构洋楼,三面有回廊,入口有八字形石阶,大门居中,房顶为红瓦四面坡屋面。

也是在这一年,詹天佑在武汉创立了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举为

会长。这个学会由詹天佑自己创办的广东中华工程师会、颜德庆在上海创办的工学会和徐文洞创办的上海路工同人共济会合并组成。詹天佑曾称:“吾国工事方在萌蘖之始,吾人所习皆工事。工既与国之福强如柱之有础,水之有源,则吾人不敢不重其事、朝探求而夕研究之。”在此主旨之下,学会延揽了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工程技术人才,行业也不仅仅限于铁路领域,还包括了矿业、航运、军械等,定位与职能都类似于如今的中国工程院。这也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成立最早、人数颇多、学术水准极高的科技团体,是近代工程学的基础。

1913 年,中华工程师学会迁入北京,詹天佑还带头捐建了位于西单牌楼报子街的会址。

也恰恰是中华工程师学会,于 1922 年在京张铁路的青龙桥车站为詹天佑建了一座铜像,旁边是孙中山的题字碑。

民国政局变幻,但詹天佑作为“中国铁路第一人”的地位始终无虞。他在前清时代的贵人袁世凯掌权后,又于 1914 年被委任为官办汉粤川铁路督办,开始修建粤汉和川汉两条铁路。也是那一年,他还被授予二等宝光嘉禾章。但有地位未必等于有做事空间,这之后的詹天佑,再也难现修建京张铁路时的辉煌。还是在 1914 年,因为一战爆发,英法德美四国终止了对中国的铁路借款,捉襟见肘之下,詹天佑无奈停顿了工程。之后的 5 年时间里,他只修筑了从武昌到长沙的 360 公里铁路。

无用武之地的他,选择了著书立说。他编写出版了《京张铁路工程纪要》、《京张铁路标准图》等工程技术书籍,还有我国最早的土木工程辞典《华英工程词汇》。1916 年,他还获得了香港大学颁发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很多人或许会感到奇怪,詹天佑怎会与法学有关?其实,他在法学领域和管理学领域也成就斐然。修筑京张铁路时,他就制定了严密的

工资标准和考核制度,在当时堪称创举。1916 年,他以交通部技监的身份主持了全国交通会议,制定了勘测全国铁路、统一路政、制订标准、人才考绩管理以及整顿交通财政在内的决议案,共 130 条,为中国铁路法规建设的第一人。

落寞辞世

没有铁路可修的詹天佑,除了忙于著书之外,还得承担一些外交工作。但北洋政府政局动荡,路权问题也很难顾及,使得他心力交瘁。

1919 年,他代表中国政府前往海参崴、哈尔滨出席联合监管远东铁路会议,面对有心借武力护路侵占中国领土的日本人,他在会上据理力争,取得了中国武力护路的权利。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英国人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中国人没有管理铁路的经验和能力,北洋政府不但没有据理力争,反而还提出由国际共管中国铁路。詹天佑虽因会务繁忙、心力交瘁而重病缠身,仍致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表示抗议。

他的身体已经无法再坚持会议,故于 4 月 18 日告假离开哈尔滨,回到汉口后便住进医院,4 月 24 日因心力衰竭去世,时年 58 岁。

后来,他被葬于京张铁路青龙桥火车站附近,面向京张铁路的“人”字形道路。与他同葬的是爱妻谭菊珍,也就是那位在他赴美留学前便订下婚约的谭家四小姐。他们育有二子五女,孩子们均在铁路沿线出生,可谓“铁路修到哪儿,全家就住到哪儿,孩子就生在哪儿”。在京张铁路完工后,耶鲁大学为这位毕业生倍感骄傲,于是授予其土木工程学名誉博士,并预留两个名额,供詹天佑子孙免试入学。詹天佑的两个儿子都毕业于耶鲁,后来也从事铁路工作。

邝孙谋:他举荐了詹天佑

在留美幼童中,许多人都曾从事铁路领域的工作。他们虽不如詹天佑那般耀眼,但同样贡献良多。曾经举荐詹天佑从事铁路工作的邝孙谋便是其一。

邝孙谋的名字不止一个,还有邝星池和邝景扬(有些地方误作"邝景阳"),他是广东南海大沥奇槎东村人,与詹天佑可算同乡。这位留美幼童赴美后,最先在马萨诸塞州伊斯特汉普顿的威利斯顿神学院读预科,后来考上了著名的麻省理工,专业也是土木工程,但学业未完成便被迫回国。回国后,他先是在开平煤矿(即开滦煤矿前身)的路矿学堂任职,据说还曾任开平矿务局化验师。1886 年,唐胥铁路从开平煤矿剥离,另组开平铁路公司,邝孙谋担任帮工程师,参与铁路工程,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代铁路工程师。1887 年,开平铁路公司迁往天津,后更名为中国铁路公司,邝孙谋继续任职并参与各项工程。后来,他向公司推荐了詹天佑,使得后者可以一展所长。1901 年到 1903 年,他担任株萍铁路帮工程师,1903 年至 1905 年,又在京奉铁路担任驻段工程师。在詹天佑主持京张铁路建设期间,邝孙谋也参与了勘测设计和前期施工。1906 年,广东开始兴建粤汉铁路,力邀詹天佑主持,但因京张铁路正在施工期间,詹天佑投桃报李,向广东方面推荐由邝孙谋担任粤汉铁路总工程师。

有趣的是,当詹天佑于 1911 年南下前往广东担任粤汉铁路总工程师时,邝孙谋又选择了北上,接任了京张铁路延伸出的张绥铁路(后合称京绥铁路)的总工程师,二人可算是互换位置。他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数年,直到 1916 年才卸任。值得一提的是,在任期内,他还主持了北京环城铁路的修建。当时,北京人口渐多,市民出行不便,加之各城区煤粮运输的压力越来越大,北洋政府敦促交通部修建一条环绕北京城的铁路线,邝孙谋担任了这一工程的总工程师。这条铁路从京绥铁路的西直门车站至京奉铁路的东便门车站,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四门设有车站和货场。1915 年 6 月开工,同年 12 月完工,1916 年 1 月 1 日正式通车。

1917 年到 1919 年,邝孙谋任津浦铁路总工程师。1920 年到 1921 年间担任京绥铁路和京汉铁路主管,1921 年到 1922 年间担任京绥铁路总工程师及京汉铁路顾问工程师,其后退休。在詹天佑担任中华工程学会会长期间,邝孙谋则担任副会长。詹天佑去世后,他接任中华工程学会会长,与时任京绥铁路局局长的丁士源一起倡议为詹天佑建立铜像。并呈文政府。他们在呈文中这样写道:“交通部技监詹天佑,于四月二十四日在汉口差次病故……呈请大总统,准在京绥路八达岭为该故技监建设铜像,并请特予颁给碑文,借没世之荣,作后来之矜式。”3 年后,也就是 1922 年,詹天佑铜像和碑亭落成。

1929 年,邝孙谋去世,时年 67 岁。

说起詹天佑和邝孙谋这对老同学、老搭档,就不得不提旧“交通系”。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交通系”(不管新还是旧)都不是个好词儿,作为晚清民初的一股政治势力,似乎总与那纷乱政治有关,充满着尔虞我诈、唯利是图。

不得不说 ,这种固有观念有着很深的意识形态烙印。其实 ,“交通系”根本没有这么黑暗 ,甚至可以说是一股相当健康、曾经推动时代前行的力量。

所谓“交通系” ,顾名思义 ,以当年的邮传部官员为基础 ,大致由铁路、电报等领域的技术官员组成。晚清时期 ,邮传部可谓重中之重 ,它承载着清政府实业救国的梦想 ,无论是铁路还是电报 ,抑或其他交通、通信领域 ,都是发展工业的基础。这个领域的官员普遍思想活跃 ,懂得新知识 ,相对尊重科学 ,是晚清官场上的进步力量。当时领衔“旧交通系”的二人都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 ,一是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绍仪 ,一是交通银行的创始人梁士诒 ,这两人的见识和魄力 ,在当时都堪称翘楚。

仅 1909 年到 1911 年间 ,邮传部尚书就换了三任 ,分别是徐世昌、沈云沛和唐绍仪。作为袁世凯心腹 ,他们大量提拔“交通系”力量 ,如叶恭绰、关赓麟、龙建章、詹天佑、邝孙谋、关冕钧和周万鹏等人 ,其中不少是当年的留美幼童。

比如在徐世昌任期内 ,有一个京奉铁路洋务总办的空缺 ,徐世昌曾在奏折里称 ,这一职位负责“统辖洋员 ,综理交涉 ,责任至为重大” ,他原本打算由分省补用道于焌年充任 ,后因于焌年另有任用 ,遂派京奉铁路洋务提调、候补知府卢祖华接任。这位卢祖华便是留美幼童出身 ,广东新会人 ,当时在京奉铁路段已经工作了 10 年。

又如沈云沛任期内曾上奏请求褒奖京张铁路建设的有功人员 ,其中特别提到詹天佑“品端艺粹 ,力果心精。自美国毕业回华后 ,历任京张总办兼总工程司 ,定线敷工 ,指挥群众 ,栉风沐雨 ,昕夕勤劬 ,廉洁自持” ,詹天佑此后便被提拔。他还曾上奏《裁缺各员改补员缺折》,其中特别提到时为电政局襄办、候选道的周万鹏 ,指“该员系电学出身 ,历充电局总管

襄办等差 20 余年,深资得力。此次自任差以后,一切节省经费,整顿电务,经理尚属得宜,拟即派充电政局总办,所有电话电报各局、总办委员均归管辖,以一事权”。这位周万鹏也是留美幼童出身,不过他主要活跃于电报领域,是中国电报业早期的代表人物,与本文无关,仅在此一提。

到了民国成立、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交通系”中人上位更快,在铁路业的根基尤为牢固。如 1914 年时的全国铁路协会,正副会长梁士诒、叶恭绰均为交通系干将,詹天佑为评议员,邝孙谋为交际干事,还有其他不少留美幼童也位列其中,比如长期担任外交官的钟文耀也是交际干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旧交通系”里,地缘因素十分突出,其中尤以广东人势力最大。梁士诒是广东佛山三水人,唐绍仪是广东香山人,此外,他们提拔的叶恭绰、郑洪年、关冕钧和关赓麟等都是广东老乡,詹天佑和邝孙谋也不例外。

从“交通系”的形成、发展和崛起中,也可看出晚清民初官员升迁的一种规律。詹天佑和邝孙谋原本都是纯粹的技术人员,但在长期的建设和经营工作中,他们不但积累了大量一线经验,而且比科举出身的官员更具实干精神,恰恰是那个时代亟须的人才,于是,他们又逐渐步入行政领域,成为官员。这也是当时“海归”们的主要升迁模式。

罗国瑞:中国第二位铁路总工程师

在“旧交通系”中,还有一位留美幼童出身的人才不可不提,他就是首批留美幼童之一的罗国瑞。

罗国瑞如今声名不彰,但据考证,曾任浙江铁路总工程师(即总工程师)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位担任铁路总工程师的人,第一位是詹天佑。

罗国瑞是广东惠州人,父亲是基督徒,长期在香港传教。容闳招收首批留美幼童时,因为招生困难,被迫前往当时相对最为开放的香港,“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有根柢者数人,以足其数”,罗国瑞就位列其中。

因为从小就熟悉基督教文化的缘故,罗国瑞赴美后适应很快。他先是与张康仁、欧阳庚一起寄宿于美国人家中,不久后又迁往他市,寄宿于诺索布夫人家中,也就是詹天佑的寄宿之处,与他们俩一起的还有欧阳庚和潘铭钟。在詹天佑书信集中可以看到,回国后的他常常在与外国友人的通信中提及罗国瑞。

在美国期间,罗国瑞先是就读于某男生学校。在高宗鲁所著的《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一书中,收录有罗国瑞写给外国友人的四封信,其中一封回忆了这段日子,信中写道:“那里有海滩与树林,我相信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是在那里度过。人人是那样和蔼可亲,而最使孩子们常念念

不忘的是那丰盛可口的食物,就在这种无忧无虑的环境下,我们共同步入成年。”后来,他进入纽海文中学,其后考入美国得乐埠伦斯利亚工程专门大学堂。1881 年,他与其他留美幼童一道,被清政府强行召回。

回国后,罗国瑞曾当过测量师、教员、验矿师和议员,如曾在江南海关道当差,总管洋务,担任安南两广勘界事宜专管,还曾专管热河烟筒山银矿化学各事宜。1896 年,他在汉阳铁厂担任译员。也是在这一年里,他终于进入铁路领域,可以一展所长。

1906 年,他曾致信远在美国的诺索布夫人,表示“自我归国,我曾跋涉内陆,远及蒙古,饱经艰辛。我曾做过测量师、教员、验矿师、译员,过去十年我转到铁路界工作,现任浙铁路总工程师”。

那么,1896 年时的罗国瑞,是如何从一个译员变成铁路技术人员的呢?

这一年的罗国瑞已经 36 岁,不再年轻。因汉阳铁厂的技师多为外国人,急需一名译员,罗国瑞便前来应聘。在担任译员期间,他留洋时的专业知识渐渐展现,尤其是张之洞大举兴建铁路时,更是给他提供了机会,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1898 年,清政府打算修建粤汉铁路,盛宣怀曾上书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表示“粤汉必先堪路,……敝处拟派罗国瑞,仅能画图,通英语,使其初堪,可详告洋工师耳”。

这个评价并不高,只是提到了罗国瑞的英语和画图能力。更糟糕的是,罗国瑞在接受任务、启程之前居然病倒,加之那时人才紧缺,无人能马上顶替,结果延误了整个工程的开展。张之洞十分不满,认为“罗种种稽延,不解其故”。盛宣怀也很恼火,说“罗国瑞稽延可恨,此外苦无人,已电罗必须初十内起程,但恐真病,亦难勉强”。

但即使如此 ,罗国瑞仍然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得到施展空间。1899 年 ,盛宣怀督办萍醴铁路 ,工程设计者是美籍工程师 ,罗国瑞担任帮工程司。这条铁路直到 1903 年 8 月才通车 ,其后又启动萍潭铁路铺设 ,罗国瑞继续担任帮工程司 ,直至 1903 年 12 月。

在这 4 年多时间里 ,罗国瑞一直待在萍乡。我曾读过一篇惠州媒体的报道 ,挖掘罗国瑞的经历与事迹 ,其中就提到了他在萍乡的生活。报道中提到 ,《萍乡文史资料》中曾记录了一首创作于 1898 年至 1906 年间的《煤矿歌》,里面就提到了修建萍潭铁路时的艰辛 ,罗国瑞因督工甚严 ,被工人们称为“罗胡子”。报道中还提到 ,1903 年 ,罗国瑞已经担任全国铁路审查委员会主任 ,负责制定全国铁路建设规划。

其后 ,他应聘为浙江铁路总工程司 ,负责修建浙江省第一条铁路——江墅铁路(江干闸口至湖墅拱宸桥)。于他而言 ,1906 年是个多事之秋。那年 ,他选择了辞职 ,原因是与上司不和。据说 ,他的辞职使得老同学詹天佑痛心不已。也是在那一年 ,他还曾接到滇蜀铁路公司伸来的橄榄枝。当时 ,滇蜀铁路准备修建 ,公司希望聘请罗国瑞任总工程司。此时的罗国瑞名气已大 ,便提出了千元月薪。他的月薪一直呈上升趋势 ,据载 ,他“在萍乡铁路为总工程司薪资尚不大 ,自浙绅延办杭州铁路为总工程司月薪遽增至八百金”,若再跳槽 ,当然要求更高 ,千金并不为过。即使如此 ,滇蜀铁路公司仍然觉得可以接受 ,表示“如必须此数方能应聘 ,滇亦照办”。不过罗国瑞并未前往云南 ,不知原因为何。有人曾说这与其父当年去世 ,他需守丧有关 ,也有人认为并非如此 ,因为也是在那一年里 ,他曾勘查吉长铁路 ,此事见于《中国铁路史》。《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史料集》还有记载 ,指罗国瑞在勘查吉长铁路后 ,于次年指出日本工程师存在虚报造价的行为 ,就此事与日本南满洲总理后藤氏还有问

答记录。

根据记载,罗国瑞人品不错,但人缘不佳,常常树敌。此后的他,虽然是国内一流的铁路专业人才,但却两次遭到免职。

一是在担任津浦铁路南段总办期间。1908 年,清政府向英、德两国借款,兴建天津至江苏浦口的津浦铁路。当时,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津浦铁路总公所,罗国瑞为南段总办。在台湾"中研院"(今台湾地区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近代史研究所编撰的《海防档·铁路》中曾有记载,指罗国瑞十分尽职,抵制了英国总工程师的越权要求,并揭露英国总工程师放任其助手"挟同日妓,舟车避暑",耽误工期的劣迹。

可是,到了 1909 年,交通部突然收到匿名信,举报罗国瑞"昏庸怠惰,舞弊营私"。朝廷立刻派时任邮传部右丞的李经楚到津浦铁路南段"按照所参各节确切彻查"。

这位李经楚是李鸿章的侄子,也热衷洋务,算是开明官员。也幸亏是他,才能秉公办事,若换成那些顽固派官员,仅仅是罗国瑞的留学生身份,说不定便已成了原罪。李经楚在后来呈交的多达数千字的《查明津浦南段总办舞弊营私各款据实覆陈折》中,为罗国瑞洗脱了罪名。比如匿名举报信里称罗国瑞"嗜好(即指抽鸦片)甚深,开工以来仅随帮办孙宝琦到工一次",但实际上罗国瑞不抽鸦片且到工地多次。又如匿名信称罗国瑞几乎从不去办公室,公文由秘书处理,实际上"洋员与该道(即罗国瑞)直接商办事件甚多,他人不能代理"。

不过,李经楚在这次调查中的客观公正并不仅仅体现于为罗国瑞洗刷罪名,他还指出了罗国瑞的缺点,认为他"统率华、洋人员驾驭无方,且与地方绅士诸多隔阂,实属不能胜任"。因此,罗国瑞遭遇免职。

有人认为,罗国瑞的"驾驭无方"和"隔阂",与他的留美经历有关,因

此不能适应中国落后的社会生态。我认为这种因素当然存在 ,但更多的可能还是罗国瑞自身的性格问题。如今我们说起那个时代的失意者 ,常常以“万恶的旧社会”为背景 ,认为人不能尽其才都是时代的错 ,这其实也是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 ,仿佛“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朋友”。且不说那个时代是否真的极度黑暗 ,即使真的黑暗 ,也不意味着人才就注定无用武之地。在留美幼童中 ,出类拔萃者大有人在 ,唐绍仪在守旧官场中仍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大有建树 ,唐国安在新式教育屡遭阻挠的情况下奠定清华根基 ,詹天佑在诸多掣肘之下尽展所长 ,都是明显例子。罗国瑞确实是铁路人才 ,但若到处树敌 ,不能协调处事 ,起码在管理上便有缺陷。

1910 年 ,他被派往西南地区 ,负责滇桂铁路勘测 ,这也是他参与建设的最后一条铁路。不久后因辛亥革命爆发 ,铁路未及施工 ,清廷便已覆亡。民国时期 ,滇桂铁路重新启动 ,但罗国瑞已不在参与之列。

民国成立后 ,他曾任邮电部路务议员 ,交通部技正、技监等职务。1914 年交通部设立路电材料研究会 ,他担任会长。交通部要求他“破除情面 ,以改良整顿为前提 ,以任劳任怨为本职”。但不知何故 ,到了 1916 年 ,他突遭第二次停职命运。

被停职后 ,他还曾在平政院控告交通部 ,但停职原因和控告过程都已湮灭于历史。此后的他 ,在史料中失去了记载 ,只知道他去世于上海 ,时间不详。

黄仲良与黄季良,梁普时与梁普照:两对兄弟,各有一人献身铁路

在留美幼童中,有两对兄弟兵。在那个时代,将两兄弟同时送出国,实在算得上壮举。因为按照中国传统,养儿是为了防老,可幼童留美,一去多年,生死未卜,前途不明。送一个男丁出去已经是冒了巨大风险,送两个出去所需要的勇气可想而知。

但在那个闭塞时代里,却真的有这种胆子极大的父母。

有一对留学生兄弟,与詹天佑可算"左邻右里",都在广州西关长大,一个叫作梁普时,一个叫作梁普照,均属第二批留美幼童。其中,梁普照与詹天佑一样,也曾就读于耶鲁。

前几年,梁家后人曾将家中一批旧物捐赠给了广州荔湾区政府,其中包括了一本英文版的《京张铁路技术标准图册》,还有詹天佑亲笔签名的《京张路工摄影》大型图册,以及大量清末民初的中国铁路资料。

但可惜的是,关于梁氏兄弟的现存资料不多,只知道他们回国后,先是在唐山开平矿务局路矿学堂学习,并一同在唐山工作多年,是中国第一批矿冶工程师。此外,其中一位曾经是铁路官员,另一位曾任开平矿务局船务局帮办,后转入上海怡和洋行管理船务,后又被调到湖北宜昌

怡和洋行总理船务 ,1902 年因痔疮手术出血过多而去世。可是 ,具体是谁曾经担任铁路官员 ,各路资料出现了分歧 ,无法确认。

相比之下 ,另一对兄弟名气更大一些 ,资料也较为清晰。他们是祖籍广东番禺的黄仲良与黄季良兄弟 ,二人都是第一批留美幼童。兄弟二人曾有画作在美国展出 ,一幅是他们在美国居住时的房东住所 ,一幅是大海上的一只小船。弟弟黄季良回国后被分配至福州船政学堂 ,后为福建水师“扬武”舰枪炮官 ,在中法马尾海战中为国捐躯。哥哥黄仲良的人生则持续到 1930 年 ,73 岁时去世 ,在当时可算高寿。他曾在美国宾州伯利恒的利哈伊大学读书 ,专业是土木工程。回国后先是被分配到天津东局子兵工厂任翻译兼图算学堂教习 ,还曾任教于保定某军校 ,后来担任过中国驻旧金山领事、汉冶萍冶铁公司秘书 ,此后就投身铁路领域 ,曾任粤汉铁路广州段总办、沪杭甬铁路局长、津浦铁路总办等职 ,还曾参与修筑河南境内的道清铁路和广东的广三铁路。在修筑粤汉铁路期间 ,他曾与詹天佑共事。晚年 ,他隐居天津。

值得一提的是 ,在留美幼童中 ,像黄季良这般曾供职海军者颇多 ,其中多人也为国捐躯。还有一些人后来转入铁路界、电报界或矿界 ,其中有一位第四期留美幼童吴其藻。他回国后被分配到福州船政学堂 ,后供职福建水师 ,与詹天佑共事 ,曾参与马尾海战和甲午海战。在参与马尾海战时 ,其所在军舰被击沉 ,但他获救。在甲午海战中 ,其所在军舰又被击沉(其后人称是邓世昌所在的“致远”舰 ,孤证存疑),但他与另一位留美幼童黄开甲获救。此后 ,他曾在上海的水师学堂任教 ,参加过辛亥革命 ,当过吴淞口炮台指挥官 ,其后曾在朝鲜和日本从事外交工作 ,还曾在京沪铁路任职 ,但职位与作为不详。另有一位王良登 ,也是第四批留美幼童之一 ,江苏嘉定人 ,回国后先是被分配到天津大沽炮台鱼雷队 ,后调

至威海卫鱼雷队任队长,参加过甲午海战。战后,他曾供职于京奉铁路和天津制币厂,还曾参与修建杭州至长沙段铁路。此外,他还曾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贵州、安徽等地的各种铁路、煤矿和企业中工作,履历甚丰,惜乎不详。他与留美幼童共同的"贵人"袁世凯也有些关系,曾为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英文家庭教师。也许正因为这层关系,他后来又进入外交界,出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秘书、驻古巴哈瓦那总领事,晚年隐居上海,直至去世。

还有一位我的广东中山老乡,也算履历丰富,活跃于外交、铁路和商业领域,他是杨昌龄。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曾就读耶鲁大学。曾任清政府驻美使署通译官,驻日使署二等参赞、代办,驻小吕宋总领事官,北洋洋务参赞兼保工局差,中日议约随员,沪宁铁路随办兼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1908 年升任邮传部沪宁铁路管理局总办兼本路总管理处议员领袖。民国成立后,他仍然活跃于铁路界,1914 年被派往接收苏路、浙路,统一沪杭甬铁路,后兼任第一任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局长,1918 年再度兼任此职。后来他还曾任上海造币厂筹备主任。

至于其他曾活跃于铁路领域的留美幼童,具体资料已经很难查找,只能一一简单提及。他们虽不似詹天佑那般辉煌,但也不负多年留学生涯——

陆锡贵,上海人,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回国后被分配至唐山开平煤矿,后参与京奉铁路修建,任总工程师室秘书。晚年在上海逝世。

周传谏,江苏嘉定人,第四批留美幼童之一。曾参加京奉铁路修建,与陆锡贵一样,曾在总工程师办公室工作。其后又在全国各地铁路公司任职,晚年居住于上海。

唐致尧,广东珠海唐家人,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回国后曾经商,曾

参与修建京奉铁路 ,曾主管天津税务局。晚年在上海居住 ,直至去世。

黄耀昌 ,广东香山人 ,第四批留美幼童之一。回国后先是被分配到上海一家棉纺厂 ,后进入汉口一家名为巴特费尔德和斯威尔的英资公司船舶办事处 ;湖北宜昌开埠后 ,任该公司宜昌代理。他还曾在招商局和沪宁铁路工作 ,为上海联合经理 ,同时为京汉铁路北京联合经理。晚年在上海逝世。

蔡锦章 ,回国后曾经商 ,曾任职于京沪铁路 ,于上海去世。

林沛泉 ,广东番禺人 ,曾为铁路官员 ,具体经历、职位不详。

周万鹏等人:电报群英

铁路与电报是近代工业文明的象征。晚清时代,封闭的中国人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下,见识了铁路与电报的神奇,有识之士也生出效仿之心,引为强国之道。

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八股文到近代科学文明,这个跨度实在太大了。且不说清政府的长期封闭与羸弱,即使他们肯将全部心思和精力用于后者,起步之初也注定困难重重,人才就是最大的问题。

留美幼童们在回国后,虽一度遭受冷遇,但在大时代中纷纷脱颖而出,实在有其不可替代性。在当时的国内,他们的出头甚至出类拔萃几乎是注定的。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曾在电报领域工作过,有些人只属过客,后来步入官场甚至平步青云,比如曾任外交大臣的梁敦彦和曾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此外,也有许多人毕生服务于电报界,成为中国电报业的"开荒牛"。有西方学者评价:"他们所获得的知识使中国开展了现代通信,并因此可以说电报系统摆脱了外国的政治干预。"

据统计,从事过电报业的留美幼童有以下多人:梁敦彦、蔡绍基、黄开甲、牛尚周(以上为第一批留美幼童),方伯梁、梁金荣、唐元湛、卓仁志(以上为第二批留美幼童),袁长坤、孙广明、朱宝奎、朱锡绶、程大业、周万鹏(以上为第三批留美幼童),吴焕荣、陆德彰、林联辉、冯炳钟、陶廷赓、盛

文扬(以上为第四批留美幼童)。作为中国电报业的拓荒者 ,他们参与了当时全国大多数电报干线的勘测施工 ,为全国各省电报线连成一体立下了汗马功劳。1895 年 ,留美幼童朱宝奎、黄开甲、周万鹏、唐元湛等获得电报总局督办大臣盛宣怀的奏保嘉奖 。1907 年 ,周万鹏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葡萄牙举行的万国电约公会 。

中国参加国际电联活动第一人

1928 年 1 月 ,周万鹏在上海去世。对于这位在电报业服务长达 46 年的老人 ,蔡元培颇多赞誉 ,称他“导引电政 ,吾国之倡 ;周旋撙俎 ,折冲外攘 ;清廉峻洁 ,不媚于上”。

周万鹏出生于 1864 年(也有 1863 年之说),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1874 年 ,他入选第三批公费留美生 ,赴美学习 ,后考入美国纽约州曲老格致大书院(即理工大学)。回国后 ,他先是前往天津电报学堂学习电报工程 ,1882 年后任清江、汉口两地电报局的领班 ,1884 年调任上海电报局总管 ,后升任该局会办和总办 ,兼任中国电报总局提调和襄办。1909 年升任中国电报总局(后改名为电政局)总办 ,仍兼任上海电报局总办 。

民国成立后 ,他仍活跃于电报界 ,曾任赣、皖电政监督兼九江电报局局长 ,闽浙电政监督 ,交通部邮传司司长兼邮政总局局长和电政监督 ,江苏电政监督兼上海电报局局长 ,代理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局长 ,上海电报传习所监督兼电料管理局局长等职。他于 1927 年退休 ,一生中从事电报事业达 46 年之久 ,其中有一半时间供职于上海 。

当年的宁汉电报线和滇黔电报线建设 ,他均有参与。在被派往日本考察电话时 ,他曾带回一名日本技师 ,赴广州筹办电话局 ,随后又在上海

筹办电话局。次年,八国联军进京,清政府逃至西安,时任上海电报局会办的周万鹏奉命建设陕西和河南一线的电报线路,即“跸路电线”(指皇帝专用电路),5 个月后完成任务。1907 年,他在上海电报局任上主持“青沪水线合同及胶济铁路转报合同”的谈判,德国驻沪总领事一开始不同意列入“德国不再增设电线”的条款,由于周的坚持,终于将此条款写进了合同。

1908 年,周万鹏先是赴日本主持东三省电线与烟台水线的谈判。同年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前往里斯本参加万国电报公会,成为中国参加国际电联活动的第一人,会后赴欧洲各国考察电政。会议期间,他了解到我国电政之所以易受制于外人,主要是因为缺少西方各国所具有的统一电报政策与技术规范,于是回国后编辑了《万国电报通例》,使我国电政得以统一,为中国电报技术标准化及与国际电报业接轨打下基础。

参加万国电报公会,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周万鹏适逢其会,可算是与有荣焉。

电报于 1844 年正式诞生,很快便跨越国境,成为当时最先进的通信工具。1865 年,欧洲各国在巴黎聚会并签署公约,万国电报公会由此建立。19 世纪 70 年代,李鸿章、沈葆桢和丁日昌等洋务名臣开始试水电报业。最初是沈葆桢奏请开设闽台线,后来因为纠纷问题,仅保留马尾线。1877 年,李鸿章在天津建成 16 里电报线,同年,丁日昌建成 95 里电报线,1879 年,李鸿章建成天津到大沽线,共 120 里。中国电报业就此发端。

万国电报公会也在此时开始与中国联络接触,并连续邀请中国参加万国电报公会。但此后 20 多年,清政府因为各种因素,如朝野意见不一,始终未能加入万国电报公会。直到 1908 年,清政府才派出周万鹏参

加大会。

1909 年 ,英商在上海惠中旅社设立商用无线电台 ,侵犯中国电信主权 ,周坚持原则 ,力争撤废 ,收归中国所有。也是在那一年 ,时任全国电报总局兼上海电报局总办的周万鹏 ,发现上海各局仍在沿用旧莫尔斯机收发电报 ,效率不高 ,于是将旧机全部改换成新创的韦斯敦机 ,使上海电报局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1915 年 ,法国在上海顾家宅设无线电台经营商报 ,该台的设立未经中国政府同意 ,周在交涉中据理力驳 ,迫使法方屈服。周万鹏熟悉电报业务、技术 ,且管理有方。担任电报总局提调时 ,亲自制定洋账方式 ,派员校核每月列出的详册 ,便于同外商电报公司结算账务时做到及时正确 ,原始记录齐全。1917 年 ,他再次担任上海电报局局长时 ,做到“局无闲员 ,月定奖给”,电报传递无稽延 ,业务收入超额完成。周信奉的格言是“习其事者竞其业”,甘愿终生为电信事业服务。

周万鹏一生的顶点是在民国成立后 ,当时 ,邮传部被改名为交通部 ,他曾任邮传司司长 ,兼邮政总局及电政督办。但后来又转而担任上海电报局局长和江苏电政监督。以通常眼光来看 ,这似乎是由高走低 ,但联想民国早年的纷乱政治形势 ,内阁几月一换的频率 ,周万鹏的命运也属寻常。他能终身致力于电报和通信事业 ,已可谓学有所用。而且 ,尽管一直在这个“油水极多”的部门工作 ,但他于 65 岁去世时 ,家无余财 ,可见其人品。

清朝最后一任上海电报局总办 ,民国第一任电报总局局长

清末和民初 ,周万鹏曾两次出任上海电报局总办 (即局长),且时间

很长,但偏偏在历史转折的当口,他没能成为“最后一任”。

不过,清朝的最后一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也是留美幼童出身,是周万鹏的学长——第二批留美幼童中的唐元湛。

唐元湛也曾长期在上海电报局工作,还曾任上海商业储备银行董事。他早年曾担任上海大北电报局局长,清朝灭亡时,他是最后一任上海电报局总办。民国成立后,他又成为民国第一任电报总局局长。

作为一个技术官员,在那个政权更迭的当口,他也曾经恰逢其时,留名于史。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山,一面派军攻打武汉三镇,一面与革命党人互通消息。双方达成议和意向后,仍有暗战,这个暗战的关键就在于议和代表的选择——尽管双方的议和代表都是由本方选择,但革命党人当然希望袁世凯派出的议和代表也能有共和情怀,这样不但好说话,也利于早日达成一致。有革命党人暗中提出,袁世凯方面最好能派出唐绍仪担任议和代表,因为他不但是袁世凯的亲信,深得袁世凯信任,又是留美出身,观念前卫,还是清廷能吏,搞经济是一把好手,在清廷也颇有人望,对谈判大有好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认同,于是,有革命党人暗中委托唐元湛,让他秘密赴京找珠海唐家的老乡唐绍仪,鼓动他主动请缨,担任议和代表。唐绍仪答应后,袁世凯亦知大事不可阻止,也属意唐绍仪参与议和。

也许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唐元湛深得革命党人信赖。1913 年“二次革命”时,革命党人委托唐元湛接管监督中国电报总局,原监督袁静生率诸员离局。驻沪领事团以“此举实属侵犯条约权利”为由,指令工部局派巡捕至电报总局,出总巡谕单,称“奉工部局之命令,上海电报总局仍应由袁(静生)监督及其代表管理”,强迫唐元湛离开电报局。

唐元湛一生并不仅仅从事电信工作,与其他许多留美幼童一样,他

也曾在矿业等新领域工作过 ,不过服务的并非清廷 ,而是洋公司。他曾是中英美矿务公司代表 ,1910 年 1 月 8 日 ,时任奉天劝业道的赵鸿猷与代表中英美矿务公司的唐元湛和柯敦谈判 ,在奉天城签订了海龙府金矿合同。合同规定 ,双方在海龙府的香炉、海仁社开办金矿 ,每年以 20 平方里为限 ;公司出资金 ,劝业道为监督 ;双方各派代表组成奉天海龙府香炉、海仁社金矿有限公司。

在有限的记载中 ,我还发现他曾前往瑞典考察电信业务 ,而具体的考察对象可谓大名鼎鼎 ,即爱立信公司。晚年的他曾担任上海商业储备银行董事 ,后逝于上海。

唐元湛的子孙都颇有名气 ,儿子唐观翼早年留英 ,曾在英国阿姆斯特朗汽车工厂担任工程师 ,有一款新型摩托车名为 Kyete ,即“翼牌”,便是由其设计 ,并以其名字命名。回国后 ,他曾在上海铁路局吴淞机车厂任工程师 ,后自营车行 ,还是上海扶轮社创始人之一 ,致力于自行车的研究。1933 年 ,他设计了“翼牌”自行车 ,又称花式自行车 ,使中国自行车从 28 寸平车过渡为 26 寸轻便车。

唐观翼有子唐炳良 ,早年就读上海沪江大学 ,因日本侵华而辍学 ,转学汽车修理。1941 年参加中缅抗战 ,被派往仰光负责装配美国援华汽车。战后在中央航空公司工作 ,1950 年在香洲启德机场参加“两航起义”,返回大陆。

唐元湛还曾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1919 年 ,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协会 ,同年 ,唐元湛担任理事长。

曾接替唐元湛担任江苏电报局监督兼总办以及交通部电报总局局长的袁长坤 ,同样是留美幼童出身。

袁长坤是绍兴人 ,也是绍兴历史上第一位官派留学生。1874 年 ,他

作为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前往美国。抵美后,他被安排在马萨诸塞洲霍约利克的卡格温家中,很快掌握了熟练英语,并进入当地公立学校读书。

留美幼童被强行召回后,袁长坤先是被分往天津电报学堂,学习收发报、勘测和电信原理。离开学堂后他即投入大规模的电线建设,是中国电报业先驱之一。他曾任清朝邮传部电政负责人、交通部电报总局局长兼教育部副主考等职。

辛亥革命后,电信业一度混乱。1913 年 2 月,北洋政府交通部下令在各省分别设立电政管理局,每局设监督一员。其中,江苏电政管理局驻在上海,管辖江苏全省各局,唐元湛任监督,兼任上海局总办,其后接任的是袁长坤。1915 年起,北洋政府交通部陆续在上海市区开设了上海闸北电报分局、上海电报南分局、上海电报西分局等同城电报局。这些分局只受理市民交发的电报,发往上海电报局再转发到各地,但与上海电报局同级,无隶属关系,同属江苏电政监督管辖。这些分局的设置,方便了民众使用电报,但也带来了管理上的问题:因为是和上海电报局并立的单位,所以在统一管理上就形成了各自为政、难以统筹协调的局面。

面对这种各自为政的现象,1916 年 8 月,时任交通总长许世英决定将各管理局一概撤销,由各省一等电报局负责辖区内的电信管理权。在许世英改革电政系统后,上海电报局名列一等电报局,并负责监督江苏省电政,下辖 54 个分局。从 1916 年到 1922 年,担任过上海电报局局长及电政监督的有汪洋、周万鹏和沈维新。1922 年 11 月,交通总长高恩洪又取消电政监督,改各省一等电报局局长为总办,总办听命于交通总长,借此加强交通总长对地方电政权力的控制。在这一系列变动中,我未能找到袁长坤的印迹。

同样曾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的还有朱宝奎。他是江苏扬州人,出身

官宦人家 ,为第三期留美幼童之一。在美期间 ,他与詹天佑关系甚笃 ,回国后也一起在福建水师任职。1886 年曾参加中法战争 ,后来曾参加甲午海战 ,舰船沉没后在海上漂流 ,幸得渔民搭救。大难不死的他在晚清政坛中仕途可算顺利 ,1903 年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 ,1907 年担任邮传部左侍郎 ,晋升为副部级高官 ,此外还曾担任沪宁铁路总办、招商局总办等要职。值得一提的是 ,他还是天津电报业的拓荒者 ,光绪七年(1881 年),清政府设立津沪电报总局 ,总办是大名鼎鼎的盛宣怀 ,他在天津紫竹林、大沽口和山东济宁、江苏清江、苏州、上海等地均设立了电报分局 ,天津电报局就此发端 ,首任总办是时为候补知府的朱宝奎 ,领班也是留美幼童出身 ,名叫程大业。不久后 ,朱宝奎升任道台 ,离开了天津电报局。

他热心家乡公益 ,曾创办学堂 ,使得家乡子弟可以就近接受教育 ,也曾修路便于行人来往。辛亥革命爆发时 ,他积极响应 ,后来曾前往日本和朝鲜担任外交官 ,1926 年去世。

曾与朱宝奎一起在天津电报局搭档的那位程大业 ,尽管声名不彰 ,但在从事电报业的留美幼童中十分特殊。他后来曾担任蒙古恰克图电报局局长和满洲里电报局局长 ,负责修建从北京到蒙古的电报线 ,可谓大半生服务于边疆地区。

牛温二人与宋家的渊源

在留美幼童中 ,有亲缘关系者不多 ,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牛尚周和第二批中的温秉忠是表兄弟。牛尚周曾从事电报业 ,二人在其他领域也有成就 ,还与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颇有渊源。

牛尚周是江苏嘉定县(今上海嘉定区)人 ,回国后经过摸爬滚打 ,先

是被赐进士,曾供职于上海电报局,也曾任江南制造总局帮办。他的妻子是徐光启的后人,名叫倪桂清(也有倪珪金一说)。倪桂清还有两个妹妹,二妹倪桂姝(也有倪秀贞一说)嫁给了牛尚周的表弟温秉忠,小妹倪桂珍(也有人认为她排行第二,倪桂姝才是小妹)云英未嫁,得姐夫牛尚周和温秉忠介绍,嫁给了他们在美国结识的好友宋嘉树。

牛尚周、温秉忠和宋嘉树的结识也颇有意思。他们在美国留学时,常去一家丝茶店购买生活用品,宋嘉树恰恰是店员。很快,三人就成了好友,牛尚周和温秉忠劝宋嘉树找机会念书,日后可以回国谋生。宋嘉树在他们的鼓励下,努力争取到了去美国学校进修学习的机会,并在毕业后获派前往上海传教。他在上海一度感到很不适应,无论是生活还是传教事业都处于低谷,但却神奇般地在街头重逢牛尚周,得以被介绍了这一段姻缘。因为倪家颇有名望,宋嘉树通过这次婚姻得到了丰厚的嫁妆、广阔的人脉,事业突飞猛进。

后来,倪桂珍为宋嘉树生下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分别是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和宋子安。可以说,牛尚周和温秉忠撮合了一段改变中国历史的婚事。温秉忠回国后先后任镇江美国领事馆通译、两江总督署通译兼秘书、镇江及天津洋务局总办,后来官至二品大员,并于1907年率教育考察团赴美时,将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带到美国留学。民国成立后,温秉忠跟随孙中山筹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后被任命为外交部驻苏州办事处长、苏州海关监督。

英年早逝盛文扬

盛文扬,香山县人,家住如今的珠海南溪,是第四批留美幼童之一。

回国后 ,他先是在福州电报局当领班 ,不久便升任福州电报局局长。后来 ,按清廷惯例 ,报捐知府 ,分发福建补用 ,供职洋务局。

此时适逢福建教乱 ,传教士被杀 ,教堂被焚毁。各国领事要求严惩罪犯 ,并索要赔偿 ,清廷无力应对 ,盛文扬挺身而出 ,与各国领事谈判。他调查事实 ,据理力争 ,使得事件和平解决。经此事 ,他大得赏识 ,升任洋务局总办 ,也曾被授候补巡抚。

可惜的是 ,本有希望成为名臣的他因积劳成疾 ,于 40 岁时便早早去世。

詹天佑的亲密战友

在詹天佑建设铁路的过程中 ,有一人堪称其亲密战友 ,也是他的首批留美同学之一——方伯梁。

方伯梁是广东开平塘口人 ,也是侨乡开平的第一个官费留美学生。留美幼童被强行召回时 ,他因有亲属接济 ,得以与欧阳庚等人一起留在美国继续学业 ,最终在耶鲁大学毕业。

毕业回国后 ,他成为詹天佑的得力助手 ,尤其是在京张铁路的修建过程中居功至伟。之后 ,他又历任京津、闽粤各铁路及各电线局总工程师 ,北洋唐山路矿大学堂监督及奉劝业道等职。他与电报事业的交集发生于民国成立后 ,曾任汉口电报局局长。

方伯梁之子方皋 ,早年参加革命 ,1949 年后先后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经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中国人民银行中南区行副行长兼华南分区行行长和广东省分行行长、广东省财委副主任、广东省经委主任和广东省副省长等职。1963 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中国银行副董事长

兼副总经理,1979 年兼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

群 像

吴焕荣,铺设了江西第一条电报线,后任江西电报局局长、汉冶萍煤铁公司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梁金荣,广东香山人,从电报局文童开始做起,也曾担任江西电报局局长;陶廷赓,广东南海人,先执教于上海吴淞学院,后任湖北电报局局长,在电报领域工作 48 年;浙江钱塘人孙广明,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早期电报业工作者之一;冯炳钟,广东鹤山人,第四批留美幼童之一,曾在电报局工作,去世于广州;陆德彰,浙江川沙县(今属上海)高昌乡人,第四批留美幼童之一,曾任松江电报局局长。

在大历史的背景下,他们显然声名不彰,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的贡献不可抹杀。

“旧交通系”班底

“旧交通系”在晚清民初的中国政坛中,可谓地位举足轻重。早在盛宣怀督办交通三政时,唐绍仪、梁士诒领衔的“旧交通系”便已崭露头角。有留美幼童中“混”得最好的唐绍仪在,老同学们自然不会吃亏,何况作为早期洋务、技术官僚的中坚,留美幼童本就素质出众,脱颖而出的概率极大。

从 1909 年 4 月到 1911 年底,徐世昌、沈云沛和唐绍仪先后担任邮传部尚书,期间提拔了大批“旧交通系”人物,如叶恭绰、关赓麟、龙建章等,此外还有詹天佑、邝孙谋、周万鹏等前留美幼童。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

佑自不必说 ,1910 年 8 月 22 日 ,邮传部上奏 ,在《裁缺各员改补员缺折》中特别提及电政局襄办、候选道周万鹏 ,称“该员系电学出身 ,历充电局总管襄办等差 20 余年 ,深资得力。此次自任差以后 ,一切节省经费 ,整顿电务 ,经理尚属得宜 ,拟即派充电政局总办 ,所有电话电报各局、总办委员均归管辖 ,以一事权”。也正是因为这个折子 ,周万鹏得以执掌上海电报局 ,又主持义和团事件后的京津地区电报线路整修 ,修建北京至西安临时行宫的电报线路 ,就此成为中国电报业的重要奠基人。

新旧“交通系”都曾被污名化 ,但如今回头再看 ,“旧交通系”作为官场派系 ,其实是那个时代真正的进步力量。在铁路、电报等新兴产业中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开荒牛” ,不管高调还是低调 ,都值得后人记住他们。